



赤子丛书

CHIZICONGSHU

纳粹集中营的 中国女孩

——朱敏回忆录

朱敏
康克清

五十年过去了
我们永远记得
这一天

这些姑娘们
永远活在人们
心中

比苏比战争
更残酷

都集中到中日战争

朱敏女儿我们身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赤子丛书

纳粹集中营的中国女孩

——朱敏回忆录

顾保孜 执笔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赤子丛书

纳粹集中营的中国女孩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河北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 1/32 8.5印张 140,000字 1995年12月第1版
1995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0 定价:12.80元

ISBN 7-5376-1410-5/I·577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回我厂调换）

内 容 提 要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德国纳粹集中营里,关押着唯一的中国女孩。她就是红军总司令朱德的亲生女儿朱敏。

朱敏于 1941 年 2 月乘坐苏联轰炸机到达乌鲁木齐,再乘火车到达莫斯科进入国际儿童院学习。同年夏天苏联卫国战争爆发,她在白俄罗斯不幸落入德国纳粹的魔掌,在德国集中营度过了九死一生的艰苦岁月。

本书详细地记录了这一鲜为人知的真实历史。电影《红樱桃》和电视连续剧《血色童心》中经过艺术加工的女主人公楚楚的艺术原型就是朱敏。

1946 年朱敏重返莫斯科,在列宁师范学院毕业后回国当了一名普通的大学教师,默默无闻地奉献着自己的一切。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鹏同志为《赤子丛书》题词:“牢记历史刻苦学习。”

牢記歷史

刻苦學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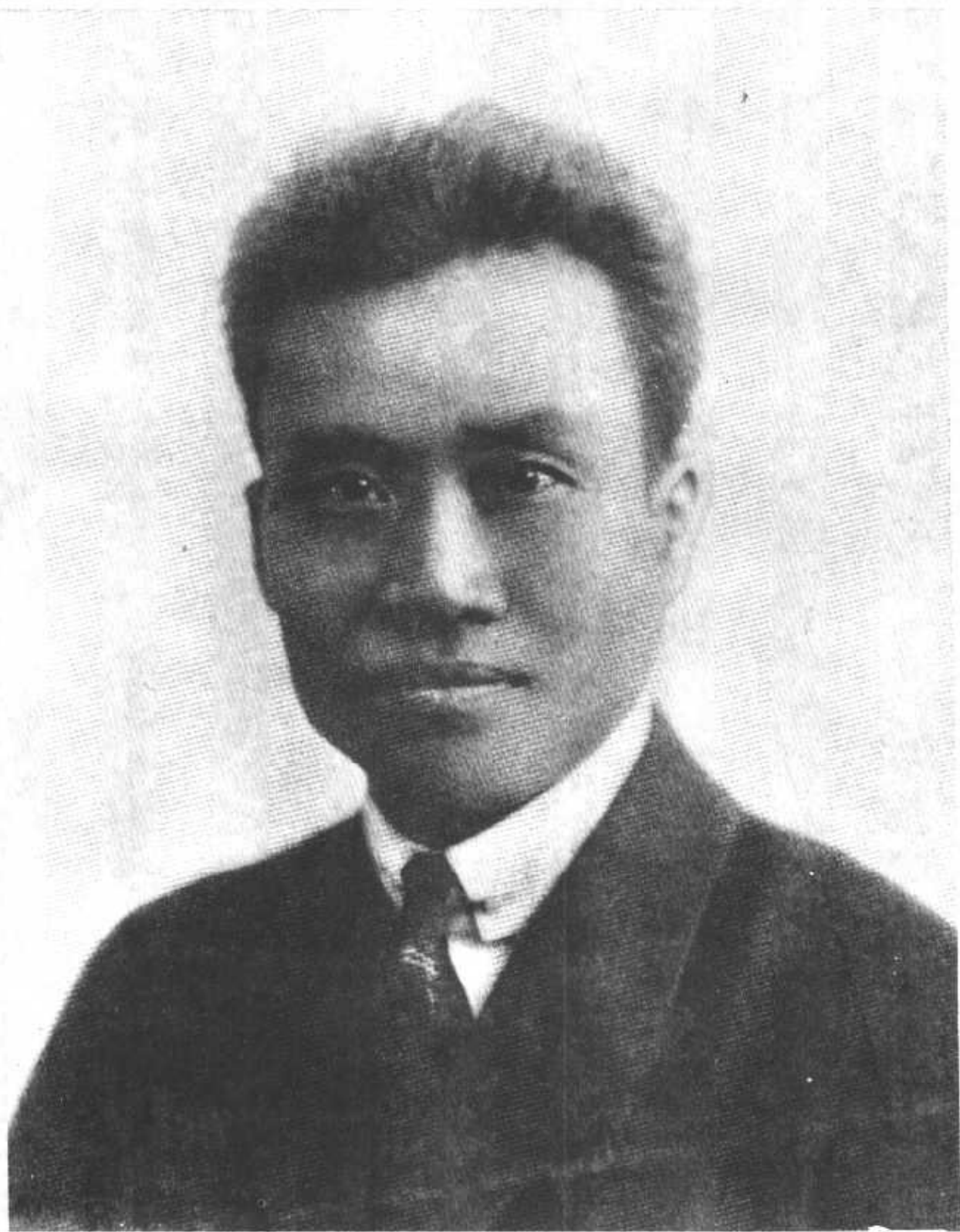
李鵬

一九九六年

三月十日



朱敏近照



1923 年朱德在法国留学。



1923 年朱德(前排右二)在德国留学时的合影。



1939 年朱敏在成都和外婆、姨妈、表妹在一起。



1944 年朱敏(中)和小伙伴在德国纳粹集中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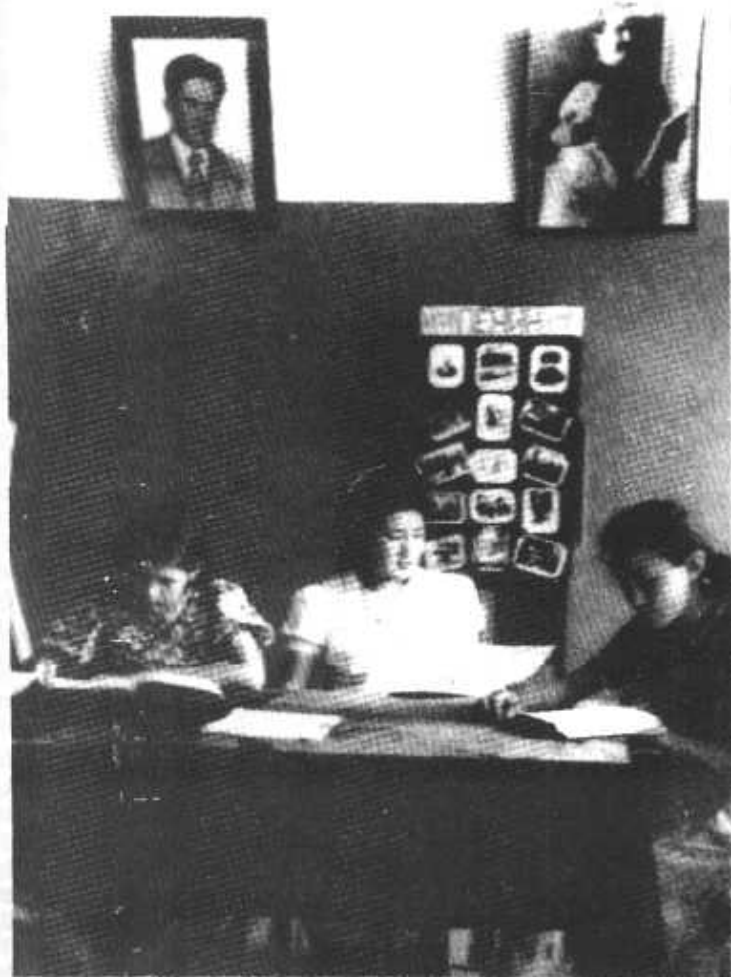


1944 年 1 月 30 日朱敏(左二)在集中营和苏联难友们。

1948 年朱敏于
苏联伊万诺夫中学。



1947 年 7 月 8
日朱敏重返莫斯科，
在伊万诺夫中学图书
馆。



1953 年
朱敏和刘铮结
为夫妻。



朱敏和刘铮在中国驻莫斯科
大使馆举行婚礼。





朱敏和刘少奇的孩子刘允斌、刘爱琴在苏联。



朱敏在北京师范大学和 60 届毕业生用俄语进行课堂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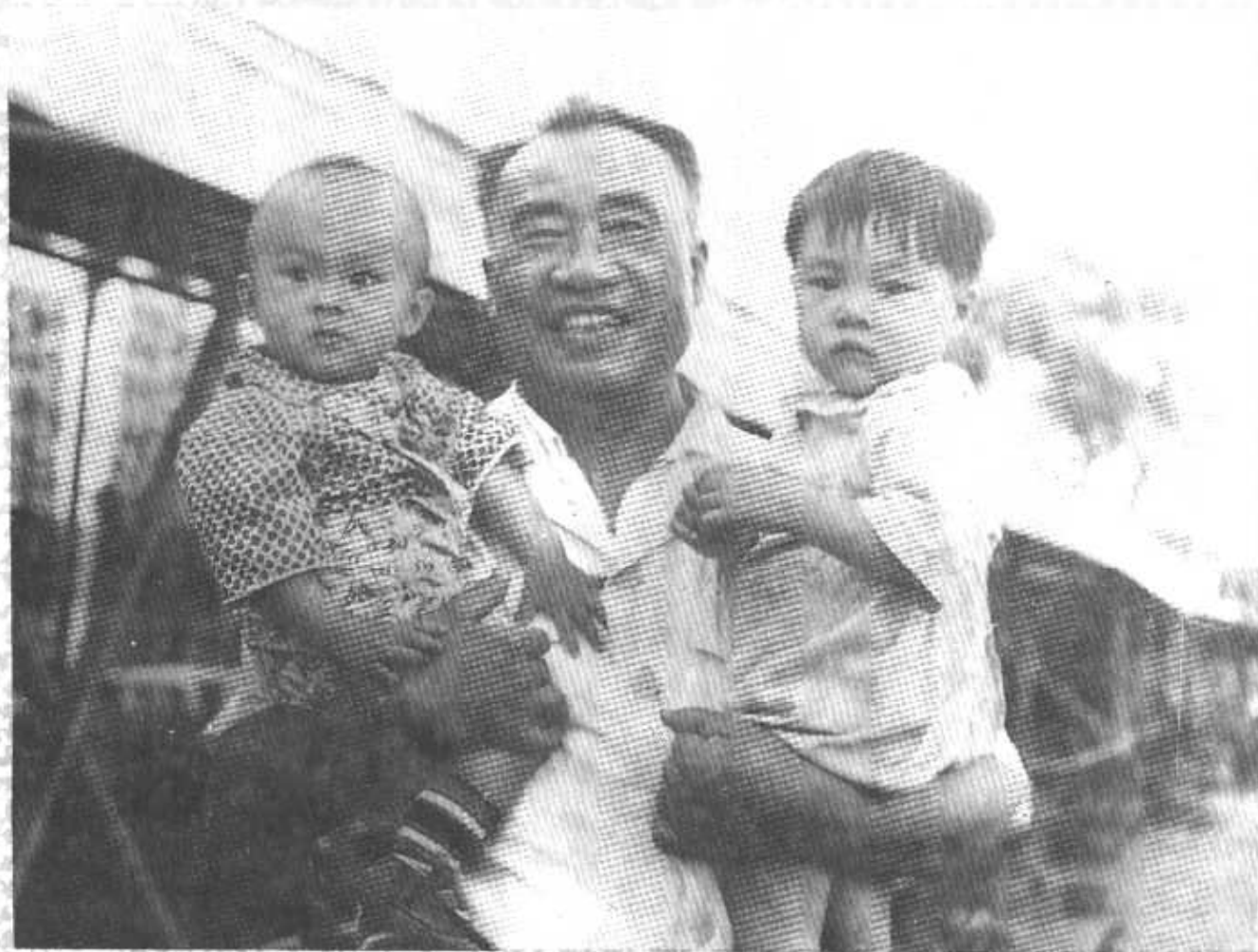
1950 年朱敏回
国度假和父亲在北
京。



1950 年朱敏和
父亲外出，途中小憩
(两个年纪小的孩子
是朱敏的侄子、侄
女)。



1950年7月4日,朱敏、朱德、刘爱琴、李讷(从右至左)在北京香山。



爷爷抱着孙子建建与和平 (1956年在中南海)。



登山途中的
“战役”，朱德和彭
德怀对弈，邓小平
观战。



1962 年夏天
朱敏和父母亲在北
戴河。



一九五一年夏在青島同父亲朱德、母亲康克清合影。



一九五四年朱敏夫妇和父母在北京郊区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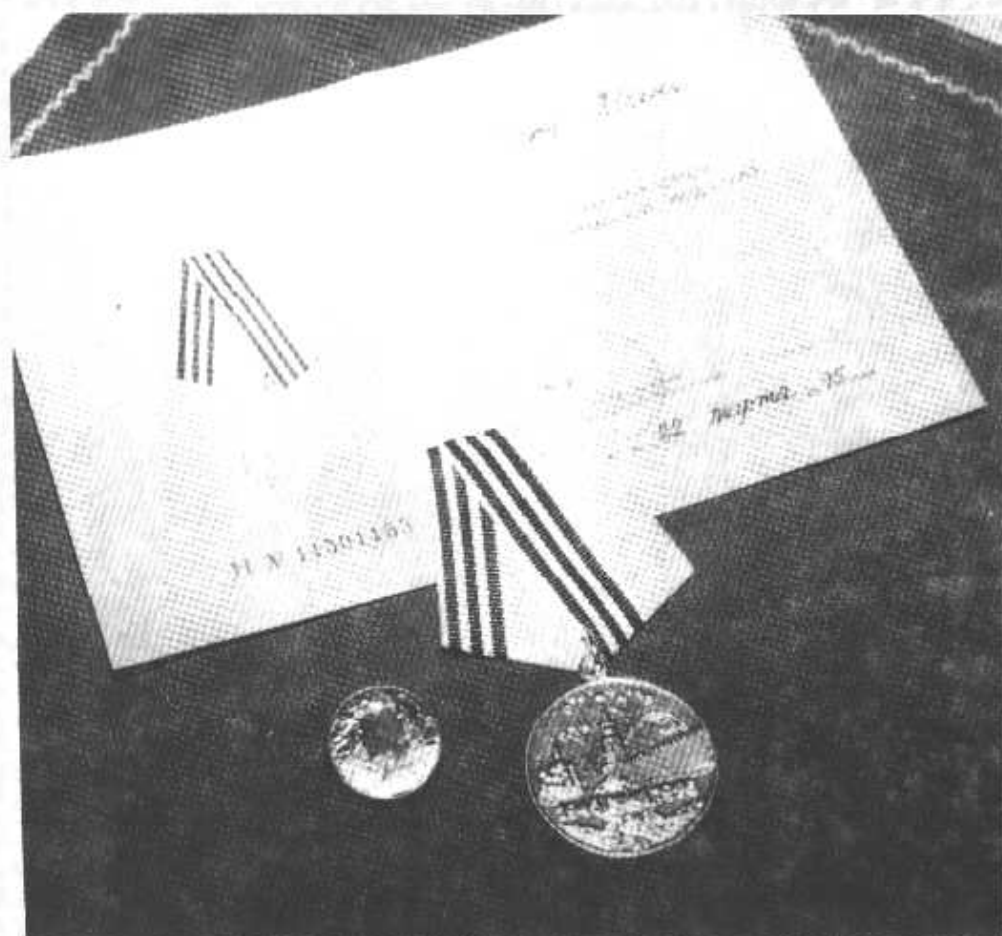
1984 年 12 月 27 日朱敏夫妇在李鹏同志家中做客。



朱敏、刘铮和孩子们。



朱敏担任军地两用人才培训学院院长，和战士们在
一起。



这是朱敏保存
的两枚纪念章。左
侧的列宁纪念章伴
她度过了集中营的
铁窗岁月，右侧的
纪念奖章是俄罗斯
联邦主席团颁发的，证书上有叶利
钦总统的亲笔签
名。

練為好中日戰爭
 進步比美比戰爭
 更進此信者生
 做好人好習將來
 回來作些建國事業
 為好

朱德
 康克清
 1943年
 于延安

朱德给朱敏的亲笔信

朱起如兄 我们身
边却明年齐已左做
了高第正立科为院
系送来今年上半
年得像片两张你
在战争中应为一面照
稿一面读者脑力因
体力部步同时重

朱德给朱敏的亲笔信

这是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真实的故事。
一个中国女孩在纳粹集中营九死一生活了下来。
如今她还健在,但已不再年轻。
如果让岁月从头再来一次,
这个历经磨难的孩子还会对中国“红军之父”说:
“我不怪你,爹爹!”

目 录

第一章	我的童年.....	(1)
第二章	北上延安.....	(25)
第三章	出 国.....	(49)
第四章	地狱之门.....	(71)
第五章	暗无天日.....	(93)
第六章	断肠天涯.....	(113)
第七章	幸 存 者.....	(141)
第八章	迟到的学业.....	(169)
第九章	返回祖国.....	(197)
写在后面的话.....		(231)

DJ 64 / 28

第一章

我的童年

- 成都东郊的一个果园里，
树枝上挂着我童年的故事
- 我从国民党的悬赏图上认识了父亲，
遥远的思念变得强烈起来
- 我的名字上了失散子女的名单，我来到了
周恩来伯伯和邓颖超妈妈面前
- 姨妈被国民党抓走，她一口咬
定：“她是我的女儿。”

成都东郊的一个果园里， 树枝上挂着我童年的故事

我从小在外婆家长大。

外婆家在成都东郊门外。姨妈在那里种植了一片果园。

果园农场的面积不大，大约有一二十亩。但是它在我的眼里是一个神奇无边的大天地，我在它的庇荫下度过了没有风吹日晒却孤寂清戚的童年时光。

果树年年以累累硕果回报辛勤劳作了一年的人们。春秋往复，我在一个个丰收年中渐渐长大，有了自己的记忆和自己的故事。于是，那果树上不仅仅挂着甜蜜的回忆，还有既酸且涩的童年故事。

从我记事起，果园农场的当家人就是我的姨妈。从小我就非常敬佩她。她不仅像一个男子汉那样具有豪情壮志，在荒芜的土地上培植了许许多多的果树，也像一个慈爱的母亲把我从国外抱回祖国，抱回家乡，养育长大。在当时那封建习俗很浓厚的旧社会，一个女性能在家庭和社会上拥有自己独立的经济权，按照自己的方式去生活，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然而，我的姨妈用她那顽强的双肩担负起了种植果树和养育孩子的重担。

抚养我长大的还有我的外婆。她也和姨妈一同生活在这个果园农场里。外婆原来居住在城里，外公去世后，

她便从城里搬来和姨妈一起居住。

1926年夏季，我在苏联莫斯科出生后不久，外婆接到了母亲的信，得知她远在欧洲留学的女儿和中国的著名将军朱德相爱，并且在莫斯科生下了一个女儿。这个消息令她又惊又喜：惊的是朱德将军是西南地区非常有名的英雄人物，女儿和他相爱最后结局将会怎样？喜的是一个小小生命将送回成都，给清冷的贺家增添了第一个第三代的欢乐……

这个让外婆又惊又喜又盼又忧的小生命就是我。

在我不到一周岁时，外婆果断地决定不再等待了，要让我这个小生命尽快结束“旅居”异国他乡的生活，回到国内亲人的怀抱。1927年春天，她让姨妈从大西南的成都出发，一路挺进北上，越过中原，跨过华北，穿过东北，万里迢迢，风尘仆仆来到中苏边界的海参崴，从她的姐姐——我的生母怀中接过正在患哮喘病的我；同时，姨妈也接过了一个母亲的全部责任和义务。

终于，姨妈抱着爱笑而且笑得满脸灿烂的我来到了气候温和的成都，来到了等待我们多时、望眼欲穿的外婆面前。外婆一见我，又是一阵惊喜交集，两行清泪顺着嘴角的笑纹往下滴落。如果不是我甜甜的笑容化解了她挂念女儿的悲愁，她真不知道该怎样经受我的爹爹已经回国参加北伐战争的现实，因为这意味着我随时都有失去双亲的可能。而我，浑然不觉，依然见人就笑，给谁都是一个无愁无忧的笑容。

外婆宽心了许多，说：“这娃娃天生是个乐天派，以后能好好过日子的。”

外婆和家人可怜我小小年纪便离开了双亲，失去了父母的爱，便格外地疼爱我，关心我，像种植小树那样精心养育我，让我根植在温暖的土壤里，伴随着果树一同健康成长……

我来到外婆家第二年，姨妈也生了一个女儿。我有了儿时的小伙伴，童年的生活变得有趣了许多。我和表妹从小就最喜欢果园的秋天，不仅仅是因为有吃不完的水果，更主要的这是我们自由玩耍的季节。每到这个季节，姨妈和姨夫就不会用太阳太毒辣、天气太炎热等理由拒绝我和表妹到果园去玩儿的要求，他们还经常带着我和表妹到果园里察看果实生长情况。一到茂密的果园里，趁大人忙着看哪些树上的果实已经成熟需要采摘、哪些还需要等些日子才能摘的时候，我和表妹便钻出果园的篱笆墙，到外面去采花、抓蝴蝶……

我们回到果园里时，手里抓着一大把五颜六色的花，头上带着用红的、黄的、白的、粉的、紫的花编成的花环。我相信，世界上最美丽的公主都不会有这样美丽的花环！不过，花环下面的脸蛋和衣服就不怎么美丽了，被野地里的烂泥、青苔和花粉涂抹得花里胡哨，脏乎乎的。我看到姨妈惊讶万分、意欲发怒的表情时，就赶紧给姨妈手里献花。她被鲜花一包围就陶醉在美丽之中了，自然也就顾不上责骂我们了。

我们和姨妈都是大自然的女儿，谁能拒绝大自然赏赐的美丽呢？

姨妈的果园里生长着非常健壮、正处在孕育佳龄的苹果树和柚子树。秋色越来越浓了，我们居住的庭院里的树木也开始憔悴，落叶满地；墙脚的花草也在凉露的“沐浴”下越来越萧萧然；茎杆上虽然还有挣扎着开放的残花，但这花朵却越来越纤小，越来越可怜。可是，和我们庭院一墙之隔的果园，秋天萧条的景象却变成了另外一个样子：满园的果树，像经过魔杖的指点，全改了样，充满了勃勃生机，令人欲醉。

果树经过一夏天的蒸晒，走进了成熟时期。树叶变得愈加沉绿，仿佛昨天还青邦邦的果实，一夜间就变得丰润起来。等到秋凉一层深似一层时，圆圆的苹果好像女娃娃水灵灵的脸蛋，又红又鲜，小灯笼似的在绿油油的树叶中间一个接着一个亮了起来，扎眼地挂满了枝头。那些黄澄澄的柚子也不甘落后，飞快猛长，直到大如皮球才歇了气，好像它们随时都会落到地上弹跳一番。这种水果是西南地区特有的品种。它的形状好像是放大的橙子，皮厚，瓣大，肉粒粗，味道清香，吃多少也不会上火。一个柚子管够几个人吃的。柚子耐冻，耐碰，又耐放。一到秋天，四川人像北方人储存大白菜那样猛往家里搬柚子，到冬季时再出售或是招待客人。所以，姨妈果园里的柚子是“皇帝女儿不愁嫁”的，还没有到冬天，堆得像小山般的大柚子便销售一空。

等果园里的水果卖完后，外婆和姨妈就该张罗着为我和表妹添置衣物和学习用品了。说起来也奇怪，对我们上学堂，最认真最积极也最忙碌的是我的外婆。她每天颠着小脚送出我们姐妹很远，直到我们消失在小路的拐弯处，她才颠颠地回去。我们每天放学回家后，她又总是忙着询问我们学了什么？作业做对了没有？考分得了多少？先生表扬了没有？

外婆是在封建式的家庭里长大的，从小就接受“三从四德”的教育。长大后，她又按照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嫁给在封建科举制下孜孜以求、直到获得拔贡官职的外公。她的成长经历和生活环境是旧式封建妇女的缩影。

如果用外婆身着斜襟、长褂、宽裤，一双小脚和脑后挽髻的模样来断定外婆是老式妇女，那就错了，那是小瞧了外婆。外婆的思想非常开明，甚至有她独特的“思想系统”。她把从书本上、报纸上、社会上和实践中学到的知识、信息用记忆的绳索系在脑袋里，遇到处理什么事情，或是要她拿什么主意，她脑袋的绳索就会抽动，拉出她所需要的知识和经验，准确地判断形势，帮助她果断地作出抉择。在城里的绅士们都在大骂甚至大打出手，赌咒新式教育有辱门第、有辱祖先时，外婆却毅然让她的两个女儿（一个是我的生母，一个是我的姨妈）上了公立学堂，接受新式教育。

拔贡的千金进了洋学堂！这个消息一时成为当地小报的头版头条的新闻。可是，这“反叛”行径在外婆手

里不仅没有刹车，反而愈演愈烈，到后来竟然发展成让大女儿去留洋的大“反叛”事件。这在本世纪初期刚刚推翻封建帝制的旧中国，简直是一件大逆不道、伤风败俗的事情。和封建势力抗衡，一个男人尚需要付出很大的勇气和胆量，更何况一个缠足柔弱的妇女？

可见，外婆的“思想系统”是多么的成熟和顽强！

因为外婆的开明和长远见识，她的两个女儿都没有缠足，她也没有包办她们的婚姻，让女儿们在自由的空气中走自己的道路。我的母亲在1924年离开成都到德国留学，在那里她认识了我的父亲朱德。

在我长大成人后，我也思考了父母一辈人的感情观。从中我领悟到，在没有推翻人剥削人的封建制度前，人不可能有完美的感情，特别是像父亲那样全身心属于革命事业的人，命中注定：家庭不属于他，他也不属于家庭。即使有了儿女，他也无法承担义务，去扮演家庭中的角色。所以，我从不埋怨爹爹，因为我知道他深深爱着他的家人，只是人投身的洪流越大，个人悲欢离合的水流就越小，阻力也就越小，远远不能去改变一个人奋斗的航程。

我有个很奇特的小名——四句。听外婆告诉我，这是爹爹在我出生后为我起的。

我出生的这一年，父亲正好40岁。一生征战不息，为寻求革命真理苦苦探索的将军，突然眼前有了个哇哇啼哭的女儿，他的喜悦心情是可想而知的。

四旬！这是为了纪念他 40 岁喜得千金，也是为了纪念他开始新的革命征程而给我起的名字。在我满月时，父亲离开了襁褓中的我，踏上了回国征战的旅途，因为国内有比抚养女儿更重要的事情等待他去做。这以后，我像一只断了线的风筝，从父亲手中消失了。我们父女居然失去联系长达 11 年之久。可是，父亲却和毛泽东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真诚合作，亲手创建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支工农武装，把中国革命推向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父亲曾经被外国作家称誉为“红军之父”。

我的这些身世是我长大后外婆慢慢讲给我听的。开始，我喜欢默默听我的身世，后来我就喜欢问这问那的，再后来那些故事化的往事不能满足我渐渐长大的情感了，我想知道父亲的模样，想知道他现在在哪里，更想能看见他！

我的要求给外婆和姨妈带来了难题……

我从国民党的悬赏图上认识了父亲， 遥远的思念变得强烈起来

我上初小时，开始对自己的爹爹产生许多好奇，有时还会产生一种思念。尽管这种思念模模糊糊，时隐时现，但总觉得沉甸甸的，用大人话说就是思想负担吧。

一天，外婆带我去东郊公园玩耍。在公园里，我看见了一张漫画和一张悬赏图像，使我 7 岁的情感发生了

改变。我模糊的思念变成了明确的期待，这种期待越来越固执，越来越有信心……至今我都不能忘记我看见图像上的父亲时的感觉，那只有骨肉亲情才会有的感觉——温暖、委屈，甚至有鼻尖发酸的感觉。

爹爹，这是每个和我同龄孩子最熟悉不过的称呼，几乎就是第一个学会的单词，与生俱来伴随一个人的一生。可是对我来说，爹爹这个词，就好像天外来客那样的陌生和新奇。

爹爹为什么不来看我？每次问到这个问题，外婆就含糊地回答我说，他在很远的地方，没有办法来看你。如果我再深问，外婆就不高兴了，把脸一沉：“你在外婆这里不是很好吗？就是你爹妈在，不也是这样对你吗？”

看见外婆不高兴了，我连忙闭嘴。因为我发现，我每次问到这个问题后，外婆就要沉着脸好久，好像心里很难受。后来，慢慢我也不问了。

等我长大后才知道，我提这个问题时正好是1934年，正是爹爹带领红军进行两万五千里长征的时候。当时外婆和姨妈都知道爹爹是红军的领导人，只是她们无法将这个复杂的问题向一个8岁的孩子说明白，有时连她们自己也不清楚爹爹准确的行踪，只能通过国民党报纸和街头巷尾的议论听到一点关于红军和爹爹的事情。

有一段时间，我发现谁要是提到红军这个词，外婆都会敏感地停下脚步，注意倾听。有一次，我无意间问外婆“爹爹是不是红军？”外婆紧张地望着我，恐慌地用

指头压住我的嘴，好像我说了“红军”就会大祸临头一样。这时，我觉得心里咯噔一下：莫不是爹爹就是红军哎？要不，外婆一听“红军”紧张啥子？

过了几天，外婆大概看到我闷闷不乐，就带我进了城。

一提进城上街，我马上快活起来，立即高兴地拿出花绸子，让隔壁的姨妈为自己梳小辫。

成都这个城市，历史上就历经辉煌，到民国时期仍然是一个人口聚集、商业发达的大城市。城里街道和小巷密布，交织成一个圆形。有人说成都的街道是依照八卦图建造的，所以很少有笔直的马路，和北方城市的街道相比，不好辨认方向。

成都的历史古迹很多，特别是武侯祠，终日香火不断，什么样的香客都有。城市虽然繁荣，灯红酒绿的，但路灯下边的乞丐也一堆一堆的，正像杜甫诗中描写的那样：“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街道店铺后面有很多穷人的房屋，大都是用竹子拌泥建造的，单薄而简陋，甚至一条条墙缝干裂得像挂着的帘子。可是，有钱人的房屋却大不相同了，那都是用青砖垒砌，还有大大的庭院。看过巴金笔下的《家》，就不难想象出成都有钱人家“家”的模样了。

我外婆的家在成都算是中等水平，房屋是砖头垒砌的，房间也多，但是没有大庭院，也没有花园。因为成都经常阴天多雨，房间里总是暗暗的，显得很陈旧。所

以，我们最喜欢上街，去领略阳光，欣赏繁荣。可是，由于外婆是小脚不能走远路的缘故，我们不得不经常打消和外婆上街的奢望。

外婆把我领到熙熙攘攘的街上，此时的阳光非常明亮，甚至觉得有点刺眼。外婆给我买了些小食品，说是带我去公园玩耍，这下把我乐得一蹦老高。到公园后，外婆颠着小脚，带我来到一面贴满花花绿绿的公告的墙前停下，然后向四下里看看。我被她这神秘的举动搞得心里惶惶的，不知外婆要做什么事情。

外婆等身后一群人走过，拉住我，用指头指着墙中间一幅漫画告诉我：“那猪是指你的爹爹，猪身上的毛是指的毛泽东。”我打了一个愣，但很快明白了：这是一幅国民党当局谩骂红军领导人的漫画，题目叫做“红军的猪毛”。反动派将爹爹的姓氏侮辱成“猪”！不过，我第一次知道了朱德和毛泽东合称“朱毛”，以前还以为是一个人的名字呢！

外婆又悄悄带我到另外一张画前，指指上面有两个人像的告示说：“记住！这上面有大胡子的那个人就是你的爹爹。”

我心里顿时扑通扑通地跳了起来！这就是我的爹爹？！

我赶紧上前细细看。这是国民党当局的悬赏告示，上面画了两个人的像：一个是爹爹朱德，他脸上有大胡子，鼻子大大的，眼眉很黑。不知什么原因，一看这个像，就

觉得特别面熟，好像在哪儿见过，这可能是和我长得像他有关。另一个是毛泽东，他们俩人被国民党悬赏 5 万大洋！好家伙，这么值钱！

我开始为爹爹担心起来，扬头问：“爹爹不会被抓住吧？”

外婆怕我再多问，被人发现，连忙拉我就走。回家后，我看见外婆的神色有点忧伤，闷闷的。当时的我是无法理解一个长辈为晚辈人担惊受怕的心情的。因为朱德不仅是红军的领导人，更主要的是她外孙女的父亲。所以，外婆比我更担心爹爹的处境！

这一夜，我第一次在梦里见到了父亲的身影，梦见了从来没有见面却十分熟悉的父亲。好像爹爹要走了，把我从膝盖上抱下，放在地上。地上很冷，我被冻醒了，一看，是被子掉在了地上。从梦里一醒来，顿时觉得心里空落落的，忍不住流出了泪，竟幼稚地想：如果爹爹被国民党抓住，就叫外婆拿 5 万大洋把爹爹赎回来，再不让爹爹走了，让爹爹和我在一起，一块儿在果园劳动。

在我的记忆里，这是第一次有了父亲的模样。尽管是在一张悬赏图上认识的父亲，但是这个形象在我幼小的心灵中却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象，以至在我 14 岁第一次看见父亲时，便能一眼就准确地把他辨认出来。

我的名字上了失散子女的名单，我来到了周恩来伯伯和邓颖超妈妈面前

我平静的童年时光一直持续到我 11 岁那一年。

1937 年 7 月 7 日，抗日战争在中国全面爆发了。战争！战争！战争的枪炮轰隆隆地碾压了大半个中国，东北沦亡，华北陷落，上海失守，南京血屠。接着，战争的大火又逆江而上，猛烈地燃烧，烧到武汉时，血战又一次爆发……

和湖北相邻的四川开始惶惶不可终日。这时，蒋介石将国民党政府从南京搬到山城重庆，多少稳住些四川父老乡亲的情绪。

随着侵略战争的不断升级，不断扩大，原以为有秦岭险阻便是装进了“保险箱”的成都，也开始如惊弓之鸟，惶惶起来，整个城市笼罩在战争即将来临的恐怖气氛中。谁都没有心思去做活路，茶馆里侃龙门阵的老汉们虽然还经常聚聚，但已经失去了往日的诙谐和幽默，个个神色紧张，好像炸弹随时都会落在头顶上似的。有钱人家都在想法外出避难。可是，偌大的中国到处都燃烧着战火，往哪儿去避难呢？相反，成都倒成了许多沦陷城市难民的避难场所，他们把学校、机关、团体陆续疏散到了成都四周的山区里。

姨妈自然也被战争的紧张空气搅和得没心思再去顾

及那些果树，眼睁睁看着果实成熟，掉落满地，却没有人去卖，也没人来买。果园的秋天再也看不到以前那种繁荣的模样了。

我在外头听人议论说，红军已经改编成八路军，开赴抗日战场，八路军总司令叫朱德……那不是父亲的名字吗？听到这些消息，我心里很自豪。要知道，他们眉飞色舞谈论的人就是我父亲哎！

大概和我特殊的身世有关系，我从小就比较文静，从不在外面多言多语，什么事情也不张扬，也不喜形于色。听到大人的谈话总喜欢暗暗琢磨，然后记住了回家问外婆。每次外婆听完我的讲述，总是叮咛我不要再告诉别人，更不能对别人讲自己是朱德的女儿，防止坏人知道了抓走你。当时我觉得外婆太胆小。父亲已经是八路军了，是抗日的队伍，连成都的报纸都称赞八路军抗日有功，为什么不能说我是朱德的女儿？

外婆叹口气：“你太小，不懂得什么叫政治。”

我看看外婆忧郁的神情，想想外婆这样说一定有她的道理。以后证明，恰恰是外婆的谨慎才使我免遭国民党反动派的毒手。

有几天，我看见外婆和姨妈老是出去，回来后就愣愣地望着我出神。有时我问她们话，都好像没有听见。

“他们是怎么知道的……”外婆一边自言自语，一边做事。

我觉得外婆的反常举动一定和我有关，就老是追问

不休。外婆只好告诉我，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来了个周先生，就住在城里的旅馆里。周先生是你父亲托的人，要接你走，去陕北。你说外婆舍得你走么？别说你才12岁，就那个穷山沟的生活你怎么能过啊？

姨妈接嘴说：“周先生是共产党的领导人，他亲自来成都接你，说明你是共产党很重要的娃娃哎！”当时，姨妈是地下共产党，重庆八路军办事处能找到我，还是姨妈他们地下党起的作用呢。

原来，总觉得父亲对我的亲情是那么的遥远和缥缈；今天，突然听说爹爹派人来接我到身边，一下子，爹爹变得实实在在，好像伸手就能摸着一般，心里一阵阵滚动着热流，不知道该怎样回答外婆和姨妈。

后来我才知道，八路军办事处利用重庆的合法机构，秘密寻找红军主力转移时留在白区的革命后代。我的名字也上了这个失散子女的名单。八路军办事处的叔叔伯伯们为了寻找我，费了不少心。特别是代表中国共产党和蒋介石谈判的周恩来伯伯，亲自向成都地下党交代了寻找朱德女儿的任务。

许多红军将领的孩子都是这个时候找到的。刘少奇的女儿和我是差不多同时找到的。她当时处境比我差多了，已经被卖到人家当童养媳。当她被救出虎口见到父亲时，刘少奇这个轻易不动感情的人，也难受地抚摸着女儿骨瘦如柴的手臂，说：“孩子，你怎么这样瘦啊！”

和父亲同在德国留学并且给迷茫的父亲指明革命方

向的周恩来伯伯，非常了解父亲当时在德国的生活情况，也知道我的存在。他一听到成都地下党汇报说朱德的女儿已经寻找到了，就立即向在太行山八路军总部的父亲发去一份电报，告诉这一喜讯。随后他和邓颖超妈妈亲自来成都接我去延安。

这一天，天空飘落着绵绵秋雨。马车在通往城区的稀泥道上行驶着。我觉得有点儿紧张，手心密密渗出了汗。我外婆和姨妈带我去见周恩来夫妇。我们到了旅馆，刚进门，便看见一个眉毛很浓很黑，身穿背带西裤的英俊中年男子从里间走出来，热情地请我们进去。我在大人身后想：这可能就是外婆说的周先生吧。

不一会儿，一个面目很和善的夫人也从里间出来。姨妈推推我，说：“叫周伯伯、邓妈妈。”我怯怯地叫了一声。邓颖超妈妈高兴地把我拉到她的怀里，拢了拢我额前的头发，细细地看着我，说：“你很像你的父亲，不过你父亲可没有你白啰……见过爹爹吗？”

我摇摇头。

“想见他吗？”

我点点头。

邓妈妈笑了起来，对周伯伯说：“看见这么漂亮的女孩儿，老总还不知道该怎样高兴呢！”

“你外婆舍不得你离开她。我们和你爹爹商量了，同意你留在成都继续上学。你要好好学习，长大了要建设我们的新中国。记住了吗？”

我又点点头。

不能去见爹爹，心里有点儿遗憾；但一想到能和外婆在一起，立即又有了一种安全的感觉。

好心的外婆让我又缩到她的羽翼下，保护我继续在原来平静的轨道上运行，但这种平静的生活只维持了两年。

1940年夏季，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外婆只好泪流满面，忍痛改变她舍不得我走的想法，由不让我离开她到让我赶快离开她。

这时，我一个小小孩子的命运和国共两党合作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姨妈被国民党抓走，她一口咬定：“她是我的女儿。”

蒋介石看到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活跃在敌人后方，建立了许多敌后根据地，这好比在剜他的心头肉。蒋介石开始找茬子和共产党制造矛盾，想遏制共产党抗战的力量。国共两党关系一天比一天紧张，抗日统一战线面临严峻的考验。

外婆每天都看报纸，看到国民党指责共产党这也不是那也不是时，便开始担忧我的安危。这时，我已经考入成都最好的公立中学——协进中学念书。外婆怕我被国民党发现真实身份，想让我在家休学一段时间，躲躲

风头。

可还没有等到我休学回家，姨妈突然失踪了……

记得那天晚上，我和表妹都很害怕，依偎在外婆的大床上，望着窗外漆黑的夜空，觉得那些传说中的鬼啊怪的都拥拥挤挤在我们的窗户下。我们吓得连灯也不敢关，竖着耳朵听着外屋的动静。外婆一人无声无息地坐在外屋的太师椅子上已经很久了，她在等下午就出门寻找姨妈的姨夫回来。可是我们听了很长时间，窗外只有沙沙的树叶声和夏虫吱吱的叫声，还有我们认为是鬼怪走过的那种窸窣的响声，有关人的响动却一点也没有。

也不知道姨妈出了什么事了，我们和外婆等呀等，等到我们睡着了也不见姨妈和姨夫归来……

第二天清晨，姨夫回来了。他的脸色很不好看；一进门顾不上和外婆说话，直奔我跟前，对我严肃得像对一个大人讲话那样，说：“以后无论谁问你的父母，你都讲我们是你的亲生父母，千万不要讲自己姓朱！听到没有？”

我连忙点点头。其实在我的心中，他们一直都是我的亲生父母。

外婆着急得直拍大腿：“到底出了啥子事情啰？你快讲呀，吓娃娃作啥子？”

“没有什么……大事……”看样子姨夫是想瞒外婆。

“不行，告诉我，究竟出了啥子事！”外婆又用她特有的口气命令姨夫。

“是……警察署把……人抓走了……”

“为啥子……啊？”外婆高叫一声，一把抓住姨夫的手。

姨夫看了我一眼。我顿时敏感地察觉到姨妈被抓肯定和我有关系！

“是不是那些龟儿子知道了我们飞飞的身世？”

飞飞是我在外婆家的名字。

“不，他们只是怀疑飞飞的爹爹是朱德，因为没有证据，他们还不敢肯定。不过，我们一口咬定飞飞是我们亲生的，他们也没有办法。您就不要担心了。”

“把高捷叫来！”外婆一扭头，果断地命令道。

高捷是我的表妹，她还在里间的床上睡觉。

高捷被他的父亲从被窝里叫醒，外婆一字一顿地告诉还懵懵然的表妹：“高捷，你听外婆说，以后无论哪个问你，贺飞飞是不是你的亲姐姐，你都要讲是亲姐姐，记住没有？”

表妹从小就很机灵，她一看大人模样，就明白出事了，眼睛一下子瞪得滚圆，懂事地直点头：“外婆，你放心，我不会乱讲的。”

外婆向所有在场的人都一一作了交代，才松了口气，慢慢坐了下来。这时，我看见外婆那尖尖小脚脚面胀鼓得油亮油亮的，可能外婆这一夜都是在这张木椅上坐着的。

为了我，我的姨妈现在生死不明，外婆担惊受怕累

成这个样子，姨夫也是疲惫不堪，就连年幼的表妹也学会了严守秘密。我心里恨恨地想，那些坏蛋要对付我就冲我来好了，何必这样折磨姨妈他们呢？

这时，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情。前天，我上学时，在路上有两个陌生人从后面追上来，问我姓不姓朱。我不认识他们，没有回答他们，赶快走开了。外婆知道这件事后更加紧张，两眼老是盯着大门，好像那些人就在门外面，随时会冲进来把我抓走一样。

我们一家老小在惶惶不安中又度过了一个白天。

姨妈还是没有回来！

晚上，外婆仍然不肯回里屋休息，她要亲眼看见姨妈从大门走进来。半夜，外婆终于支撑不住了，进来轻轻睡在我们身边。好一会儿她还在翻身，一会儿又用手摸摸我的头。我闭着眼睛装睡，心里涌上的哀痛使得泪流而下，冰凉的泪水顺着太阳穴流进了耳朵里。

第二天一早，外婆在被窝里对我说：“飞飞，外婆不能再留你了。你姓朱，是朱家的后代，是共产党的娃娃。万一被那些龟儿子警察知道了你是谁的女儿，外婆担待不起啊。我怎么向你爹爹交代……怎么向周先生和邓女士交代……我更对不起你死去的妈……唏。”外婆吸了一下鼻子，哽咽着声音说到这里，她扭过视线，避免和我眼光对视，仰头望着洁白的帐顶。

这是我第一次听见外婆说到我的母亲。

我看见外婆眼角挂着泪水，也不敢多问妈妈的情况。

也不知是我年龄小，还是和母亲没有感情，听见母亲死去的音信也没有感到悲伤。可这对外婆来说就不一样了，母亲是她十月怀胎，亲手抚养大的亲生骨肉。白发人送黑发人，这是人世间最残忍的事情。

我知道，我再留在外婆身边，会更加连累贺家所有的人。所以，外婆一说让我离开成都，我马上点点头，起身后便开始收拾自己的东西。我心里默默祷告：只要姨妈能平安回来，就是到再远的地方我也愿意！

“我妈回来了！我妈回来了！”院墙外传来表妹的欢叫声。我飞一般跑向大门口……这是我原来那个漂亮的姨妈吗？我惊呆了……

站在我们面前的姨妈，头发凌乱不堪，脸色很苍白，连走路也不像以前噌噌有力了。她拖着疲惫的身躯走进屋，重重坐在椅子上，微微闭上通红通红的眼睛。

我们慌作一团。我一下子抱住姨妈的脖颈。“他们打你没有？”

姨妈睁开眼，望见我要哭的样子，扑哧笑出了声：“姨妈这不是好好的吗，你这个笨娃娃哭啥子？”

姨妈喝了点水，有了点精神，向我们讲述了她被国民党警察抓走的经过。

“这回，龟儿子们没有捞到便宜！他们非说飞飞是朱小姐，我就非说飞飞是贺小姐。他们说朱德的女儿在我们家，我就说我不晓得朱德是谁。他们说飞飞就是朱德的娃娃，我一口咬定飞飞是我亲生的。他们气得七窍冒

烟，拿我没有办法。我对他们说，你们不信我的话，就去我女儿的学校问问，她的父母是谁？有没有其他的姓？那几个家伙大概去了飞飞的学校，也没有捞到什么把柄，只好把我给放了。”

看姨妈那飞扬的表情，哪里像是在警察局遭受折磨，好像外出旅游了一趟一样，滔滔不绝地讲她如何把那几个笨蛋警察骗得滴溜溜地转。

“你不要大意，他们不会善罢甘休的。既然把你抓去，他们肯定是听见什么风声。飞飞这几天不要出去，我们赶快想办法让她离开成都。”

外婆一点儿也没有笑。

姨妈通过地下党的关系，向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报告了我的危险处境。不几天，邓颖超妈妈从重庆又一次秘密来成都。这一次，外婆立即带我去和邓妈妈见面。因为姨妈有了这次惊险的经历，她担心她地下党身分万一暴露，肯定会连及她的女儿。为了孩子的安全，她决定将她唯一的女儿贺高捷也送走，和我一同去延安。

我和表妹带着行李到了邓妈妈住的旅馆后，外婆怕看见和我们伤心离别的场面，就假说她小脚爬楼慢，她一个人在后面慢慢走，让我们先上去。可是等姨妈把我们送到邓妈妈房间后，好一会儿也不见外婆上来。姨妈说她下去看看，接着她再也没有上来。这时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外婆和姨妈用这样看不见眼泪的方式告别了我们！

有表妹和我在一起，我并不觉得孤单。可是和我们姐妹相依为命十多年的外婆和姨妈，以后她们怎样打发这寂寞的时光？会怎样地思念我们呢？遥远的延安在外婆和姨妈的心头上会留下如何沉重的牵挂呢？

当时，我们都不会体会思念的深刻含意。等到我们有了孩子，孩子要远离身边时，才知道这种思念是多么的沉重和揪心。



第二章

北上延安

- 我装扮成一名战地小护士，
开始了北上的旅途
- 爹爹是个一脸大胡子的总司令，
他不让我直呼毛泽东的大名
- 抗日战争进入最艰难时期，
爹爹却对和平充满了希望
- 我们几个孩子秘密出国，
途中历经磨难

我装扮成一名战地小护士， 开始了北上的旅途

我和表妹离开果园、离开亲人时，正好又是一个秋满人间的季节。成都街道两旁的树叶黄了，墙根下的小草萎了，园圃里的花朵蔫了。战争给这座城市带来的经济的萧条似秋天的萧条同样令人心悸，让人们无时无刻不在体会战争的危机，不在呼吸战争的硝烟。尽管这座城市还没有完全投入战争的碾子之下，但不时鸣响的空袭警报声足以让所有的成都人体验到战争的恐惧。

从日军开始攻占中国东部、中部和南部省市时，就对西南的四川垂涎三尺了。然而，日军的陆军部队对这个高山围绕的大盆地却是鞭长莫及，于是便多次出动轰炸机从空中投掷涂炭生灵的重磅炸弹，地面战争转换成天上空战，使得无辜的平民遭受祸从天降的轰击。在一声声剧烈的爆炸声中，许多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那山河破碎、家园毁灭的情景十分凄惨。

记得为了躲避空袭，外婆和姨妈曾经带我们到山城重庆避难。谁知，重庆的情况更糟糕，空袭更频繁，一次空袭中，被活活憋死在防空洞里的就达近万人之多。外婆一见，知道这战争灾祸躲到哪儿都是躲不掉的，干脆听天由命，不躲了，又带我们回到成都。

等我们回到成都，我们果园里那些需要人们培植的

果树，已经错过了嫁接期，满园的果实变成了良莠不齐、大小不一的野果子。无奈，姨妈只好随它们自由“落体”，自生自灭地腐烂，又掉在地上。

外婆和姨妈不仅要承受一个没有收获的秋天，而且要面对没有孩子喧闹的空荡清冷的岁月。这是一个刻骨铭心、让人何等伤心的秋季啊！

我们离开家后，成都形势依然很紧张，国民党便衣警察四下里打听共产党人的行踪。这时，和姨妈单线联系的接头人也被国民党杀害了，姨妈失去了和党的联系。成都地下党为了保护邓颖超的安全，在我们姐妹到达旅馆的第二天，就安排我们离开了成都。

尽管这条去延安的路线充满了危险，但这是我们唯一能远走高飞的路线。

我们先和邓妈妈去重庆，然后再沿长江而下，到湖北武汉改乘火车到西安。这一段路线比较快捷，但是危险很大，特别是经过沦陷的武汉，随时会有被日军抓捕的可能。只要能平安抵达西安，再以后的路程就安全多了。不过这最安全的路线却是全程最艰苦的路程，需要我们双脚步行，走过数百里的山丘地带。

这条周折的北上路线在当时来说，除了航空外，地面上就仅此一条通道。

离开成都这天，正好天空又飘下毛毛细雨。城市好像笼罩在雾纱帐中，空气显得格外的湿润。我们乘坐的汽车驶过成都市区时，我突然发觉细雨蒙蒙中的城市很

生动，行人们穿着各种颜色的衣服，特别是女人的旗袍更加绚丽多彩。大家手里举着花花绿绿的油伞，从花花绿绿的店铺前匆匆行过，就像一个个滚动的蘑菇，把并不宽阔的街面点缀得满满的。其实，我上学经常看见这种景色，可从没有注意过，只是在要离开它的今天，我隔着湿淋淋的车窗才发觉我生活的这个城市是这样的让人难割情恋。

我觉得心里很堵，想摇下车窗……可手被一只柔软温暖的手轻轻按住了，是邓妈妈。她平静地揽着我和表妹，说：“不要开窗，这样外面的人会看见我们。等一会儿，离开市区，再开窗好吗？等你们到了延安，就可以尽情地呼吸自由的空气了。现在还必须忍耐忍耐，孩子们！”

延安？我于是胡思乱想地琢磨着，如何离开成都飞向那块遥远而神秘的地方！

我不知道和我以后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延安会是什么样子。从上学时的课本上仅仅知道一点地理知识，比如，陕北属于中国北部的黄土高原，土壤是黄色的；流过的黄河水也是黄色的；气候干燥，风沙大。还知道黄土高坡的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发源地，有许多神奇的传说。一时间，我脑袋里都是对黄土高原美好的遐想，好像我不是去安家落户，而是去作一次奇特的旅行，满心的好奇和冲动。一想到爹爹，心里更是激动：他是什么样子？一身笔挺的军服？个子是高还是矮？是胖还

是瘦？他会像同学的父亲那样喜欢自己的孩子吗？他不会发脾气打人？……我越想越多，越想越觉得时间过得太慢，什么时候才能到延安啊！

等我到了延安，走进窑洞，才知道我一路上的遐想不过是幼稚和天真的产物。延安的生活很艰苦，环境气候也很恶劣。黄土高原在揭去它的神秘面纱时，露出的不仅是它荒凉的面容，还有它那博大的胸怀，像一个贫穷善良的母亲，用她的乳汁无私地抚育自己的儿女。在我们到达延安前，延安已经成为全国各地青年人向往的地方，成为拯救中华民族的希望圣地。许多年纪很小的孩子千里迢迢从沦陷的城市来到延安。他们小小的身影和肩头沉重的长枪，稚嫩得那么雄壮，那么令人感动！我也恨不得冲进队伍里，像他们一样，扛枪上战场。为这事，我没少向爹爹央求，最后还是没有能如愿。这让我难过了很久。

现在，一路上我默默无语，脑袋里却不断地折腾。

好容易打发了十多个小时的旅程，到了重庆郊区一个疗养院，我们下了车。邓妈妈说这是八路军办事处的房子，很安全，会有人照顾我们的生活，让我们安心等待去延安的通知。过了几天，又来了几个去延安的孩子和几个护校毕业的学生，共有十多个人。这时，八路军办事处的叔叔让我们去延安的孩子跟护校的学生学习战地救护知识，要求我们也要像真正的护校学生，而不能让人一眼就看出是假冒的。到临出发的那天晚上，又给

我们换上了八路军军装，这可把我们高兴坏了，一跳老高……

“唉唉……这是为了你们安全通过国民党占领区临时用的，到延安后军装要收回的。记住别搞破了。”

顿时，我们像泄了气的皮球：搞了半天，我们还不是八路军啊？

“你们在路上谁都不能公开自己的身分，大家统一使用‘重庆护士训练班毕业生’证明信，就说是到抗日前线工作。到武汉时，你们要格外小心，都不要穿军装，全部化装成回乡的学生，这是你们通过武汉日军检查站的良民证。”

我掂了掂这薄薄的却盖了许多印章的纸片，这可就是我们北上的“生命护照”，可得小心保存好！我那时已经14岁了，个子也不矮，加上圆圆的大脸盘，军装一穿还真有点阳刚之气呢。可看看身边12岁的表妹，就惨了：军装像袍子一样，呼啦呼啦的，那张清秀的小脸显得更小了。不过，表妹那勇敢的神情倒是像一个随时准备上战场的战士。

带我们去延安的是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的叔叔。深秋这一天，我们开始了北上的漫长路程。因为我们有国民党统治区的通行证，通过沿江几个城市都没有遇到什么麻烦。国民党哨兵对我们几个娃娃护士也没有产生什么疑问，大概是奔赴抗战前线的孩子太多了，哨兵已经司空见惯了，对我们自然也不另眼相看了。他们看了我们

的证明信后又简单问了几句，就大手一挥——“走吧！”

到了武汉，我们就很小心了。街上到处是日军的摩托车，整个城市断墙残壁，破破烂烂的，行人也很少。我们一步也不敢离开旅馆。这是我们地下党开的旅馆，由他们给我们购买火车票。还算好，我们终于平安离开了武汉，登上了去西安的列车。

从离开成都起，我们便开始学着照顾自己，学着做饭，学着吃面食和粗粮。长到14岁，第一次出远门，许多事情都不懂，吃了不少苦头。但是，这两个月的旅程是我一生中学习东西最多的两个月，为我以后经历磨难、承受打击，奠定了坚实的心理基础。

离开西安后，我们就开始步行了。西安一带是陕西最富足的地区，有“八百里秦川米粮仓”的美喻。延安在西安的北部，地理条件相差很远，越往北就越荒凉，沿途人烟稀少，山里除了野兽出没外还常有土匪活动。有时我们为了躲避敌人的密探，只能夜间行军。我们都是十多岁的孩子，正是爱睡觉的年龄，在黑里咕咚的小山道上走着走着就一头栽倒，睡着了，搞不好，就掉队了。如果掉队，是很可怕的，等大家发现后，一般天都快亮了，再去找，危险就很大。掉队的人如果不被野兽或是国民党军的巡逻队发现就算阿弥陀佛了。前不久，就有人睡着掉了队，被狼群给撕碎了，等找到时只剩下一堆白骨和衣物。

带队的叔叔怕我们掉队，老是前头后头地喊。最后

他想了一个办法，用绳子把我们的膀臂连起来，谁要是睡了，马上就会被别人拉醒，绝对不会有人掉队的。

就这样，我们走了 300 多里路，带着一脚的血泡和又黑又瘦的脸蛋儿来到了延安的宝塔山下……

爹爹是个一脸大胡子的总司令， 他不让我直呼毛泽东的大名

1940 年初冬，延安已经开始下雪，黄泥路上结着薄冰。我们一群穿得鼓鼓囊囊的孩子坐在通往杨家岭的马车上，说那里是中央机关住地，我的爹爹就在那里的窑洞里住。来接我们的叔叔阿姨听说我是朱德总司令的女儿，一拍巴掌，说是太巧了。我愣愣地看着他们，不知“巧”在哪里。

“朱总司令一直在太行山指挥部，昨天才回来开会，可你今天就到延安了。你们父女俩像约好似的，不是太巧了吗？”

真是太巧了！我也开心起来，忍不住扬头朝前张望，杨家岭到了没有？

马车驶进杨家岭山坡下的坪坝。这时，我远远看见一个打着绑腿、一身灰色军装的中年男人站在山坡上。猛然，我觉得我的心咚咚地跳，那是我爹爹！对！是爹爹！不知怎地，我一路上为如何开口叫第一声“爹爹”的担忧化为脱口而出的呼唤声。

“爹爹——爹爹——”

毫无疑问，父亲也一眼认出了我，只见他匆匆跑下山坡，身后扬起了一串尘土。他来到马车前，一把把我从车上抱下来。那时我还小，看不出父亲激动的表情。现在想想，此刻的爹爹该是多么的激动！原来我还想说几句问候爹爹的话，可是在爹爹的怀里，我却哭了……

父亲用大手抹去我脸上的泪水，用温和的口气像哄孩子那样哄着我：“不哭啦不哭，现在应该笑啊！要知道啊，好多的娃娃都没有活到看见爹爹妈妈的那天……”

14岁才认识自己的生身父亲，才听见他说话的声音，这是我人生经历中最难忘、也是最伤心的事情。

爹爹拉着我的手走上杨家岭的高坡。山坡上有一排排的窑洞，窑洞外还有一个用土垒的院墙。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他们的窑洞都挨在一起。爹爹的窑洞要往东一点，是一个凹形的山坡，窑洞外面的庭院特别大，还有几棵大榆树，大树下面有一个低矮的石板桌子，上面刻着象棋棋盘。这是爹爹天天要温习的“功课”——下棋。

康克清妈妈——这是爹爹的妻子，她站在窑洞外面，看见我和爹爹，也跑了过来，拉住我的手，问长问短。她听见我说的也是四川话，就对爹爹说：“老总啊，这孩子很像你啊，连口音都像哎。”

爹爹高兴得直拍我的肩头，手重得像检验一个战士是否合格那样。

爹爹和妈妈连说带拉把我领进窑洞里。他们让我上炕，说是炕上暖和。因为我们一路上都是住的窑洞，我已认识了黄土高原这一特有的居屋，也睡过长炕，所以到了爹爹的窑洞，觉得这窑洞比路上我们住的要大，光线也亮，而且还有套间。

到窑洞里我才敢细细看爹爹和妈妈的样子。噢，爹爹原来是个大胡子！黑黑的胡茬子密密铺在两腮，再加上黑眉毛、黑眼睛和一头黝黑略曲卷的黑发，给人的印象是很像祖祖辈辈没有离开田地耕种的农民，而不是指挥千军万马的总司令。他朴实却很威严，像饱经风霜的硬汉子那样，浑身洋溢着坚定、从容和成熟的气息。

康克清妈妈则脸色红润。她留着短发，圆脸，大眼睛，长得很精神。她自己没有孩子，一看见我和表妹，亲得和见到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又是忙吃又是忙穿，生怕我们饿着冻着。

在这样的爹妈跟前，我能不幸福吗？

原来我以为爹爹把我的生日和小时候的事情都忘了。哪知，他不仅记得我的生时的事情，而且还记得我的生日阳历是什么时候，阴历是什么时候，一清二楚的。他还把我排进朱家的家谱，起名——朱敏书。“书”就是我们这一辈人排行的字。我有个哥哥，就叫朱宝书，他在我前头来的延安，也是和我差不多时间由地下党找到的。

这时我才知道，这14年里，爹爹想我也想得很苦。如果不是为了革命，为了全民族的解放，他说什么也不

会离开自己的亲生骨肉。

到延安的头几天，爹爹希望我能多了解他，缩短这14年的感情距离。他向我讲述了他的经历。爹爹的家乡在四川仪陇。他是一个农民的儿子，而且是一个人口很多、家境十分贫穷的家庭的孩子。因为贫穷，家里只能供一个孩子读书，爹爹有幸成为全家人整日劳动供养的读书人。爹爹的求学道路十分艰难和痛苦，眼看就要出人头地了，爹爹突然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带着“为中国摆脱清朝和外国压制而献身”的誓言，投笔从戎，希望用武力振兴和捍卫自己的国家。

在爹爹这代人身上，几乎不用翻阅历史，他们的脚印就是中华民族的反抗史。

从辛亥革命到讨袁护法，到北伐战争，到和国民党政府一刀两断，爹爹他几乎参加了中国近代革命史中所有的运动。可是身为将军的爹爹却比任何时候都要彷徨，他苦恼，他失意，他为之奋斗的救国使命未能扭转乾坤，军阀混战不止，百姓仍然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爹爹沉痛地说：“那些日子不好过，我感到绝望。我是一只脚站在旧制度中，另外一只脚在新制度里找不到落脚点。你想，一个人用一只脚站立是不是很累、很容易跌倒？没有办法解脱我的苦恼，就只好去德国求学，因为那里是伟大哲学家诞生的地方。”爹爹当时没有说德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故乡，估计说这个给一个小孩儿听，也是白说，不会明白的。

1922年9月，爹爹和他的朋友踏上了出国留学的旅程。他把希望寄托在外国土地上，去探寻解救中华民族的希望和真理。在异国他乡，他遇见了在柏林的周恩来。从此，他的命运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在一般人眼中属于旧式军阀的人，如果不是经过痛苦的挣扎和血迹斑斑的探求，绝不会作出这样的选择。

年近40岁的爹爹好像生命刚刚开始，他以极大的热忱献身于中国最壮丽最伟大的革命事业。他和毛泽东在组织工农武装起义、率领工农红军和国民党反动武装的斗争中，有过挫折，有过困苦，有过失败，但他对共产主义事业始终没有怀疑过，没有退缩过，更没有后悔过。

爹爹向我讲述这些往事时，用着非常平缓深沉的语气，讲述时还不时停下来问我懂不懂，见我点头，他才接着讲；如果我不点头，他就要用通俗的语言再讲一次。尽管我对爹爹讲的许多事情似懂非懂，但我仍然看得出来，爹爹他是多么热爱他所追求的事业，热爱他的军队，对反抗侵略充满了胜利的信心。

爹爹有许多军务缠身，不能老陪我，有时晚上和我坐在炕头上谈会儿话，但一会儿就有人送电报，谈事情。我常常是睡了一觉，还看见爹爹门帘下面透着灯光。

大概在我到的第三天，毛泽东伯伯来爹爹窑洞里看我们。

毛伯伯还没有进门，就听见他在外面说：“听说朱老总的千金来了，好几天了，我都没有时间来看看是啥个

样子。”

我原来在报纸上和国民党悬赏图上见到过毛泽东的画像，今天突然看见真的毛泽东，便好奇得忘记了礼节，连连高叫：“爹爹，毛泽东来了，毛泽东来了……”

毛泽东身披灰色棉大衣，个子好高好大。他幽默地拍拍我的头，说：“吆，才来就给你父亲当小通讯员了。”

我天真地问：“你是真的毛泽东吗？”

“噢！难道还有假的毛泽东？”毛泽东一脸惊讶，反问。

我正想说成都街头悬赏图的事情，爹爹从里间出来批评我：“怎么这么没有礼貌，要叫毛伯伯！”

毛泽东制止爹爹，说：“小孩子说话无意，不要批评她了。”

那天，毛伯伯问了我许多事情。当我说到我是从国民党的悬赏图认识的“朱毛”，毛伯伯笑得前倒后仰的，“朱毛那么值钱？早知道，我们自己揭布告去国民党那里领5万大洋啦，哈哈……”

毛伯伯走后，我问爹爹：“你不是说毛伯伯比你小，为什么不要我叫他叔叔，而是叫伯伯？”

“叫伯伯是一种尊重的称呼，不能用年龄大小来衡量一个人，更何况毛伯伯是一个伟大的人。”

我到延安才一个星期，爹爹开完了会，又要去太行山八路军指挥部了。我和康克清妈妈送他很远很远。我默默地想：我们才见面，转眼又要分别，不知爹爹什么

时候才回来？

这时的我万万不会想到，更长久、需付出更高昂代价的离别正悄悄地临近……

抗日战争进入最艰难时期， 爹爹却对和平充满了希望

1941年，元旦刚过去，延安连下了几场大雪，有半尺多厚，老远就能听见走路的咔咔声。我早晨坐起来隔窗一看，吓了一跳：一夜无声无息，天地竟然换了个颜色！近处、远处，山坡、坪坝、梯田、马路全被白雪覆盖了，原来那些美的和不美的东西全染成洁白的颜色，显得天地如此庄重和素洁。我和表妹在成都很少看见下雪，这下看见这么厚的雪，简直兴奋极了，一早就跑到院子里堆了一个大大的雪人。我们用竹筐给雪人做了顶帽子，又用黑石子安了两只眼睛，表妹进屋拿了一个红色的酒瓶盖嵌出一个圆圆的嘴，好像受凉要打喷嚏一般。鼻子呢？用什么做呢？我看见窑洞门外挂着一串串红辣椒。这是陕北农村家家门口都悬挂的食物，原来以为只有四川人吃辣椒厉害，看来陕北人也不逊色！我看见毛泽东伯伯家的门口挂的红辣椒最多，有时还看见他自己从上面往下捋，装进外衣口袋里呢，不知是不是在疲乏的时候，干吃辣椒提神？

我跳着脚从上面够着一个尖辣椒，把它插进雪人的

脸部中央，这不，鼻子有了。哇！我们好开心，越看越觉得这不是雪人，分明是我们看过的一个叫《木偶历险记》童话中的木偶。它那尖鼻子就是因为它不断讲假话而不断增高所致，最后变成了一个尖尖的红鼻子翘立在脸上。

晚上，我已经睡下了，突然听到院子里有人说话。我一看，是爹爹，他刚从太行山回来。他在皎洁的月光下，发现了这个雪人。他和警卫员好奇地围着雪人转了一圈。听见他们嘿嘿的笑声，大概是被这个雪人调皮的神情逗乐了。第二天，表妹在窗外像发现了新大陆似的大笑了起来，这是怎么啦？我跑出去一看，也忍不住跟着大笑起来：雪人嘴边竟然叼着一只已经燃烧了一半的烟头。

好啊！肯定是爹爹他们给安的香烟！

可是爹爹一早就去开会了，我屋里屋外找了几圈也没有找见爹爹的影子。康克清妈妈在中央党校学习，平时不回家。如果她在多好，让她也看看这个可爱的雪人已经成为“烟民”了。

晚上很晚爹爹才回来。我们的雪人经过白天阳光的照射，融化出许多的洞眼，夜里寒风一吹，雪人变成了硬邦邦的大麻子，面目全非。那“烟民”的俏模样全没了，一点儿也不好玩了。

爹爹可没有我的玩兴。他心事重重的，也没有心思和我说话，一进门就把自己关在里屋，看一大堆的文件和电报。没多久，毛泽东伯伯、王稼祥伯伯都来了。他

们的神色也很严肃，好像发生了什么事。毛伯伯摸摸我的头，说：“你爹爹整天看电报，不和你玩，你没有意见吗？”

我委屈地点点头：“当然有啦。”

“你大了，要懂事，要理解父亲的心情。”

我听说他一岁多的小女儿李讷，为了把他爸爸从桌边上拉出来和她玩耍，就躲在爸爸的桌子底下，把电报偷偷放到火盆上烧，以为这些电报烧掉了，爸爸就不会再看这些东西，就会带她出去玩了。要不是毛伯伯抢得快，电报早就化成灰了。

“你看，电报成了半页，是不是我们的战争也打了一半了……哈哈……”毛伯伯笑着弹弹手里已经发黑的电报纸。不过，他的玩笑真的成了预言，1941年正好是8年抗战进行了一半的时间。

接连几天，几乎是通宵，爹爹他们都没有休息，房间里飘出一阵阵浓烈的烟雾，好像里屋在生炉子。如果不是天气寒冷，空气收缩得快，真不知道爹爹他们几个“烟囱”一起冒烟会不会冒得失了火。他们的秘书和通讯员一会儿走进一会儿走出，忙得不亦乐乎。

过了几天，我才从他们谈话中知道，江南发生了皖南事变，新四军军部被国民党部队围剿，军长叶挺被扣押，军队被打散了，死伤了很多。难怪爹爹他们这么紧张，通宵达旦地工作。后来，新四军军部在江苏盐城又重新建立，刘少奇任政治委员，陈毅任军长。大概到

春节前后，新四军组建工作就有了头绪，稳定了军心，爹爹他们才轻松了一点，夜里能睡一会儿觉了。

一天晚上，父亲和我坐在炕上，他像对一个大人那样郑重地问我：“朱敏，你给爹爹说说，你以后想做什么？”我到延安后，爹爹就将我朱敏书的名字改为朱敏，说是好叫好写。

“当然当八路军啦，打鬼子啊！”我脱口而出。

爹爹笑了起来：“傻娃娃，我们要放眼以后的和平时代。我和你毛伯伯商量了，准备将你送到莫斯科国际儿童院学习，那是专为共产党国家的孩子而开办的国际学校。我们中央已经送去了许多的孩子。”爹爹又向我介绍有谁谁的孩子在那里上国际儿童院，又有谁谁的孩子也准备去。爹爹告诉我，这次让我去苏联学习是中央的决定，是为战争结束后作准备。我们这场反侵略战争迟早是要胜利，要结束的，和平会来到的。我们还要建设新中国，让人民过上好日子，那时我们国家将需要大量有文化有知识的专业人才。

爹爹说这些话时，情绪非常激动，好像胜利就在眼前，和平之鸽已经张开翅膀向他飞来一样，双眼闪动着希望的光芒。这是一个人渴望实现最崇高目标时才会出现的光芒，尽管追求的目标只有两个字——和平。

我看着对和平充满希望和憧憬的爹爹，天真地问：“你去不去？”

“我怎么能去？看看，都这么大了，还不能离开爹爹

啊？”

爹爹的眉头拧在了一起。

“等过了春节就走。现在，新疆方面形势很紧张，如果不及早走，就走不成了。”

尽管我是在莫斯科出生的，但对那块土地非常的陌生。我心里掠过一丝恐惧，真想对爹爹说我不去苏联，不离开爹爹……

“有一句话爹爹要嘱咐你，20岁以前不许谈恋爱，把精力放在学习上。你的体质差，容易生病，要想法把身体锻炼得强壮些。爹爹等你回来建设新中国！”

望着父亲期待的眼睛，我只好咽下了恐惧，装作勇敢，使劲地点了下头。

第二天，表妹知道我要去苏联学习，顿时泪流满面，哭着要和我一起走：“我和姐姐一起从成都来的，为什么不让我们一起去苏联。我也要去，我不离开姐姐！”

表妹的哭声让我更难受，也情不自禁地跟着哭了起来。康克清妈妈看见我们这模样，就责怪我们：“你们也是大孩子了，战士打仗要服从命令，你们要服从大人的安排，谁去什么地方不是谁想去就能去的。高捷，你在延安也是要学习的。我们已经安排你在延安学习。你们都有学习的机会，地点虽不同，目的却一样嘛。好了，学习是喜事，搞得这么伤心！多不好。”

好几天，表妹都噘着嘴。毕竟我们从小一起长大，从来没有分开过，感情很深。一说要分开了，我们心里当

然难分难舍。

春节过了没有几天，一架苏联轰炸机要返回新疆迪化（现乌鲁木齐）机场。爹爹和康克清妈妈，还有毛泽东伯伯一同送我和4岁的姣姣（毛泽东的女儿李敏）到延安机场。姣姣到莫斯科是和母亲贺子珍团聚。和我们同去莫斯科国际儿童院学习的还有王一飞烈士的儿子王继飞和罗亦农烈士的儿子罗西北。

我们4个孩子成为最后一批前往莫斯科学习的学生，以后这条通往苏联的通道被新疆军阀封锁了。

我们几个孩子秘密出国，

途中历经磨难

我们乘坐的苏联轰炸机不能直接飞出境，要在新疆停留。而新疆是国民党统治的区域，大军阀盛世才和共产党合作了没几天就翻脸不认人了，大肆逮捕共产党人。迪化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中，连八路军办事处这一合法机构也不是安全的地方。

爹爹和毛伯伯商量了几次，虽说让我们这样走有些冒险，但可以免除漫长陆路的辛苦和不测事件的发生。何况都是孩子，又没有大人护送，空中路线恐怕是最好的捷径了。

我们4个孩子一看见巨大的轰炸机，离别的惆怅和悲伤都消失了，兴高采烈地往飞机上爬，觉得真好玩，连

4岁的小姣姣也忙从她爸爸的怀中挣脱，要上飞机玩儿，完全忘记了离开父亲的恐惧，懵里懵懂地跟在我们这些哥哥姐姐后面东摸摸西摸摸，好奇极了。开始，我还看见爹爹和妈妈在身边给我们放行李，不一会儿，觉得飞机一阵颠簸，还没有反应过来，飞机已经腾空而起……没有一个大人在我们身边！

我赶紧回头寻找爹爹，爹爹也不知在什么时候下了飞机。我又赶紧从机窗向外张望，看见父亲和毛伯伯他们站在跑道边上。飞机几个盘旋，他们很快就成了黄土丘陵上的一个个小黑点。

父亲渐渐远了，延安渐渐远了，一个更加残酷的岁月却渐渐地临近……

我想，父亲脸上一定和以往一样平静，但父亲心里一定和我一样难受。

他可能不愿意看见女儿的眼泪，趁我们没有留神，离开了飞机；或许这样离别更好些，至少我给爹爹留下一个坚强的印象。可是爹爹不会想到，不久，女儿的命运将被战争抛进地狱之门，沦为法西斯集中营的小囚徒。如果爹爹知道女儿以后会遭受到同龄人没有遭受的折磨，他或许会改变主意，把我留在身边。

可是，命运无法预测，这是残酷的人生未知数！

飞机起飞不一会儿，一直乐呵呵的姣姣哇地哭了起来。原来她还在病中，已经拉了几天肚子。这会儿她的肚子又痛了，要拉肚子。我在孩子里年龄最大，又是女

孩子，看见姣姣那么难过，就上前帮助她。其他两个男孩也一起上来帮忙，用报纸当痰盂，七手八脚地折腾了半天，才将姣姣收拾干净。可是，从延安到迪化，要飞好几个钟头，又是轰炸机，颠簸很大，大人在上面都会头昏脑涨，更别说有病的孩子了。姣姣在颠簸的飞机上，捂着肚子，脸都变了颜色。可她忍着痛，泪汪汪地不吭一声。

我们已经被窗外茫茫云雾和未知的前程搅得心里颤颤的，不由得相依在一起，那孤独无助的情景至今都不能忘记！

好不容易到了迪化机场，问题又来了：机场上到处都是值勤的国民党兵。如果叫他们发现“朱毛”的孩子在飞机上，那不就全完了！非把我们抓起来作为向主子领功的战利品不可，至少也是蒋介石向共产党讨价还价的砝码。

苏联飞行员知道我们的身分。他们得到苏联政府的指示，必须将我们安全送到莫斯科，交给斯大林。可是我们一个个都是大活人，怎样才能离开飞机不被地面值勤的国民党兵发现呢？

这时，领航员想了个办法，将我们卷进行李背包里。正好我长得也小，很容易连头带脚埋在行李里，只要不动弹，是不容易被人发现的，再说谁会想到行李卷里卷的是活人？果然，地勤人员来扛行李卷时，谁也没对肩上的东西产生怀疑，吭哧吭哧地把我们扛到了汽车上。

姣姣最小，又闹病，大家都为她捏了一把汗。如果她动一动，或是发出一声，后果不敢想象。没想到姣姣从卷进行李卷到将她摔上行李车，始终没有出一点动静。

险恶的环境使年幼的孩子过早地懂事了！

终于，我们被顺利地转移到了八路军办事处。

为了避开国民党的耳目，保证我们的安全，八路军办事处的叔叔阿姨只能将我们白天关在房间里睡觉，晚上才放我们出来走动。他们怕附近有国民党的密探，万一知道了毛泽东和朱德的女儿就在迪化，他们会想方设法抓走我们的。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这时是新疆八路军办事处主任，后来被反动派杀害。在这里，我还遇见了周恩来的干女儿孙维世姐姐。她准备去苏联学电影导演，和我们一同等待出境的日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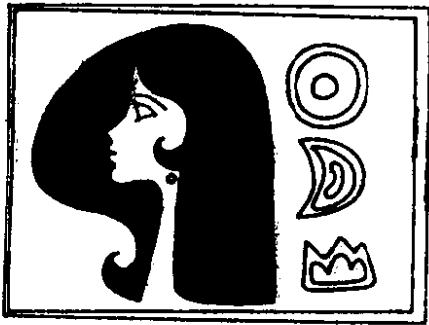
我们在新疆过了十几天昼夜颠倒的生活，终于可以去苏联啦！那天，车子驶过国界线的时候，我们受同车人的影响，也放声欢呼。其实，我心里并不欢呼，离开了祖国，离爹爹越来越远，有什么可欢呼的？

后来，我们又改乘火车，走了整整一个星期，才抵达莫斯科。很快，国际儿童院的中国老师把我们接到了离莫斯科 300 公里的伊万诺夫城。我们的学校就设在那里。

姣姣在车站被她的妈妈贺子珍接走。我们看见贺子珍远远叫着姣姣的名字，奔跑过来，一把将怯生生的女儿紧紧抱在怀里，生怕被人抢走一般。我真为姣姣高兴，

和妈妈在一起是人生最幸福的时刻。姣姣和我们相处了一个多月，倒是和我们依依不舍，走了好远还回头望我们。

后来，我离开国际儿童院到南方疗养，被德国鬼子抓到集中营后，4岁的姣姣也来到国际儿童院，成为学校里最小的中国孩子。在苏联卫国战争中，严重的肺炎几乎夺去她的生命。就在生命弥留之际，她的妈妈不顾一切冲进儿童院，从病床上抢走了奄奄一息的女儿，愣是一滴水一滴水、一勺汤一勺汤使女儿起死回生，挽救了一个濒临死亡的生命，为她自己，也为毛泽东留下了后代。如果不是贺子珍妈妈的勇敢和无畏，恐怕姣姣早已魂断莫斯科了。所以，母亲带给她的不仅是幸福，还有生命……



第三章

出 国

- 莫斯科国际儿童院——中国孩子的第二故乡，我在那里度过了短暂的时光
- 一夜之间，温暖的南方变成血腥的战场
- “我是中国中医的女儿，他们送我来苏联治病”
- 死亡，死亡，还是死亡

莫斯科国际儿童院——中国孩子的第二故乡，我在那里度过了短暂的时光

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向莫斯科国际儿童院输送了 40 多名革命烈士和革命者的后代。这些孩子虽然躲避了中国战场上的炮火袭击和血腥屠杀，但在苏联却经历了 4 年卫国战争，和苏联人民一道经历了困难时期，经受了战争的考验。所以在我们的成长记忆中，青少年的履历几乎被苏联这伟大而悲壮的国名填写了。大家对祖国的抗日战争记忆并不深刻，但对异国他乡的这场战争却锥心刺骨，终身难忘。可以说，苏联是我们 40 多个中国孩子心灵中的第二故乡！如今，离开它的怀抱已经 40 多年了，可是当年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在和别人谈话时还会突然冒出俄语来，连自己都吓了一跳，用俄语竟然比用中国话说得还通顺。可见这第二故乡对我的影响之大之深。

当时莫斯科有两个国际儿童院，一个叫伊万诺夫国际第一儿童院，一个是莫尼诺国际第二儿童院。抗战爆发前，中国国内就送了十多个孩子来到这里，主要集中在第二儿童院里学习。1939 年西班牙内战爆发，大批西班牙革命者和知名人士的子女也送到苏联儿童院。第二儿童院重新对各国孩子进行了调整，将 40 多名中国孩子全部迁往距离莫斯科 300 公里的伊万诺夫国际第一儿童

院。

我到达莫斯科后，也被分配在第一儿童院。这个儿童院是苏联最大的国际儿童院，集中了40多个国家的孩子，其中有波兰统一工人党领袖贝鲁特、意大利共产党领袖陶里亚蒂、美国邓尼斯、日本片山潜、南斯拉夫铁托等著名革命家的子女。中国有毛泽东的两个儿子、林彪的长女、瞿秋白的独女、蔡和森的一儿一女、蔡畅的独女、林伯渠的女儿、苏兆征的一儿一女、张太雷的儿子、刘少奇的儿女等人，许多革命领导人的子女都在这个第二故乡度过了难忘的“二战”岁月。

我们一到儿童院便投入紧张的学习。因为我的俄语不行，不能按年龄编进当地的中小学里跟当地孩子一起学习，因此先进俄语补习班，等掌握语言后，再进学校学习。

这里的环境和中国的环境简直是天壤之别，特别是来自战争国家的我们，刚刚穿越了战争的硝烟，走进这里的和平天地，不禁充满了诧异，几乎不相信世界上还会有这样美好的人间。这里的校园鸟语花香，室内温暖如春，老师在阳光灿烂的教室里孜孜不倦地教授每一个学生。温馨的空气包围着我们……这里的城市洋溢着青春的活力，人们在快乐地生活和工作。到了晚上，街头到处可听见手风琴的声音，可看见姑娘小伙子双双对对相依的身影。世界大战好像在另外一个星球激烈进行，这里完全成了童话中所描绘的世外桃源。在这里生活的中

国孩子被巨大的幸福淹没了，几乎不去理会中国国土上的父辈们在如何地浴血奋战，如何地日理万机，如何地鞠躬尽瘁……照样嬉笑玩耍，甚至调皮捣蛋，打架犯错误，直到苏联也爆发战争，我们才深刻体会到战争是什么。孩子们在战争中成熟成长起来。

之所以我们要被送往条件优越的莫斯科学习，也是为了解除父辈们的后顾之忧，让他们全身心投入这场旷日持久的反侵略的战争中。

苏联最高统帅斯大林对我们各国的孩子给予了最好的照顾。但是，不管我们生活得如何幸福，有的孩子还是不能抹去精神上的创伤。这长期和父母离散，饱受人间苦难所造成的精神创伤可能将会保留终身。我记得，我们中国学生队队长是毛岸英。他那年已经19岁了，但是他和他的父亲毛泽东一同生活的时间很短很短。他和弟弟毛岸青因为母亲被害而流落在上海街头，受尽了屈辱。毛岸青的脑袋也被人打坏了，脑神经受到了致命的损害。后来，由东北抗日联军李杜将军带他们到了欧洲的法国，在那里等待了半年，才由中国驻共产国际代表康生从巴黎送他们到了莫斯科儿童院。已经获得和平和稳定生活的兄弟俩，依然对四周充满了警惕，对谁也不肯暴露自己的身分，有时他们不得不提到自己的父亲时，就和别人一样直呼大名，好像和毛泽东没有一点关系。后来在中国派去的师哲副院长的开导教育下，他们兄弟俩才敢讲出自己的身分，才敢当着大家的面称毛泽东为

“我们的父亲”。

在国际儿童院的中国孩子许多都有苏联名字。毛岸英叫谢廖沙，毛岸青叫亚力山大。我离开延安时，爹爹也为我起了个化名——赤英。父亲说用化名一是为以防万一，不会暴露身分；二是“赤”和“朱”都是红色的意思——红色英雄，是爹爹的希望。

我一到莫斯科就再没有使用朱敏这个名字，用的是赤英，开始的是赤英的经历。

我的一生中，名字成为我经历的证明，换一个地方换一个名字，开始一个新生活。我记得，我有好几个名字，在爹爹心中有小名“四句”、大名“朱敏书”；到延安后，爹爹又叫我“朱敏”；我在外婆膝下姓贺，叫飞飞。我的名字随地方的不断转移而不断地更换。离开成都，我的贺飞飞随着童年画上了句号，到延安开始了我的新名——朱敏。这不，才几个月我又使用了“赤英”的化名。

很快，我到莫斯科四个月了，学习有了很大进步。可是，进入6月夏季的莫斯科，天气依然很寒冷。我小时候有哮喘的病根，在寒冷潮湿的莫斯科又发作了，整天整夜地咳嗽。儿童院的老师请了许多医生来为我看病，药也吃了不少，病情却不见好转，最后他们决定送我去白俄罗斯明斯克城郊的夏令营疗养。和我同去的还有第二国际儿童院的一对捷克姐妹——弗拉斯塔和米拉，她们是捷克共产党早期领导人日瓦沃的女儿。

以后，我们三个来自国际儿童院的孩子在德国集中

营中结为生死之交，共同度过了4年的地狱岁月。在最黑暗的日子里，我们相依为命，相互鼓励，严守自己的身世，躲过了德国鬼子的审查，成为活着走出德国集中营的幸存者。

一夜之间，温暖的南方变成血腥的战场

我们从莫斯科到白俄罗斯疗养的孩子一共有21名。我所在的第一国际儿童院只来了我一个。第二国际儿童院来了好几个孩子，其中有张闻天的儿子。他从小在莫斯科长大，一口纯熟的俄语真让我羡慕不已。这次去南方疗养的只有我和他两个中国孩子。最为痛惜的是，在德国鬼子占领我们疗养院后，他想逃回莫斯科，被法西斯飞机炸死在途中。

那年他才12岁。

明斯克距离莫斯科有500多公里远。我们的汽车在路上走了两天，6月21日傍晚才抵达我们疗养的集体农庄。我们来南方疗养的孩子大都是身体有病，或者是体质差。经过两天的长途颠簸，个个都乏极了，谁也顾不上欣赏我们新“家园”是个什么模样，吃完晚饭就陷进松软的床上，呼呼大睡……

睡眠中的我们谁也不会料想这一夜将会成为历史上永远铭刻的日期。

沉浸在和平之夜的苏联人民也不会预想到明天战争的来临。

最高统帅斯大林也不可能在睡眠中梦见希特勒战争狂的双眼正虎视眈眈盯着他……

此时是 1941 年 6 月 22 日凌晨 3 点。远在德国柏林的希特勒精神十足，他向部队下达了向苏联进攻的命令。德国坦克部队像巨大的黑爪子扑向苏联的西南部，把我们疗养的明斯克地区紧紧钳住，准备捏个粉碎……

已经置身法西斯铁掌中的我们和所有的苏联人都还沉睡在甜蜜的梦境里……

凌晨 3 点，德国的飞机、大炮、坦克和他们密密麻麻的步兵跨过了苏联南部的国界。苏德两国首脑 1938 年 8 月 23 日在莫斯科签订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此时已成为法西斯手中一张可以任意撕碎的纸片。终于，善良的苏联人民和世界上所有卷入战争的人们一样，几乎在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情况下接受了这个强加给他们的灾难，其中包括我们这些躲避战乱的各国孩子。我们再次被投进了战争的火坑。

我们早晨醒来，听见小鸟在房前枝头上的叫声，也听见隔壁人家的牛叫鸡啼声，一切显得那样宁静和安详。我们一起床，浑身又来了精神，恢复了孩童的好奇和多动的天生“病症”，不是先去洗漱，而是跑进旁边牲口棚里看马呀牛呀羊什么的。特别是看见那些在妈妈肚子下吃奶的小家伙，我们个个都想爬进去抱一抱。要不是它

们的“妈妈”们始终和我们保持不友好的态度，说不定这些可爱的小动物早就成了我们床上的宠物了。后来，我们在老师的催促下，才不情愿地离开了这些小动物。

我们疗养的这个农庄在明斯克城郊。这里有茂密的森林和平坦的草原，到处都是绿油油的。这里毕竟是南方，空气要暖和得多，阳光也灿烂得醉人。我的哮喘毛病也不知不觉好了许多，一个晚上也没有咳嗽。早饭后，我们在老师带领下，来到村庄外的草地上玩耍。我认识了一对捷克姐妹。

“你好，这是我的姐姐，叫弗拉斯塔；我是妹妹，叫米拉。你叫什么？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

那个叫米拉的妹妹大方地用俄语问我。

顿时，她们姐妹开朗活泼的性格给我留下了良好的印象。我回答了米拉的问题，但没有说我的父亲是谁。因为我们国际儿童院的孩子大都在险恶环境中生活过，从小因为革命家庭受过反动当局的许多折磨，渐渐养成了严守自己身世的习惯。到了和平的环境中，依然相互不打听身世，也不主动说出自己的父母是谁。自然，我也不知道她们的身世。

这对姐妹就叫我“中国赤英”。

张闻天的儿子叫汪格里。他虽然有俄国人的白皮肤，但他的黑眼睛黑头发，一看就知道有中国血统。汪格里被炸死的消息是我从德国集中营回到莫斯科后才知道的。

我们这群孩子里，我的年龄算是比较大的，已经15岁了。因为我离开延安时，爹爹考虑我到莫斯科就学的年龄，就少报了两岁。其他孩子基本都在十二三岁，还有几个只有七八岁，地地道道的红领巾夏令营。我们在一望无际的草地上尽情地唱歌跳舞。我也给同学们唱了一首中国民歌，这是我离开祖国后第一次用汉语唱歌，心里别提多么高兴。但是唱着唱着，不知怎的我的眼泪流了出来，这浓郁乡情的歌词勾起了我的思念。

毕竟我离开祖国时已经是少女，对家乡的一草一木和对亲人的印象是十分深刻的，他们的音容笑貌老是固执地冒上来。从前在家唱歌时不觉得歌有什么特别，可在异国他乡唱歌，感觉就大不一样了。

正在大家玩得好开心时，突然，我们觉得大地有点颤抖，天空传来嗡嗡的低鸣声。我们停止欢笑，四下寻找这个怪声音是从什么地方传来的。是不是要变天了？我们抬头看着天空，看见蓝色天幕上有一个个黑色飞行物缓缓移动，是鸟群？也不像啊，鸟飞不了那么高……我眼前猛然闪现一个情景，这个情景我多次在国内看见过，那是日本鬼子轰炸机轰炸城市的情景……

我恐惧地大叫起来：“飞机！”

那些没有经历过战争的孩子却高兴地喊：“对！是飞机，好多好多飞机啊！”

“战争，是战争！”我无法解释更多，用最简单的词语告诉大家。

“战争?!”大家不相信地看着我……我正想解释这是轰炸机，不远便传来剧烈的爆炸声。“哇……”几个年纪小的孩子被这巨大的声音吓得哭了起来。这时大家才明白我说的战争是打仗，尖叫着往村庄里跑去，好像躲进房屋里，炮弹就不会落到头上，就安全了。

我们在飞机呼啸声中，跑回四处冒烟的村庄，一看情景更加可怕。就在我们看飞机时，飞机的炸弹已经在村庄里横扫了一遍，其中一颗炸弹落在小牲口和它们“妈妈”居住的棚顶上，牲口棚不见了，成了一个泥土大坑；可爱的小动物已经被炸得粉碎，这里一条羊腿，那里一个牛脑袋，四处都是鲜血。我们吓得两腿直打软，怎么会是这样？这难道就是我们日夜咒骂的法西斯行为？

我们的夏令营顷刻不复存在。我们21名多国孩子顷刻间便沦陷在了战争的火海中。我们唯一的老师——安娜，在大火中不停地鼓励我们几个大一点的孩子：“不要怕，我们一定能回莫斯科的。你们要管好年纪小的孩子，把行李都拿出来。我去寻找汽车，我们要想办法回去，记住，我们一定能回去！”

老师去寻找汽车了。我们靠在残破的断壁墙边等待老师回来带我们离开战争。我看见我们脖子上都系着红领巾……

我想：万一我们被德国鬼子抓住了，他们肯定要抢走我们的红领巾。不行，红领巾不能让他们拿去。当时那个年纪的我，还不能意识到战争对生命的残酷，特别

是法西斯屠杀犹太人的行径，是本世纪或许是整个人类史中最为罕见最为残酷的一页。可我不知道担心自己的性命却知道担心我的红领巾。我到莫斯科时间不长，俄语说得不好，无法将这个担心和别的孩子交流，就独自起身到墙角找出我们昨晚喝掉汽水后扔下的空瓶子，把红领巾取下，塞进瓶里，然后封好埋在一棵大树下面。我的行动带动了大家，米拉姐妹首先将红领巾摘下，和我的瓶子埋在一起。

红领巾，这是我们的荣誉，绝不能落在法西斯的手里！

我们埋完红领巾，脸上、手上都黑乎乎的，可我们为维护自己的荣誉和尊严做了一件大事。我们也不顾黑脸脏手，兴奋地拥抱在一起，大声欢呼起来。

我想，如果世上真有上帝，他看见我们此时的情景，是否会再相信战争能摧毁一切的理论，是不是觉得战争在天真的孩子面前，失去了威力？

“我是中国中医的女儿， 他们送我来苏联治病”

我至今还记得爆发战争的这一天是一个星期日。

许多苏联人在自己的家里休息娱乐，电影院里上映了战争题材的电影，可观众依然觉得这是电影，是历史而不是现实。可是，无情的战争好像突然从银幕上跳了

下来，光临和平的大地。毫无戒备的苏联南部顿时大火冲天，尸骨遍地。大片大片黄灿灿等待收割的麦田，被德军的坦克履带碾压在泥泞的泥土里，丰收的期待随着战争的脚步走向了破灭的深渊。

这天上午10点，苏联千家万户的收音机里突然传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兼外交部长莫洛托夫低沉而悲愤的声音：

“纳粹德国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不宣而战，于今天清晨3点兵分三路入侵苏联……”

从这一时刻起，苏联人民一下子由和平使者跌入战争受害者的行列。

因为我们21个孩子直接置身在德寇的轰炸火力网中，毫无疑问，我们对战争的感受要比莫斯科的孩子更深切更残酷。战争刚开始时，莫斯科的中小学开始停课，许多孩子还兴高采烈地从停课中理解了战争的含意，可是前线不断紧张的形势和人员的大量伤亡，加剧了全国的紧张。很快，战争的灾难降临到莫斯科等大中城市，孩子们开始挨饿受冻，开始失去亲人，停课的欢欣变为对战争的仇恨。我们儿童院的大孩子们也参加了预备军队，随时准备为第二故乡奉献自己的一切……当然，我已经在遥远的南方失去了自由，不能再感受同学们那高昂的参战激情！

我们的安娜老师没有能力为我们找到一辆回莫斯科的汽车。

看到她神情沮丧两手空空时，我们中间有的孩子哭了，知道我们回不去了。安娜老师把我们一个个拉起来，拍拍身上的土。她眼眶红红的，说：“我现在无法找到一辆可以带你们回去的汽车……镇上的车子不是被炸毁了，就是被用来运送军用物资。我试过……但他们不同意给我们汽车。我很难过……估计纳粹很快就会来的。我们如果待在这里会被他们抓走的，何况你们中间有国际儿童院的孩子，是共产党国家的孩子。他们会杀了你们的。我们还是到树林里躲一躲。”

安娜老师一手拉着一个小孩子，带我们走进村庄外的树林里。当时，我们都带有皮箱和毛毯。安娜老师叫我们带上，说是树林里寒气重，毛毯能御寒。有老师在，我们心里平静了许多。其实，安娜老师不过是20岁的姑娘。但她那种勇敢和果断的行为增强了我们战胜困难的信心。

第二天，德军占领了我们居住的农庄。村庄里许多没有来得及逃走的成年人被德军集中起来，强迫他们为德军建筑工事。开始，德军没有搜索树林，我们没有被发现。但是，过了几天，我们的食品吃完了，本来身体就不好的孩子，这一惊一冻，许多人又生了病。安娜老师急得摸进村庄想请牧师来给看看，谁知被德军发现了。不久，我们也全部被德军从树林里搜了出来，被赶进村庄里。安娜老师一见，跑过来，像老母鸡那样紧紧护着我们。因为她知道我们中间有犹太血统的孩子，有共产

党国家领导人的孩子。虽然她已经反复嘱咐大家，不要暴露自己的身分，不要暴露自己是犹太人，相互之间也不能出卖。但她看到德国鬼子凶煞恶神似的审讯，还是担心孩子有差错。她挨个抚摸我们的脸颊，用眼神鼓励我们不要怕，但她自己的脸色都变了，褐色的大眼睛里汪着清泪。

她知道，如果我们中间有一个孩子暴露身分，这个孩子的性命就肯定难保了，我们面前站立的是杀人不眨眼的魔鬼。她能不担心、不害怕吗？

大概在危难之中，人有一种本能保护意识。我们谁都将自己的假身世背得滚瓜烂熟；即使是才编出来的，一到德国鬼子面前，都能说得很真切，编得连自己都相信那就是真实的身世。

德军把我们排成两排，一个肥胖的德军军官面对我们，脸上堆着臃肿的笑容。他的身后站着两个全副武装的德军，面无表情，死死地盯着我们。

他挨个审讯我们。我是中间被叫出队伍的。

“你叫什么？”那个德国军官用我勉强能听懂俄语问道。

“赤英。”

“什么地方人？”

“中国。”

“支那人……？”德国佬停下记录的笔，抬起头，那双深陷在肉团里的蓝眼珠盯住了我，不相信似的反问我

一句。

那时许多外国人称中国人为支那人。我点点头，但心里却气呼呼的，因为外婆告诉过我，外国人称中国人为支那人，那是对我们蔑视的称呼。

“噢……你的父母在中国是做什么的？”

“父亲是老中医，母亲也是。”

“你为什么到莫斯科？”

“我身体不好，父母送我来莫斯科治病。”

“你得什么病？”

“你听——哮喘。”我张开嘴，大口喘气，胸腔里发出拉风箱的哧啦哧啦声。

也不知这个胖家伙怕我有传染病还是听我不流利的俄语太吃力，他不耐烦地挥手叫我快走，又开始叫下一个。我立即跑回队伍。安娜老师轻轻吐了口气，对我微微一笑。

安娜老师虽然不知道我究竟是中国哪位领导人的孩子，但她知道我不是一般人的孩子。所以，从我被叫出队伍，她就捏了把汗，担心我不太会说俄语，万一说露了就糟糕了。看见我平安无事地通过了审查，她心里落了块石头。

在我后面叫出队伍的是米拉姐妹。安娜老师向她们挤挤眼，老师知道她们很灵活，绝对不会出问题的。果然，她们姐妹编造出父亲是捷克的火车司机，在空袭中被炸死，母亲改嫁，被遗弃的她们姐妹不得不投奔莫斯

科亲戚的悲惨故事。

德国鬼子好像对这样身世的孩子不感兴趣，连连制止边讲边哭的姐妹：“好啦好啦，回队吧。”

一个朝鲜男孩摇身一变成了日本人，不仅没有继续受审问，还得到德国鬼子奖赏的一个大面包。他一回到队伍里，就给我们每人分了一块。

眼看我们都快要通过敌人审查时，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刚才还堆着臃肿笑容的德国军官，举起了屠刀，两个孩子倒在血泊中……如果不是我们亲眼所见，怎能相信这是真实的场面！

我们几乎被这惨无人道的兽性吓得昏厥过去……

法——西——斯！

我们从牙缝里挤出这三个音节！

死亡，死亡，还是死亡

安娜老师终于可以喘口气了，她眼前有19个孩子通过了德国鬼子的盘查。她正要拥抱我们时，突然愣怔住了：她的膀臂下还有两个8岁的女孩，是捷克人，而且都是犹太人。她们还没有通过敌人这一关，看来安娜老师还不能轻松。果然，德国鬼子一把拉出两个女孩。听见她们尖锐的哭叫声，我们顿时都紧张起来，毕竟她们

年龄太小了……

她们站出队伍仅仅几秒钟，就看见一个鬼子的大皮靴挑起一个女孩瘦弱的身体，甩了出去，接着又甩出第二个女孩……

“不……！”安娜老师大叫着冲上前去，被德国鬼子一枪托打倒在地。

这时所有的德军都围了过来，他们脸上的肉在狰狞地抖动。

我们惊呆了，不知发生了什么，德国鬼子要这样对待这两个年幼的孩子。

“犹太猪！”

我们被这毛骨悚然的声音惊吓出一身冷汗。安娜老师脸色刷地变得苍白。她明白，这三个字意味着宣判这两个女孩的死刑。

我们跑上前想帮助倒在地上哭叫的孩子……顿时，我觉得肩膀一震，不等明白过来，身体已经滚出好远。我抬头一看，一个德国鬼子在用枪托猛打我们上前营救的人，有的孩子鼻孔流出了血，有的头上起了青包，有的帽子掉了，有的鞋子破了。

安娜老师拼命拉住我们：“不要上前，他们会打死你们的！我的孩子们，不要上前……啊！”

我们被德国鬼子的枪托逼着离开了那两个乞求我们救救她们的可怜孩子。

如果说法西斯的残酷已经用文字进行了淋漓尽致的

描述，那么，我在童年所目睹的残酷却是任何文字都无法表述的，它不仅残酷凶狠，而且是那样的冷酷。当孩子们的凄惨哭叫声把人的心都要撕破的时候，法西斯却能无动于衷、有条不紊甚至异常平静地进行他们的杀人活动，好像我们不是人，而是牲口，不！连牲口都不是，最多是株草！这种非人所为的行径能用文字表述吗？！

我们看着德国鬼子从腰里抽出枪，一步一步走向犹太女孩。我们因为恐惧而掩面大哭了起来。“上帝啊，你在哪里？他们要杀可怜的孩子，救救她们吧！”安娜老师双手合十，仰头望着苍天，发出悲惨的哭声。

“我早就注意你手里这两个小姑娘，她们有褐色的眼睛，还有褐色的头发，是这头型告诉了我，你的孩子群里有犹太人！”

德国鬼子用手里的皮鞭指指地上两个女孩的头。我不知道她们的头和其他欧洲人的头有什么区别，法西斯居然能以头型来断定谁是犹太人，这不是太荒谬了吗？然而，希特勒就是用这种荒谬的头骨型说奠定了他的人种论，视犹太人为最劣等的民族，天下第一要灭绝的人种。他们将犹太人看成是瘟疫，想方设法要斩尽杀绝，即使是孩子也绝不心慈手软。

“我的眼睛也是褐色的，你们杀了我吧！”安娜老师也豁出去了。

“嘿嘿……你不是犹太人，小姐！”德国军官用鞭子

拨拉了一下安娜老师金色的长发。可能犹太人的头发不是金色的。

这两个孩子怎能经得起这般毒打！其中一个孩子的胳膊断了，软塌塌地垂挂着。她们最后连哭叫的力气都没有了，只见她们浑身是血的瘦小身体随着棍棒的抽打在泥地上抽抖。法西斯打够了，拍拍手，拉起站都站不住的女孩，一人给她们一把小铁锹，让她们挖坑。

这是干什么？

我们紧张地望着安娜老师。安娜老师满脸是泪，痛苦地喊道：“他们要活埋她们，上帝啊，你看见了吗？”

我们人群又开始骚动起来，想上前救她们出来。一切都无济于事，两个活生生的孩子被德国鬼子活活埋在土坑里……

我们已经不知道什么是哭叫了，浑身上下一点力气都没有了，连看那土堆堆的勇气都没有了。突然，我看见一只细细的血手从土里慢慢拱了出来，顽强地伸向天空，五个手指因泥土的重压而僵直地张开着，她像向苍天要什么……

这是对生命的渴望！是对法西斯的控诉！

两朵还没有来得及开放的花朵就这样被摧残了，折断了。

这残酷的一幕终身记在我的脑海里。至今，我一听到扑扑声，都会想起那往坑里盖土的扑扑声，令人心悸。

德国鬼子干完他们的杀人工作，又把我们赶进附近

一个孤儿院里，集体看押起来。

这个孤儿院原来已经有 40 多个孤儿。我们一去，孤儿院里就更加拥挤了。饭食本来就不够吃，现在显得更加紧张。许多孤儿才一两岁，因为吃不饱，几乎每天都有孩子死去。相对来说，我们年龄要大一些，生命力也强盛一些。有时我看见可怜的孤儿在哭叫声中慢慢地断气，心里难过极了。无论我们怎样帮助那些病孩，死亡还是不断光临这个灾难深重的悲惨世界。

随着战争的扩大，四面八方的孤儿都被送到我们这个孤儿院里看管。孩子越来越多，死亡也越来越多，整个孤儿院里充满了阴暗死亡的气息。原来孩子死时，还有神父做祷告，祈祷小灵魂安息；后来死的孩子太多，神父来不及做祷告，干脆死的活的一起做——反正活着的孩子最后还是得死。

如果人有灵魂，那么这无辜的小灵魂能安息吗？

战争在成人之间进行，然而受害最深的是儿童。毫无抵抗能力和生存能力的孩子，被战争强行剥夺了生存的权利，小灵魂怎能安息！

后来，我之所以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教育专业，大概就是目睹了孩子们孤立无援的悲惨景况，希望从事教育，多给孩子一些关心和爱护吧。

后来，我们实在忍受不了饥饿和不断死亡的威胁，我们几个大一点的孩子跑去和德国看管交涉，能不能在我们做工以外的时间再给我们安排一些事情做，这样能多

三
章
出
国

第三章 出 国

得到一些食品，让那些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孤儿不被饿死。

德国鬼子问我们能做什么。

我回答，我会织毛衣。

那好，织一件毛衣的工钱是一磅面包，一块黄油。

这么……少？我差点儿叫起来。可转念一想，如果我们10个大女孩都来织毛衣，能得十多磅面包。

我点点头，答应了。

身边的米拉姐妹直拉我的衣角，不想让我答应。

我们出来后，快嘴的米拉首先叫了起来：“毛衣，我们不会织，怎么办？”

我笑了：“我会啊，我在中国时，我的姨妈是织毛衣能手，我每年的毛衣款式都不相同。不信，你们看我箱子里的红毛衣好看不好看？所以，名师出高徒，我的毛衣织得很好。你们不会，我来教。以后，我们利用晚上时间织毛衣，用毛衣换面包，以补贴经常吃不饱肚子的可怜孩子……”

尽管我们织了许多毛衣，但是我们还是不能改变孤儿们的状况，孩子还在死亡。我们那些微薄的报酬实在不能填饱所有孩子的肚子。

这一段经历，大概是我人生历程中心灵遭受折磨最沉重的一段岁月，因为人最痛苦的就是看见身边的人在慢慢地死去而自己却没有一点办法去帮助他。

这样的日子实在令人难以忍受，孩子们动了逃跑的念头。第一个逃跑的是米拉的姐姐弗拉斯塔，后来听说

她参加了游击队。但在我们要离开苏联被押往东普鲁士时，弗拉斯塔又被抓了回来，和我们一起去了集中营。第二个逃跑的是汪格里，他和几个大一点的男孩趁去外面拾柴禾的机会逃跑，但是在跑往莫斯科的途中被飞机炸死了。

我和米拉也想跑，可我们的身体不如那几个“越狱”的孩子好；即使跑出孤儿院，也逃不出德军占领区，迟早会被抓住的，到那时我们再用这些假身世就蒙骗不了德国鬼子了。

因为有孩子逃跑，德军加强了看守。我们见逃跑的机会越来越少，就放弃了逃跑的念头。

终于有一天，我们彻底失去了逃跑的机会。

第四章

地狱之门

- 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打响，
我们的命运将抛往何处
- 我们被押上西去的闷罐火车，一个
信念支撑着濒临死亡的生命
- 在消毒室里，我用舌头含住列宁纪念章
- 饥饿像魔鬼一样折磨着我们
期待生长的身体

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打响， 我们的命运将抛往何处

转眼，我们在明斯克孤儿院囚禁了一年多。战争仍然在苏联的本土上激烈地进行着。从1941年6月22日凌晨3点15分起，苏联军队承受了史无前例的猛烈攻击。战争刚开始的前三个月，苏联红军在德军强大攻势中，节节败退。到了9月份，丧失的国土面积已经超过一个法国的面积。

到了11月份，眼看着德国的坦克方阵兵临莫斯科城下，甚至连德军指挥官的望远镜里都能看见克里姆林宫顶部的那颗红星。

苏联人民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

世界上第一个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人民，是勇敢、坚强、永不屈服的。他们没有被德国军队气势汹汹的进攻吓倒，就在莫斯科面临危难的时候，红场上开始了一场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大阅兵。从红场检阅台前通过的部队将直接开赴战场，和德军作战。年轻的军人们高举军旗，高唱军歌，从凝重、平坦的广场走向炮声隆隆的战场，那里是用生命作承诺的疆场。红场上那悲壮、肃穆的气氛，让每一个有民族自尊心的人感受到一旦走过这块天地，肩负的使命便会高于一切，公民的义务变得如此神圣！

军人的归宿是战场，军人的灵魂是和平！

这些朝气蓬勃的军人，他们的生命或许在第一天战斗中就会画上句号。然而在祖国利益面前，每一个走上战场的战士都不会在乎生命的长短，不会在乎生命停顿在某时某刻；只要是长眠在战争的子午线上，那么这个人生句号就是圆满的，永恒的。就这样，大批的苏联青年，昨天还在街头浪漫地与情人手挽手，接吻拥抱；今天，却义无反顾地走向充满流血的战场，和死亡拥抱。这大概就是正义战争最终要战胜非正义战争的灵魂所在吧！

苏联红军大将，这个以后家喻户晓的著名人物，“二战”时期主要将领之一的朱可夫，受命于危难之中，担负起统帅苏联红军抗击德国法西斯的重任。果然，战场形势如同天空莫测的风云一般，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强大的民族仇恨和山河破碎的耻辱令所有反抗者更加坚强，从红场检阅出来的士兵顿时像充足电的战车，锐气不可阻挡，奔向抗击法西斯的前线。

原来长驱直入，想在冬季前占领莫斯科取暖的德军，被苏联红军顽强的防御战困阻在进退两难的莫斯科城外，唾手可得的莫斯科，转眼化成了可望而不可及的海市蜃楼。可是，自然界并不顾及地球上生灵的承受力，照样更换它的面孔。就在两军对垒僵持在莫斯科城下时，西伯利亚的寒风直扑而来，而且把 140 年未遇的寒流送上这片生命密集、散发血腥味的大地。面临摄氏零下 30 多

度而身穿单衣的德军，随着气温不断地下降，士气也降到了发动战争以来的最低点。他们不是被炮弹击中就是冻死在冰封的雪地里，失去胜利刺激的德国士兵等于失去了生命的支柱，在荒野里发出绝望的嘶叫。这绝望的嘶叫像传染的瘟疫，迅速传遍德军军营……战争在急剧变化中越加有利于苏联一方。

远在德国的希特勒没有失望，依然情绪高昂。他掉转头，把眼睛盯住了苏联南部伏尔加河下游的斯大林格勒城。

斯大林格勒原名察里津，位于伏尔加河下游的西岸。它和失守的乌克兰地区、白俄罗斯地区相邻。当西南部的黑海沿岸失守后，斯大林格勒便正面暴露在希特勒的面前。

希特勒又用他的三寸不烂之舌，弹出了蛊惑人心的狂叫：“先生们，我们为什么不去占领高加索和伏尔加河流域？为什么不把斯大林格勒从地球上抹掉呢？斯大林格勒是苏联的重工业命脉，是南方的交通枢纽。斯大林格勒完蛋了，苏联必将完蛋；苏联完蛋了，战争也就结束了！”

希特勒的党羽们，已经习惯吸吮这种“精神鸦片”，而且上了瘾。他们立即精神振奋，重新部署兵力，从西南边境发兵，把他们的精锐部队推向苏联的西南边疆。

南翼战场出现了危机。红军在南部战场连连失利，24万人成为德军的战俘，几万人死伤。德军的装甲部队像

一群群甲虫开过南部大草原。面对这股难以抵挡的“钢铁洪流”，苏联红军只能后撤，直到伏尔加河畔，身后就是斯大林格勒城。

1942年7月，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正式拉开了序幕。

苏联人民又一次以钢铁般的意志来抵挡法西斯的“钢铁洪流”。这场残酷的战争在伏尔加河畔整整打了180天，硬是没有让德国军队踏上这座近在咫尺的城市，这在战争史上是个辉煌的奇迹。

斯大林格勒战役打响后，法西斯对我们的看押也越来越紧，要想逃跑几乎等于天方夜谭。特别是经过头一个严冬的煎熬，许多孩子没有能熬到春天的来临。我们这些大一点的孩子也患有营养不良症，内分泌系统出现了紊乱，有的孩子干瘦干瘦，像个骨架标本；有的孩子虚胖虚胖，动一动就大汗淋漓，浑身无力。我一头黑发落掉许多，肚子像充了气一样鼓胀。变了形的模样，让自己看了都害怕。十五六岁正是女孩子发育的年龄，因为得不到必要的营养，我们的发育还停留在儿童阶段。1942年夏季，我已经16岁了，却像个十二三岁的小孩子。

我们的体力和精力已经不允许我们再有逃跑的念头；即使逃了出去，四处都是敌人的占领区，也无法找到藏身的地方。

我们不得不在绝望中打消了这唯一可以获得自由的希望。然而，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为我们这些在绝望中的

孩子又扬起了希望之帆。只要苏联红军打赢这场战役，法西斯一定会全线崩溃，从苏联撤兵，那时我们会自由啦！

然而，我们这群在爆发战争的那天就失去自由的孩子，没有等待到保卫战胜利的这一天，没有亲眼看见这场标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的来临。我们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还在激战中，就被押往德国境内，关进了东普鲁士集中营，成为“彡”字旗下的一名小囚徒。

我们被押上西去的闷罐火车，一个 信念支撑着濒临死亡的生命

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还没有结束，德军就好像预料到他们失败的命运，开始疯狂地掠夺苏联南部的财富，包括人力资源。他们一边搬运金银财宝和矿产金属，一边将青壮年押往波兰和德国的集中营，从事苦力劳动，为德国创造财富。

我们孤儿院也在劫难逃，凡是14周岁以上的孩子统统列上了苦力名单。我的年龄在来苏联时少报了两岁，但还是达到了法西斯的苦力标准。就这样，我和弗拉斯塔、米拉姐妹，还有另外3个女孩子在德国鬼子的花言巧语和皮鞭下，被强行拉出孤儿院的大门，推到肮脏的卡车上……我们是多么不愿意离开这座孤儿院！尽管它充满死亡和疾病，尽管它阴暗潮湿，尽管它不能填饱我们的

肚子，但它毕竟是苏联境内的地狱，终有一天会迎接自由的阳光，迎接战争的结束。如果我们远离苏联，真不知道何日才能看见自由，看见胜利！

或许我们永远也看不见胜利，回不到自己的祖国和亲人的怀抱。当时，我们几个饱经苦难煎熬、遍体鳞伤的姐妹，一听要押送到另外一个地方，忍不住哭出了声。然而这苦涩的泪水中已经没有什么成分是属于恐惧了。眼泪是咒骂和仇恨的宣泄。然而，这一声声从弱小、孤独无助的生命中发出的呐喊，谁能听见？上帝吗？从战争一开始，它就不见了，它是否存在过，我从来都怀疑。其他姐妹还在声泪俱下，上帝啊，你在哪里？你为什么不惩罚该死的法西斯？……

上帝不能解救我们，我们也不能解救自己，只好听天由命，任随命运的帆船把我们载运到任何地方，无非是个死！战争的血腥场面与法西斯屠杀的惨景已经麻醉了我们的神经，从视线到感觉，无惧死亡；即使知道前方等待我们的是死亡，恐怕也不会产生过多的恐惧。我们年幼的心灵承受得实在太多太多。这不是一个正常人所能想象的承受，也不是我这个过来之人所能描述详尽的承受！这种承受使人麻木，使人痴呆，使人不知道生命的存在。在集中营时，我看到许多犹太人在知道他们将要去死时，脸上还会浮现微笑，好像去死就是去获得幸福一样。人在求生不得时，不如求死，生命结束了，苦难也随之结束了。至于自由，死人的灵魂是最自由的。

1942 年底，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胜利曙光即将来临的时候，我们被法西斯押上了西去的列车。所谓列车，在许多反映“二战”题材的电影中已经充分得到展示，它和运送牲口的闷罐车厢毫无两样：如果说区别，一个里面装的是四条腿的动物，一个装的是两条腿的动物；再一个区别，四条腿的可爱，两条腿的可憎。

我们好像被驱赶的牲口，拼命往闷罐车里塞，直到一个紧紧贴着一个，直到每一个人都不能睡下身体，才“轰隆”拉上大铁门。几百个男男女女，开始了像猪一样的生活。不到一天，车厢里就臭不可闻了，开始有人呻吟，有人哭泣，有人呕吐。我当时身体很不好，尽管看上去人还是胖胖的，但是身体很虚弱。这时，我被恶劣的空气熏得不断咳嗽，没有两天，我开始发烧。要知道，在这个时候发烧无疑等于送死，不出 3 天，往车下抛的尸体中肯定就会有我一个。

迷迷糊糊中，我觉得有人不停地往我嘴里喂水，往我额头上敷冷毛巾。我费力地挣开眼睛，看见是一个穿着破烂不堪军装的红军叔叔在给我喂水。他看见我睁开眼睛，就说：“你刚才昏迷过去了，把你的同伴们吓坏了，抱着你大哭，要把你哭醒。我说，姑娘们，眼泪不能感动死神，只有想办法让你们的中国姑娘降温，才能救她。正好我这里还有退烧药。现在你暂时没事了，不过还要继续冷敷。你的同伴把他们分的饮水全拿出来给你冷敷了，一天没有喝水了。你这条命是大家帮你从魔鬼手里

夺回来的。她们说你是中国孩子，要是死了，连墓地都没有，以后你的父母找都找不着你的……骨头。所以，一定要活下去，哪怕像牲口那样，也要活下去。活着就是胜利！”

红军叔叔捏紧拳头扬了扬，脸庞上的刚毅神情好像用刀刻的一般，那么让人难以忘怀。

许久没有大人对我这样说话了，我觉得喉咙发哽，吐不出一个音阶，眼泪却不听话地淌了出来。我无力地举起手摸了摸这个幽默开朗的叔叔的脸，又摸了摸军帽的帽檐。原来帽檐上面红星位置显露出一个深色的印迹，帽徽虽然被法西斯撕掉了，但是我觉得红星在我们心中是永远撕不掉的。

这些红军叔叔都是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被俘的，有的还负了伤。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们上了我们的车厢，因为一路上不断有人逃跑、死亡、生重病，每到一站，就有人被抬下火车。车厢慢慢地不拥挤了，甚至后来大家能轮换着睡一睡觉。在战俘叔叔和姐妹们的照料下，特别是叔叔的一番话，给了我活下去的信心，使得我濒临死亡的生命又有了活力，病也随着好了起来，终于没有让看押的德国鬼子发现我正在生病，闯过了病魔和人魔的两道鬼门关。

这些红军叔叔真勇敢，一路上他们一刻也没有闲着，不停地讨论如何逃出这个囚徒牢笼。战场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他们的生命，他们宁愿战死疆场，也不愿意在集中

营里苟且偷生。

在火车快要到达德国边界时，他们终于有了逃跑的机会。

那天傍晚，火车停靠站台的时候已经很晚了，夜色很黑。我们被赶下来吃饭喝水和解手。几个红军趁着人们忙着争抢食物时，悄悄躲到火车下面，贴着铁轨，爬到火车尾部，从看押士兵的间隙爬到另外一列停靠站台的火车下面，然后他们顺着列车间隙逃跑了出去。

他们逃跑后大约十多分钟，德军清点上车的人头，才发现少了人。顿时站台警笛大作，好像一枚钉子刺破了空气。法西斯宪兵发出惊心动魄的尖叫声：“快追——！”

我们被枪托摔打着，赶上了火车。这时我们才知道鼓励我们要坚强地活下去的叔叔也在逃跑者的行列中。大家的心呼啦都提了起来。连我这个根本不相信上帝的人，也不由自主地祷告起来：上帝啊，保佑他们平安逃出魔掌，重返战场。

“砰砰——砰”远处传来了密集的枪声。

每次发生逃跑事件，都会听见枪声，但许多逃跑者还是逃出了魔掌，但也有被子弹击中的。但愿这次红军叔叔是幸运的逃跑者，趁着天黑逃出去；但愿德国鬼子放枪只是用来吓唬吓唬我们这些没有逃跑的人。过了一会儿，枪声稀落了，大概又过了半个小时，火车徐徐驶出了车站……

第二天，我们被集中在一个站台训话。那个肥胖的

法西斯宪兵队长，满脸愤怒，大吼大叫：逃跑者已经就地枪决。如果谁还要逃跑，他们就是榜样！

但是我不相信，如果枪决了，他们一定会将尸体拉来示众的。

一个星期的漫长行程终于要结束了。火车到达了东普鲁士境内，这是德国的东部地区。我们提着自己的东西，下了火车。

站在刺目的阳光下，我竟然不知道自己是死是活：怎么走路时轻飘飘地，好像脚底踩着棉团没有知觉一样。过了好一会儿，我才从梦幻中清醒了过来，那时面前一个黑色影子在晃动，细细一看，是自己的身影，这才确信自己是活着，不是做梦。

尽管我活着，可是我离我的祖国越来越远……

活着就是胜利！我想起了红军叔叔的话。我说什么也要活下去，就是走到地球的尽头，地狱的最底层，我也要活下去。只有活着，才有希望！

在消毒室里，我用舌头含住列宁纪念章

我们被赶下火车，按照德军的指挥，排成两个队伍，一个队伍的人胸口别着黄色菱形的胸牌，上面写着姓名、国籍和年龄，这是犹太人特有的颜色；另外一队胸口别着白色长方形的胸牌，这是非犹太人的队伍。我也在这

个队伍中间。我的胸牌上面用德文写着“赤英”的名字，国籍一栏写着“东方”。我不知道这个东方是指德国的东方莫斯科，还是指中国是东方国家。

整个队伍里很少看见像我这样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的亚洲人，有几个听说是日本和朝鲜人，中国人只有我一个。

当德国人命令我们两个队伍按照不同的两个方向走时，犹太人的队伍出现了混乱。惊慌失措的老人拼命搂着自己的孩子，孩子也被大人的惊慌神情吓得啼哭起来，有的人干脆一屁股坐在地上，用俄语哭喊着：“杀死我们吧！我们哪里也不去了。杀死我们吧！”那些男人挣扎着往队伍外头挤，可是被德军的枪托又赶回队伍里。

他们一听说要他们犹太人单独朝一个方向走，就敏感地察觉这是不祥征兆，本能地要进行抗拒。从以前许多血腥屠杀的事例中，犹太人已经掌握了他们的死亡规律，一旦法西斯让犹太人和其他民族的人分开，就意味着大屠杀即将开始。

犹太人的队伍越来越混乱，皮鞭、枪托雨点般地落在大哭大喊骚动的人身上，使得队伍越加混乱不堪。这时，看押队伍的长官，一个长有一张和善、使人信赖的脸的德国人，大步流星走了过来。他手里没有皮鞭，腰里也没有手枪。如果不是这身法西斯军服，他脸上的笑容很容易让人联想起酒店老板或者是看见有人光顾生意的商人。他在寒风里反背着手，后背微微驼了起来，用

和善诚恳的口气说：

“先生们，女士们，还有美丽的小姐们，我们分开走，完全是因为时间的原因。我们必须在天黑前到达营地，不然我们会被冻死在这该死的荒原上的。你们看，这里有火有食物吗？只有寒风和野兽。你们完全没有理由害怕。我们已经走了一个礼拜，送你们这么远，是为了让你们为我们工作，杀死你们，我们是吃亏的。现在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

队伍开始安静，人们渐渐停止了哭泣，把生存下去的希望寄托在这个德国长官的两片薄薄的嘴唇上。

“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尽管来找我，我的名字叫威廉。”

绝望中的犹太人好像获得希特勒的免死特赦令，感激地望着这个交给他们特赦令、正在微笑的威廉，半信半疑，不再哭闹。队伍开始有秩序地上路了。

天黑时，我们到达了东普鲁士集中营。然而，我们却没有看见那支威廉长官保证在集中营会合的犹太人队伍，以后许多天也没有看见犹太人，他们到哪里去了呢？

战争结束后我才知道，我们集中营旁边有个日夜冒烟的烟囱，那里专门焚烧送进“浴室”洗澡被毒气毒死的犹太人尸体。那些和我们分开走的犹太人最后全部被送往那里，等待他们的是毒气！

这是一个高智商刽子手的表演，一个涂炭无数生命、微笑更加甜蜜的法西斯。如果不是我亲眼所见，无法相

信这是真实的场面。

我们在进集中营前也进行了一次淋浴。当然，我们的淋浴是出水的淋浴，说是要消毒，不能让我们这样肮脏地进入他们为我们建立的“新乐园”。进去前，我们所有的物品也要检查，除了衣物外，其他东西一律要被没收。当然，他们不会说是没收，说是替我们保管，甚至还发了物品保管的牌子。

我看见一个德国鬼子把我的皮箱打开，一顿乱翻，把手表、钢笔都拿走了。那支钢笔是爹爹在我离开延安时送我的，笔帽上还刻有“朱德”的名字。因为这个名字是用汉文写的，德国鬼子不认识，看见是支派克金笔，也不去理会笔帽上的汉文是什么。

我眼睁睁看着他们拿走了爹爹送给我的珍贵纪念品，心里难过极了。

在我回到中国向爹爹说起这件让我无比难过的事情时，爹爹安慰我说：能活着走出集中营已经是不幸中的大幸了，德国鬼子没有认出上面有我的名字也算是你的万幸了。对于爹爹来说，你的生命比那支钢笔更重要。以后爹爹再送你一支作纪念，不要老是想这件事情了。

就在我伤心失去那支钢笔时，突然想起，我的内裤口袋里还缝着一枚列宁纪念章。那是在莫斯科国际儿童院的一次联欢会上，一个同学送我的。当时我就把这枚小小的却很精致的纪念章戴在前胸。能有一枚我最敬仰和崇拜的列宁像章，这是何等的光荣！后来，这枚纪念

章就没有离开我的前胸，直到我们被德军囚禁，才把它缝进内裤口袋里，一直贴身保存着。

我们进浴室前要脱掉所有的衣服进行彻底搜查。看眼前这严密的检查，是很难再保住这枚纪念章了。不！我从心底冒出一个强烈的愿望：就是失去生命也不能失去这枚纪念章，我绝不能失去这枚纪念章！不能失去！

我的脑袋迅速地转动起来，也不知哪来的胆量，就在淋浴的队伍快要移动到门口时，我伸手将内裤口袋里那颗纽扣大小的纪念章，快速掏了出来，往嘴里一抿，压在舌头底下。

我紧紧闭着嘴走进脱衣服的房间里，无论谁和我说话，我只是点头，绝不出一声。

一进浴室，一个高大的女看守一把抓住我的头发。我以为我被发现了，心好像跳了出来一般，浑身颤抖起来……这个女看守发现了我头发上的发夹，就恶狠狠地往下撸；撸了一下，没有撸下来，又撸……我忍着锥心的疼痛，拼命不让自己叫出声音，生怕纪念章滑出嘴来。塑料发夹连带着一缕长发落在了地上，女看守一脚踩得粉碎，然后把我推到水龙头下面冲洗……顿时，我的泪水涌了出来，顺着这热水一起往下流，这是神经高度紧张后才会有的痛楚和激动。如果我的行为被德国鬼子发现了，我肯定是死路一条，绝没有再活下去的可能了。不过，这样去死，我没有遗憾，因为我用我自己的生命，保卫了心中最神圣的“领土”不受侵犯，这和战士在前线

冲锋陷阵一样可贵。

我咬紧牙关完成了所有的“消毒”程序，穿上衣服后，我才从嘴里吐出纪念章，放进口袋里。米拉在一旁看见我嘴里吐出一个纪念章，先吓了一跳，随后又高兴起来，伸手要过纪念章。

纪念章还沾着唾液，在阳光下发出红艳艳的光。列宁的侧身头像嵌在红色底色上，上面罩着有机玻璃，很像我们文革初期流行的毛主席纪念章。

我们怕被别人发现，走漏消息就糟糕了。我们把纪念章用草叶包起来，藏在我睡觉的床铺下的铺板缝里。这样压在身子底下，又安全又温暖。

这枚纪念章后来再也没有离开我，一直到今天。它现在虽然已经很陈旧，周边的金属圈已经有了斑点，红色底子也暗淡了，但是列宁的头像还是那样金光闪亮。

这枚纪念章伴随着我度过我生命中最艰难的时光，一次次给了我活下去的勇气！

饥饿像魔鬼一样折磨着我们 期待生长的身体

集中营，人们在战争结束后通过书籍和电影等媒体的传播，已经了解了许多内幕，那些惨无人道的血腥岁月让读者不寒而栗。然而，作为身临其境的我们，对于鞭打，对于流血，对于死亡，已经司空见惯。经常遭受

残酷现状的刺激，只能让我们的神经末梢越来越麻痹。我们不知道痛苦，不知道欢乐，也不知道生死。从离开明斯克孤儿院后，就再也不知道我们身在何处了，每天就会机械地重复一个念头：活下去，要活过今天！

至于明天，就不去思考，因为明天我们会面临什么，谁也无法知晓。

现在的人们可能很难想象一个终日面对恐惧的人，会变成什么样子。不过，有一张集中营的照片很能说明人在残酷环境中出现的情形。图片中有一个孩子若无其事地从一排尸体前走过，脸部没有恐惧也没有紧张，平淡得如同走在大街上面对一排树木一样，或许这个走过尸体前的孩子，此时正走向自己的生命终点。

整天面对死亡的人或许最习惯、最淡漠的就是死亡了。所以，我们面临一个比死亡更艰难的问题，就是如何活下去。我们每天只能得到很少的定量的黑面包，有时一个星期的定量不够两天吃的，每天都在饥饿中，连做梦都是饥肠辘辘满世界地寻找食物，寻找了一夜，很饿；早晨起床，更饿。

饿！饿！饿！

这个折磨比任何折磨都令人难以忍受，更何况我们这个年龄的孩子都是长身体的年龄，饥饿的痛苦比大人强烈得多。如果问我对集中营印象最深的是什么，那么，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饥饿！

我们的定量只有大人的一半，然而劳动强度却和成

年人一样。除了面包外，其他辅助食品少得更加可怜，黄油、蔗糖几乎看不见，汤里永远只有发芽发霉的土豆片，用放大镜也找不到几个油花。我记得，在我们集中营被苏联红军攻克，犯人自由地冲出集中营大门的时候，几乎不约而同地朝一个方向，冲向集中营的食品仓库。我也在人们混乱地抢夺食品时，拾到一块好大好大的黄油。当时我简直高兴坏了，不顾一切地连连大啃了几口，噎得满嘴流油才罢嘴。因为黄油块太大，无法放进衣兜里，只好用手抱着。以后流浪的路上遇见很多危险，但我始终没有舍得丢掉这块又重又大的黄油块，一直抱着。有一次睡着了，草棚失火，我跑了出来发现黄油不见了，又返身冲进火海，把几乎融化了的黄油从火里抢了出来。后来我跑了数十公里寻找到了苏联红军，还要归功于这块救命的黄油呢。

我们所在的东普鲁士集中营和其他集中营的模样差不多，有营房区和工厂区，每个区的四周用高铁丝网密密匝匝地围起来，铁丝网的四个角，设有高台炮楼。站在上面，整个营房、每个人的活动都尽收眼底，谁也别想从铁丝网下跑出集中营。到了夜间，几个探照灯把漆黑的集中营照得如同白昼一般。

营房区里有许多木板房屋，呈一字形排列，一排连着一排。房屋之间没有花草，地面全是沙土，干巴巴的。整个集中营里除了德军党卫队房间里的盆景，几乎没有一株绿色植物，连个耗子都躲不过卫兵的眼睛，更别说

是人了。所以，要想活着逃出集中营，这几乎近似童话。

我们六个从明斯克孤儿院来的孩子没有被分开，和其他地方来的孩子住进了一个房间里。床铺分为上下两层，一个房间里可以住十好几个人。这么大的房间只有一个火炉，夜晚加进的木头，上半夜就烧光了。到下半夜，我们常常被冻醒，只听见外面的寒风从房屋的木板缝隙里哧哧地往里钻。有时，我们几个人不得不挤到一张床上，用身体相互温暖，熬过这漫长的寒夜。

天刚一放亮，耳边就响起刺耳的哨声，这是起床哨声。我们也被叫出门外，和其他成年囚犯一起跑步。春秋天气还好一些，特别是冬天，站立在雪地里听看守训话，凭借身上那一点单薄衣服，根本抵挡不住寒风的袭击。不一会儿，好不容易才跑出一点暖气的身子被刺骨的冷气剥夺得干干净净。无论怎样冷也不能跺脚、呵手，如果动一动，或是发出什么声响，马上就会被拖出队伍，或许整整一个上午都要站立在寒风中，直到冻得昏死过去。

我们长时间地吃不饱，身体越来越虚弱，我开始下午发烧，后来发觉脖子上有肿块。但是，不敢让看守的德国鬼子知道，怕把我送到隔离区，到那里就等于等待死亡。我就慢慢熬着，或许会好的。后来姐妹们发现我生了病，以为是饿出来的病，就想办法要去搞食品。

“这是很危险的事情，你们不能去！”我死活拉着米拉的衣角不让她去。我知道，这个冒险的主意肯定是米拉出的。

后来，我们中间有一个女孩说她在看守的食堂当服务员，她知道有一个地方可以搞到吃的，而且不容易被发现。我们实在太饿了，抵挡不住这个诱惑，就在半夜偷偷跑进看守的伙房，从泔水缸捞到了一大堆德国鬼子丢弃的白面包，还有烂苹果。这个女孩说是她故意留下的，不然晚上就应该全都倒到臭水沟里的。

饥饿至极的我们像得到了山珍海味一样狼吞虎咽地吃起来。这是进集中营以来，我们第一次填饱肚子，尽管这都是变质的食物，我们还是觉得很香甜。可是，这样的食物也不是经常能“偷窃”到的。如果晚上有人将泔水缸倒掉了，我们就什么也得不到了。后来，晚上外面增加了巡逻队，我们就不能半夜跑出房屋，如果被发现，大家都要遭到惩罚。

集中营里的人还在增多，隔一段时间，就要送一批人来。后来犹太人也走进我们这个集中营。听人说，这些走进集中营的犹太人都是有手艺的工匠，是他们的一技之长救了他们的性命。但是带黄胸牌的犹太人是完全没有生命保障的，最受歧视。德国鬼子常常拿他们出气，轻者毒打体罚，重者枪毙绞杀。

这难道就是镜头中的“新家园”吗？死去的犹太人不可能提出这个问题。可是活着的犹太人对他们的生存空间提出了深深的疑问，因为他们并不知道他们的亲人已经魂断毒气室，以为他们生活在另外一个“家园”里，他们的生活空间是不是也像这里一样恶劣？

每一个到集中营的犹太人都是在观看德国人播放的集中营生活影片中，选择了集中营的生活。他们是被那些影片的场景骗到集中营的，那些美好生活的镜头实在让人向往。集中营好像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乐园，老有所养，小有所学，每个人都在愉快地做工、生活，甚至成家立业，养儿育女。

就这样，许多犹太人拱手将土地财产交给德国人，以换取移民到“新家园”生活的许可证。他们在幻想中登上了法西斯为他们精心准备的通往死亡的火车。很多人进入毒气室后，还扬头纳闷：这浴室的水龙头怎么不出水？直到毒气弥漫出孔眼的瞬间才知道受骗了！等明白过来的时候，生命已经伸进了法西斯死亡游戏的套绳里，几乎没有时间咒骂一句，便一命呜呼。

所以，法西斯在行使他们的兽性时，表现出他们文质彬彬极其善意的面容，让人很难相信这就是死神的请帖。

我们进集中营不久，就发现法西斯对待我们孩子也是反复无常，让人琢磨不透。有时他们脸上洋溢着动人的笑容，和我们说这说那的；可不出3分钟，他能突然抬起他的大皮靴把我们踢出很远。

有一天中午，正好是放风的时间。一个德国看守高兴了，拿了一个不知从什么地方搞来的照相机，现在看肯定是从犹太人尸体上搞来的。他把我们几个女孩子叫到跟前，要为我们照相。我们已经很久没有照相了，听

说要照相，小姑娘爱美的天性一下子蓬勃地显示了出来。我们高兴地站在一起，脸上露出了笑容——这一刻，我们忘记了“集中营”这三个恐怖的字眼，忘记了眼前是残忍的德国鬼子，世界在我们眼睛中变得美好起来……

刚刚照了几张，这个德国鬼子突然脸色一变，把相机放在地上，说我们在假笑，在嘲笑他。他举起皮鞭狠狠给了我们一鞭子，对着我们中间笑容最灿烂的女孩说，就你笑得最假，接过去又是一鞭子。

我们尖叫起来，刚才营造起来的短暂快乐，顷刻坍塌如碎片，片片铸刻着屈辱！

美好的瞬间转眼即逝，永恒的黑暗又笼罩在我们的上方！

过了几天，这个德国鬼子又微笑着来了。他把洗好的照片送给我们，一边不断赞扬我们笑得甜，太可爱了，一边摸挲他手里的皮鞭把子。我们被他这种变态的神态吓坏了，谁也不敢说话，不敢笑。

以后很长时间，只要看见他拿着照相机出现在我们的房屋前，我们便忍不住要颤栗起来。那恐惧的感觉，从我看到法西斯脸部表情瞬间即变的一刻起，就深深地铭刻在心头。一辈子不能忘记的感觉，往往是由心灵受伤为代价的。受伤的心比身体上的伤更加疼痛，更加难以愈合！

第五章

暗无天日

- 我们把仇恨化为行动，往子弹盒里吐口水，让子弹变成哑巴
- “天使”一旦变成魔鬼，那么比魔鬼还要可怕
- 天上的月亮一个样，月亮下的世界却是两个样

我们把仇恨化为行动，往子弹盒里 吐口水，让子弹变成哑巴

集中营旁边有个工厂区，从营房区到工厂区中间隔着两道铁丝网和两道防守严密的大门，每个人通过大门时都要经过检查。如果不是上班时间，就要有党卫队长官的亲笔手谕才能通过。站岗的和工厂里的监工不同，前者是德国宪兵，后者是雇佣军。宪兵对集中营囚徒进出这两道大门，防守得非常严密；如果有人违反，惩罚也是非常严厉的。

营房区和工厂区之间就好像是地狱的鬼门关，搞不好就会丧命在这鬼门关的鬼子枪口下。

我们几百名来自苏联、捷克、斯洛伐克、波兰、法国、英国等十多个国家的孩子，被送到集中营兵工厂里干活。这哪里是什么工厂？只不过是一个大得四处透风的工棚。我们的主要工序是将其他车间制造的子弹装进盒子里。我们每天要工作 12 个小时，两只手被冰冷的子弹冰得又红又肿，手背生满了冻疮，一碰，血脓直流，疼痛难忍。时间一长，手掌的细腻皮肤便被磨得像锉子一样粗糙。

在我们旁边还有几个大工棚，其中有一个是分拣物品的工棚。分拣的人把从外头运来的物品，按照物品的类型分拣出来，比如衣服归衣服，文具归文具，鞋帽归

鞋帽，金银珠宝一般都有专门的人负责分拣，这是看守们注意力最集中的物品之一。因为集中营中严禁相互打听，每个人只能说“是”或者“不是”，绝对不能说“为什么”这三个字。一般能说话的范围只是局限在同房难友之间。放风的时候，大家只能相互看看，也不能说话。所以，尽管我们看见一车一车的物品运到工厂区里，但不知道这些物品是从犹太人的身上剥下来的。我们只是心里奇怪：这么多的皮箱、提包，大多数都是完好无缺，很精致的，他们的主人怎么就不要呢？

分拣物品的活儿不让我们孩子去做，说我们年龄小，不会分类，而装子弹的活儿比较单一、好做、轻松。可是从我们第一天干活起，就没有觉得这活儿好做、轻松。

不知哪儿来的那么多的子弹，一大筐子一大筐子地放在我们每个人面前，我们要用油纸将子弹一排排包好，然后装进一个小纸盒子里，等装好24个盒子再装进一个绿色的木箱里，这时我们才算完成一箱子弹的工作量。每天，我们要完成30大箱的工作量才能休息。整整12个小时，我们的双手不停地装啊，装啊，装得双手都麻木了，还不能完成这个数字。

就这样，一年365天，天天要上工，天天经过那道鬼门关。我们像机器人一样，被法西斯的皮鞭驱使，大皮靴踢打，做的是牛马活，吃的是猪狗食。

我们进入工厂区门岗时，往往会遇到搜身。那些站岗的宪兵个个好像长了老鹰的眼睛，忒毒。他们不太看

人群胸前的牌子。因为在他们眼里，牌子上无论是黄色还是白色，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都是他们的囚徒，都是应该下地狱的低级人种。站岗的士兵把眼睛停留在每个经过人的脸上，从人的脸部细微表情去发现行为异常的人。一旦他们看见这样的人，就马上冲进队伍，把那个在我们眼里没有任何特征、极其平常的人拉出来，凶狠地推到铁丝网的一边，非常麻利地搜身。只要是抓出来搜身的人，往往能从身上某一处搜出东西来。

完了——！我们所有在场的人都为这个可怜人惋惜。

被搜出来的东西一般都是食品，在这样的环境中，金银珠宝如粪土，只有食品才是大家向往的“黄金”。为了活下去，人们宁愿冒生命危险去获得一块面包，也不会去拿一块金条的。这是人类生存的规律。许多囚徒在分拣东西时，会拣出吃的东西，特别是孩子的衣服口袋里，有巧克力和糖果。这时人们便会被这诱人的东西刺激得饥肠辘辘，口水直流，想办法藏一两块巧克力，带回营房吃。但是能把食品安全带出来的人很少，许多人想办法瞒过监工的眼睛后却很难瞒过站岗宪兵的眼睛。这样的行为一旦被发现，就必定招来严厉的惩罚。

有时，我们已经回到营房里，却突然听见尖锐的哨声。这种声音一响，我们就知道又有人被宪兵搜身搜出东西了，便条件反射似的往营房前的空地上跑，自觉地排好队，等候宪兵们“杀鸡给猴看”。如果我们中间谁的反应慢了，排队来晚了，也要挨打。

这时集中营上空充满了恐怖的杀气。这个被检查出来的囚徒，被宪兵拖到大家面前，遭受鞭笞，一直打得这个人遍身鳞伤，再也爬不起来才住手。如果是重犯，这个人就要当着我们的面被枪杀，或者吊死。整个屠杀过程不准我们离开，更不允许出声音。大家必须睁着眼睛看着自己的难友遭受折磨，直到断气。

面对这样残酷的场面，我们每个人从心里长出了仇恨的牙齿，恨不得冲上前咬死他们。

然而，人不是猴子！法西斯经常进行的“杀鸡给猴看”的表演，并没有吓倒活着的人们。只要有机会，大家还是想办法偷食品，而且越来越隐蔽，成功率越来越高，就连我们房间也分到过一块巧克力。这建造在许多人生命之上的“偷盗”本领已经日渐成熟，可见绝不是一般水平了。

后来发生了一件惊心动魄的事情，我们才明白：让我们奇怪了好久的物品，原来是“死亡工厂”的产物！在法西斯剥夺犹太人的生命后，又掠夺了他们的财物。

一天下午，下工不久，我们个个饿得两眼发花，等着吃晚饭的哨声。哨声终于响起来，我们拿着碗刚想往外跑，一听，不对呀，是紧急集合的哨声，我们只好放下碗，跑步到空场上……一到空场上就发现气氛很恐怖，宪兵跟前有个大狼狗，呼哧呼哧吐着血红的大舌头，不知又要拿谁开刀了！

“扑通”，一个矮个子犹太人被推在地上。要是以前，

被惩罚的人一般不会挣扎，任随他们鞭打，一副生死听天由命的淡漠表情。可是这个人不一样，他被摔在地上后，迅速用双手撑地，扬起鲜血淋淋的脸，嘶哑着喉咙大喊：“他们杀了我的全家！你们看，这是照片！”

他从腰的后面，刷地拉出一张全家合影照片，但不等他把照片举起来，狼狗呼地蹿了上去，一口咬住他的手。犹太人惨叫一声，照片掉在了地上，随即被风吹卷到了一边。犹太人望着失落的照片，好像失落了所有的希望。他疯狂地挥舞着血淋淋的双手推搡着撕咬他的狼狗……

“法西斯杀死了我的全家，我的妻子，我的儿子，我的女儿，我要和你们拼命——！”

浑身是血的犹太人迸发出毕生的力量，用凝聚毕生仇恨的拳头，击打在狼狗的前额上。狼狗发出一声毛骨悚然的长嚎，摇晃了几步，四条腿一软，摔倒在地上。打倒狼狗后，犹太人弓着腰发出疯狂的大笑，冲向站在一边已经吓傻的宪兵……但没等他冲到跟前，枪响了，子弹击中了犹太人的前胸，鲜血马上喷了出来。他睁着两只血红的眼睛，一动不动地站立在宪兵跟前，许久才直挺挺地摔在地上……

我们被这意外的场面惊吓出一身冷汗，心脏咚咚地猛跳，心底深处发出强烈呼唤：“勇敢的英雄，起来啊，站起来啊！”可是，他没有再爬起来，和他的家人一样永远地长眠在法西斯的屠宰场上。

整个惊险搏斗的场面几乎发生在一瞬间，一切又归于死寂。

因为饥饿和紧张，我的胃开始向上反酸水，一个劲地想呕吐。我拼命忍着，忍得眼睛一阵阵发黑，要不是身边的姐妹用手挽着我的胳膊，我肯定会晕倒的。

不一会儿，倒在地上的狼狗摇摇晃晃地爬了起来，狂叫着乱转，好像这畜生的神志有点儿混乱了，一会儿要扑向给它终身耻辱的犹太人，一会儿扑向自己的主子，好不容易宪兵才拉住了发疯的狼狗，稳住了自己的阵脚。

过了好久，宪兵确信那个可怕的犹太人真的死了，才敢上前拖尸体。

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个犹太人是铸造金银的工匠。这天，宪兵给他一个银质像架，叫改成银酒杯。他一看，浑身像筛糠一样颤抖起来。这不是他家装合影照片的像架吗？照片上的妻子儿女那熟悉的笑容，他什么时候都不会认错的。这时他才明白，法西斯说送他的家人去另外集中营过幸福生活全是鬼话，他的家人已经被杀害了！被杀害了！

失去理智的他把像架带出大门，当然，他愤怒的表情是无法瞒过宪兵的，于是被发现了，但只是搜出了银质像架。他把照片折叠成条掖在皮带下，没有被搜出来，所以才有他向大家展示照片的那一幕。

犹太人死了，死得惊心动魄，死得如此惨烈，让我们好久都觉得心里隐隐作痛。再看见一车车物品运来，就

想呕吐，好像看见一条条赤裸的尸体。这些不会说话的物品都是法西斯屠杀无数无辜生命的见证！

犹太人事件给我们的刺激太强烈了。这以后，我们也开始琢磨如何反抗。

听人说子弹受潮就会变成哑弹。我们为什么不往弹壳上洒水，让子弹生锈？等德国鬼子把子弹运到前线，子弹都成了废品，让他们打不响枪。

我们几个女孩子就开始商量如何才能把子弹搞湿。我们不能带水进工棚，不可能往子弹上洒水。最后还是米拉脑袋快，说我们趁监工不注意时往子弹盒里吐口水，弹壳不就湿了吗？

对呀，这是个好主意！我们高兴得直鼓掌。这时不知谁带头轻轻哼起了苏联的歌曲，我们都跟着唱了起来。

“嘭嘭……”外头巡逻的德国鬼子听见我们的歌声，跑来砸门。

我们停下歌声，谁也不吭气，让德国鬼子砸门好啦。

“嘭嘭……”又是一顿砸门声。德国鬼子见我们不开门，就狠狠地警告说：“再唱把你们全拉出来冻死！”

外面又恢复了宁静，我们笑了起来。

在集中营里，我们已经修炼到听见鞭打不心跳、看见死刑不眨眼的程度。不知这是勇敢还是麻木？是喜剧还是悲剧？

这个扭曲的环境把人塑造成了什么样子？一面是杀人不眨眼的魔鬼，一面是挨杀不能叫唤的绵羊，魔鬼和

绵羊，杀人和被杀之间，都是同在一个蓝天下、同一个人类之间进行的。

第二天，我们怀着激动且紧张的心情走到自己的工作台前，那上面已经放着一个大筐子，里面是黑亮黑亮的子弹。我们个子小，被大筐子一遮挡，监工走远一点儿就看不见我们了。监工一走开，我们就往子弹盒里拼命吐口水，每吐一口，心里就有一种快感。到了下工的时候，我们嘴里干苦干苦的，嗓子眼儿直冒火，连话都说不出来了，但大家一见面，都咧开干裂的嘴，会意地笑了。

后来，前线退回来不少不合格的子弹，以为是制造车间的质量问题，谁也没有想到会是我们这些小囚徒的口水作祟。现在想想，我们这种办法未必就能使所有的子弹变成哑巴，但力量单薄的我们又无法作出惊天动地的大反抗，只有用这种办法表达我们的仇恨！

到了1944年，德国法西斯开始节节败退，前线需要的子弹越来越多，我们劳动强度越来越大了。终于，我支撑不住了，病倒了，病得很厉害。面对更加残酷的地狱，我依然一个念头：活下去，一定要活下去！

**“天使”一旦变成魔鬼，
那么比魔鬼还要可怕**

我发低烧已经很长时间了，怕被德国鬼子发现了送

隔离室，就一天天痛苦地熬着。有一段时间，夜里经常被噩梦惊醒，醒来时浑身大汗淋漓，右侧脖子肿胀不堪。那时到底是个孩子，不明白身体真有了病是硬挺不过去的，老是等待哪一早晨起来，所有的肿块都奇迹般地消失。

终于这一天早晨来临了，来临的不是奇迹，而是恶化。

这天早晨，我在营房前的水槽洗脸，感觉脖子上老是湿乎乎的，擦干了又湿了，就用手摸摸。一看，吓我一跳，哪来的脓血？

我捂着脖子回到房间，拿出小镜子一照，看见右边脖子上的肿块破了，脓和血从破裂的口子里往外渗。扭了扭脖子，奇怪，疼胀的感觉减轻了许多。我想起了小时候一次长疖子，肿胀疼痛了好久的疖子，像熟透的桃，油光光包的全是脓血。那回，外婆用消毒的针挑破表皮，让化脓的液体排出来。没有几天，疖子就结疤，好了。这次脖子上长的是不是疖子？如果是疖子，一出脓，肿块就会消掉的。想到这儿，我的心情和脖子上的感觉一样，轻松了许多。

我用一条已经破了角的手绢，包住脖子，再在外面穿上高领的毛衣，把流脓的脖子遮盖了起来。

连续几天，我带着淌脓的伤口去做工，可是脖子上还是不断渗出黏黏的液体，丝毫没有好转的迹象。相反，溃疡的面积越来越大，脓血往外渗透得更加厉害。有时

手绢浸透了，又沾到衣领上，不久毛衣领子也被脓浆糊得硬邦邦的，磨得脖子的皮肤生疼。

如果光是伤口流血流脓，人还能忍受。可是断断续续的发烧把人拖得够呛，一天中，好几次掉“冰窟”，又好几次进“火炉”，热热冷冷，反反复复，把人折磨得无精打采，不死不活的。来自身体内部的信息似乎越来越不妙，越来越和疖子之类的疾病相差甚远。一直亢奋的食欲变得连少得可怜的面包都不想吃了，整天觉得两条腿像灌了铅似的提不动。

我的心情不由得又紧张起来，莫不是生了什么大病？病到如今，紧张害怕有什么用呢？人在生死边缘，一切只能听从命运的安排，能撑一天算一天吧。

一天我刚起床，顿时天旋地转，一头倒在地上，失去了知觉……

醒来时，发现自己睡在一间白色的房间里，扭头看看，橱柜上有许多药瓶子。我猜想是集中营的医务室。这时，窗户上出现了姐妹们的脸，我想可能是她们送我来的。我真感激她们，每次我遇到困境，都是她们千方百计帮助我战胜困难，为让我这来自中国的生命之帆在这片死亡的苦海上不被狂风撕毁，不被雷电击摧，她们尽最大的努力保护着我，关怀着我。

为什么我们六个异国姐妹能活到战争结束的一天，能走出死亡集中营的铁丝网？就是因为在我们苦难的生命中流动的不只是一个人的血液，跳动的也不只是一个

人的心脏，而是许多人的血液和心脏在共同不幸的命运中一起流淌，一同跳动。

如果一个生命能在没有阳光的黑暗中存活，那么这个人的心灵上一定有无数的温暖的“阳光”照亮着、鼓舞着。

我就是这样一个不幸且万幸的生命！

这次我说什么也要挺过去，再大的痛苦也要忍受住，一定要活着和姐妹们从这个非人的地狱中走出去！

我正在暗暗给自己打气鼓劲时，隔壁的门响了。从房间里走出一个高个子、戴着金丝边眼镜、穿着白大褂的德国狱医。从他刚才和负责我们工区的监工头谈话中，我已经知道我患的是淋巴结核，说是开刀把脓放出来就会好的小毛病。医生的话似乎暗示工头，这个小孩得的不是大病，手术后还能继续干活。工头放心地走了，他不是放心我的病情，而是放心他不会因此减少一个劳力。

工头留下两三个姐妹在医务室门外等我出来，然后拿着鞭子，把那些多余的人都赶到工厂继续做工。

虽说我是第一次进这个医务室，但早就听说这里的狱医连兽医都不如，对病人比对牲口还要凶残。碰到特殊病例，他们就会将这个可怜的囚徒当做一只饲养在铁笼里的大白鼠，反复进行试验，直到这个病人不堪痛苦、被折磨断气为止。

我心里抖抖的，不知道这个医生对我会像哪类动物，大白鼠还是马骡子？

这个德国医生戴上白色口罩，斯文的动作无法让人和“凶残兽医”的字眼联系起来。别人所说的或许不是这个医生。我侥幸地想。

医生“武装”完备后，用毫无表情、深陷的幽蓝眼睛看了我一下，用生硬的俄语问：“从哪里来的？”

我愣了一下，说：“白俄罗斯。”

“不！你不是俄国人。”他尖叫起来，好像要揭穿欺骗似的，充满了警惕。

“我是中国人，我是从……”我想解释，但被他阴冷的声音打断了。

“噢，支那人，黄皮肤的支那人，东亚病夫……嘿嘿……”毫无表情的医生发出了狰狞恐怖的笑声。

这是法西斯的笑声！我熟悉它。

我肌肤上滚过一层鸡皮疙瘩，浑身打了个寒颤，禁不住又望了他一眼，正好和他鄙视的眼光相遇。我知道，这次我是在劫难逃了，我在这个魔鬼眼睛里甚至不如一只大白鼠有试验价值，充其量不过是在一个会呼吸的动物、而且是来自东亚病夫国度的动物身上割一刀。

我闭上眼睛，不想再看这个披着天使外衣的魔鬼在干什么！天使一旦变成魔鬼，比魔鬼还要可怕。我反正已经落在了魔鬼的手里，不死也要活剥一层皮！

我感到冰冷的器械在脖子上移动，一会儿闻到一股刺鼻的酒精味，我想这可能是在消毒吧。我紧张地直硬着脖子，等待注射麻醉针……突然，我感到脖子上一震，

撕心裂肝的疼痛直刺神经末梢，顿时，浑身不由自主地像被抽了筋似的弹了起来……

原来，这个失去人性的医生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就用手术刀割开了我的脖子！

我拼命地哭叫、挣扎，想从这魔鬼的手术刀下逃出去。可这个法西斯用大手死死按住我，继续用刀切割伤口。我无法忍受这般剧痛，浑身不住地扭动，眼泪像断线的珠子，滚滚而流。

我惨痛的哭叫丝毫没有引起这个魔鬼的怜悯。他继续用手术刀切割我的伤口，好像他的手下躺的不是有血有肉的人，而是天生就是任人宰割的动物。

那一次惨无人道的手术给我的心灵留下了永远痛楚的创伤。有一段时间，我一闭上眼睛就会看见一个屠夫用刀宰割羔羊的可怖画面。

我的脖子渐渐麻木了，眼前出现了胡乱飞舞的金星——死神出现了，它往往在一个垂死灵魂哭诉时出现，它微笑着召唤我跟它去天堂……地狱里的魔鬼嘴脸变得模糊了，好像白纸一样飘远了，消失在黑暗的尽头，所有的疼痛也离开了我的躯壳……

我疼得昏死了过去。失去知觉的一瞬间，我以为这就是终身的解脱！

手术刀下的羔羊不再动弹了，这个魔鬼医生也完成了他“人道主义”的手术。他取下口罩，用手招招外面的姐妹们，叫她们把我抬回去。

我在姐妹们的怀抱中慢慢地苏醒过来，死神没有收留我，让我继续在地狱里磨难。

这场浩劫般的手术后，病情有了一定的缓解，脖子不太肿胀了。然而，我的淋巴结核不只是手术能根治的，他们又不给我服药，又不让休息。没隔多久，旧的创伤还没有愈合，新的肿块又出现了，而且这次肿块比以前还要大。

反正我这次横下一条心，就是把脖子烂掉，也不让这个法西斯魔鬼治疗了。

天上的月亮一个样，月亮下 的世界却是两个样

集中营的夜空也有又圆又亮的月亮。

每逢这轮明月爬上我们的窗棂，我都会觉得胸襟为之一畅，感觉这月亮好像是一望无际的地平线，宽广得能看见自己的家乡、看见自己的亲人一样。

我们毕竟是孩子，一看见有生气的东西就容易动情，精神也会变得欢快。大概渴望自由的人最大的快乐就是获得一望无际的感觉，让沉重和压迫感的心灵在宽广的空间不受拘束地自由回旋，使得受囚禁的身体也获得一点点超脱后的松快。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在渴望一望无际的感觉的同时，还渴望有一个活蹦乱跳、能说能笑的空间，让身体和思想自由自在地活动。如果在今天，这种

“渴望”也许会让许多孩子发笑，谁生下来不是一个自由体？不是无愁无忧地生活？还需要去渴望？

可是，集中营里的孩子连生命都没有保障，哪里还谈得上自由的空间！

每天 24 小时，吃饭、上工、下工、睡觉、起床，如同时钟上的刻度，死板而准确。傍晚，只有放风的时间，是属于自由活动的时间，但是大家不能相互交谈，不能相互认识。所以，蹲了几年集中营，竟然不认识隔壁房间里的人。在以后大逃亡时，大家也都不认识，只顾自己跑，结果跑散了许多人。

我们在没有自由的空间里，怎么能对一望无际的月光不动情？

对于明月，我和其他国家的孩子不同，有着特殊的感情。因为在我们盛产神话的国度里，很小的时候就听大人讲嫦娥奔月的故事。人们给月亮上的阴面光斑赋予了生命，让无声无色的月亮变得鲜活起来，这个鲜活的月亮照亮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一遇见月亮圆，就仰头想念嫦娥，借景思情，抛撒心中的情愫。久而久之，明月成了思念亲人的象征，也成了安慰思乡人的信物，希望明月把美好的祝愿捎到亲人身边。

我就是在外婆动人的月亮故事中长大的。我喜欢明月，胜过喜欢给予万物生命的太阳。

大人常说月亮上的嫦娥和玉兔居住的冷宫很寂寞，可我觉得她们不寂寞，因为成为永恒的东西是不会寂寞

的，不然人们为什么总是不能忘记她们呢？寂寞意味着被遗忘。

我们到东普鲁士集中营也一年多了。月亮圆了缺，缺了圆，可是，生活在地球上的人们，何时才能结束战争？何时才能团圆？这400多个日日夜夜，我无时不在思念远在中国的亲人：我的外婆，我的姨妈和我的爹爹。他们生活得好不好？他们知道我在哪里吗？

我希望不知道。特别是我的外婆，如果知道我在德国集中营，一定要哭坏身体的。还有爹爹，我不希望他为了我分心，因为他有比女儿生命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月光透过木板条的窗户，冷冷地照在我的床头。同是一轮明月，集中营的明月要比任何地方的明月冰冷清寂得多。

以前让人感到温馨的时刻莫过于明月当空的时刻，全家人围坐在一起，看着明月，讲述明月的神话，所有在白天经历的疲劳和学习的压力，在这一刻，化为月光下淡淡的烟缕，从心头上飘走了，只有银白的月光和动人的故事让我们心醉，直到我们上床睡觉，整个身心陷在神话中不能自拔。

梦境如此美好而飘逸，恐怕只有明月当空的夜晚了。

记得在延安时，一天月圆皓亮，寒风中，月光洒在黄土大地上，原来黑沉沉的山沟沟，被月光照得明晃晃的，远处的山，近处的树都历历在目。经常熬夜的爹爹，他可能看见窗外的明月光，走出烟雾缭绕的窑洞，坐在

大树下面的石凳上，默默出神。

我正好晚饭多喝了几碗玉米粥，夜里起来解手。我披着棉袄从茅坑跑回窑洞时，猛然看见石凳上坐着个人，吓得打了个颤，壮胆大声问：“是谁？”

“小声点，别把别人吵醒了。”

“是爹爹啊，可把我吓死了，我当是大豹子呢？”我和爹爹开玩笑。

“快回窑里，外面冷。”满脑袋想大事情的爹爹，无心和我开玩笑。

“你也回去嘛，要不，我也不回去。”我怕爹爹在外面时间长了会受凉，就撒娇说。

爹爹笑了，大手一拍膝盖，起身陪我进了窑洞：

“今天的月光真好，坐在外面透透气，很清冷，现在再看东西，眼睛就不发花了。”

我上炕后，爬到窗口，朝外望了望，发现北方寒冬的圆月和南方湿润的圆月同样可爱，有一种冷峻的美丽和粗犷的奔放。

现在和以前同在一轮明月下，可月光中的世界却已不相同。

延安的那轮明月早已不复存在。我现在面对的是一个像墓地一样死寂的白夜。它的四周没有树木，没有山河，只有高高的铁丝网和炮楼，月光下，越发显得刺刺磷磷，阴森可怖。不时看见端着枪的德国鬼子从铁丝网下走过，大皮靴踩在沙土上，发出喀嚓喀嚓的声响，好

像要把这冰冷的夜色踩碎一样。可能因为月光明亮的缘故，探照灯没有打开，让我们有机会看见天上的月亮和星星，看见洁白的月光和月光下难友们惨白的脸庞。

我又从身下铺板缝里取出列宁纪念章，团在粗糙的手心里，用指头轻轻抚摸这很有质感的纪念章。尽管这枚纪念章很小，但在我心中的分量却很重很重。每次抚摸，我心里总是涌上一种冲动，觉得明天我们就会从这个地狱中出去，回到亲人的身边。这种冲动常常让我兴奋，带着兴奋的希望走进梦乡。可是天一亮，头天晚上积攒的希望被日复一日的苦活儿、鞭打和黑面包消耗殆尽。但一回到宁静的夜晚，希望又腾升了起来，就和日落日出一样，一天天地支撑着苦难的日子。

有时候，我一个人在黑夜中默默和自己说中国话，我害怕忘记了自己的母语。可是，说着说着就跑音走调，甚至遇到复杂的语句，我竟然想不起来应该怎样说了。这让我很惊恐，问自己：我还是中国女孩吗？

是，当然是！心底另外一个声音倔强地回答。

中国，这个亲切且遥远的称呼在我的心中越来越沉重，越来越害怕：我害怕失去它，也害怕它遗忘我。

从1941年春离开延安到现在，已经整整4年没有听见人说中国话了，自己也没有说过一句中国话。跟在难友们后面学会了俄语、捷克语、波兰语，到集中营后又学会了德语，一开口就是乱七八糟的语言，说着说着，自己都不知道说到哪个国家的语言上去了。用了那么多国家的

语言，唯独没有用过自己国家的语言，这对于一个热爱自己国家的人来说是非常悲哀也是非常无奈的事情。

在集中营好似墓地般死寂时，世界各地的战场已经进入决定胜负的决战中，大形势基本趋于明朗。自从法西斯兵败斯大林格勒，世界的战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苏军已由战略防御向战略进攻转变。一直攻打别国领土的法西斯，开始品尝受人进攻的滋味，开始不得不大规模地往后撤兵，妄图保住欧洲战场霸主的地位。

我们的工活儿也越来越重，有时常常要干到半夜才让我们收工。我们虽然不知道铁丝网外面的世界发生了什么变化，但我们从不断送来的战俘口中，得知了许多令人欢欣鼓舞的事情。

大量战俘的出现，给集中营带来了生机，也给我们带来了希望。这些军人不怕法西斯宪兵，他们敢说敢干，甚至敢逃跑。法西斯宪兵一般也不招惹这些战俘，除非对逃跑抓回的战俘才开杀戒，往往是秘密处决，然后对外说是病死，还要搞一个尸体鉴定报告，以备调查。因为战俘和一般囚禁的人不同，他们的名字和档案都有记录，随时要接受中立国战俘调查委员会的检查，所以法西斯不敢像杀害犹太人那样草率地杀害战俘。

曙光已经来到了这块死亡之地的边缘，很快就要冉冉照亮我们的前额……

第六章

断肠天涯

- 爹爹惦记我，寄出一封信，两个月后信又原封不动回到爹爹手里
- 法西斯灭亡前夜，苏联红军反攻战斗中的一道特殊命令
- 爹爹失去了母亲，从不动感情的爹爹为此痛不欲生
- 爹爹用博大的爱心呵护着延安的孩子，“小太行”也管他叫爸爸

爹爹惦记我，寄出一封信，两个月后 信又原封不动回到爹爹手里

就在我日夜思念亲人而心痛不已的时候，爹爹好像知道了万里之外的女儿正在冰冷的明月下苦苦地思念，他从遥远的延安写了封信给我，寄往莫斯科国际儿童院。尽管爹爹寄这封信的时候，已经估计到苏联因卫国战争可能交通隔绝，根本无法通邮，但他还是寄出这封信，希望碰碰运气。两个月后，信正像爹爹事前预料的那样，原封不动地退回到手里。没有办法，这条好像没有尽头现在又被战火封锁的天涯路，爹爹只有等待，等待战争结束，才能把这封写了许久许久岁月的信寄出。这时在爹爹的内心中，不安和挂念也许仅仅来自女儿也置身战争的国家。

我从苏联失踪的消息，正像这阻隔的天涯路，被战火阻隔了。

我离开延安是1941年春天，从这时起，中国抗日战争进入了后4年的烽火岁月。

这4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为艰苦的4年，是人类用正义战胜邪恶、最终赢得胜利的4年，也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付出巨大代价的4年。

虽说我到遥远的国外学习，但毕竟是远离战争的，这在爹爹心中是一桩“放心”的牵挂。反而留在延安的儿

子、我的哥哥朱琦让爹爹操了不少心。爹爹对子女一向很严格，绝不允许搞特殊。哥哥有时犯了错误，爹爹总是狠狠批评他，让哥哥永远记住爹爹只是人民中普通的一员，爹爹的儿女也是人民中普通的一员，没有任何理由和别人不一样。

“子不教，父之过”，这是爹爹在接受十多年私塾教育中，铭刻牢记的一条古训。

教育孩子当然不是爹爹的主要工作，只是见缝插针，不失时机而已。他的主要工作日程是非常非常紧张的。他要经常往返在太行山和延安之间，有时要在太行山八路军总部指挥八路军作战，有时又要回到延安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一同制定重大决策。

太行山距离延安有数百公里远，要经过黄河、汾河、终年积雪的绵山和十八盘大山。爹爹和副总司令彭德怀在1937年底率八路军115师、120师和129师先后渡过黄河，拉开中国共产党八年抗战的序幕。八路军总部在太行山深处辗转了3个省38个县（市），驻扎过66个村镇，是太行山的人民用小米和热炕头养育了八路军总指挥部。爹爹他们和太行山人民结下了深厚的感情，这根感情纽带一直维系到解放，维系到爹爹生命终结的时候。

中国那么大，为什么八路军总部要选择山高路远、荒凉闭塞的太行山作为总部？我到延安一个多月时间，因为老是看不见爹爹，心里就常埋怨。

我长大后，了解了中国的地理环境，才明白父辈们

在那场艰苦卓绝的战争中选择太行山作为指挥中心是用了一番心计的。

太行山位于山西、河北和河南三省的边界。它的西面是吕梁山，北面是五台山，南临黄河，东接冀鲁平原，是控制华北五省咽喉的枢纽地带。八路军总部扎在太行山就等于在日军妄图打开中国西北部大门和东南登陆日军会师的路途上，竖起了一道无法逾越的屏障，像一把尖刀插在敌人的血脉丹田上，使敌人上下无法贯通。

1941年6月，德军突然进攻苏联，给日军嚣张的侵略气焰注入了汽油般的原料，疯狂的烈焰迅速席卷中国大地，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走向颠狂的高峰推波助澜。一场更加残酷、更加持久的战斗在太行山展开了。1942初夏，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在指挥总部转移时壮烈牺牲。已经安全转移出去的爹爹，猛然听见这个噩耗，无比悲痛，流着热泪，在太行山下的草屋里，就着微弱的小油灯，写下了他怀念和崇敬的诗句：

名将以身殉国家，愿拼热血为吾华，

太行浩气传千古，留得清漳吐血花。

只要八路军总部存在一天，日军就一天不能安心睡觉。他们将八路军总部看成背上之芒、喉中之鲠。八年间，太行山一直是日军重点攻打的目标，而八路军总部凭借有利地形，一边和日军展开游击战，一边担负起指挥中国敌后抗战的重任。太行山给了八路军一个杀敌的好战场，也给了侵略者一处好坟地。

太行山正如当地人形容的那样：太行山似海，波澜壮天地，山峡十九转，奇峰当面立。

有了这片如此神奇的热土，八路军怎能不赢得这场战争的最终胜利？

爹爹是一个不善言语、爱沉思的人。他的内心活动往往不是及时借助语言表达出来，而是独自思考反复琢磨直到成熟后，才会用行动表达出来。为什么爹爹指挥战役往往以胜利告终？无不和他的独特性格和深思熟虑的习惯有关。每逢大战在即，他总是身先士卒，深入火线，用和阵地紧张气氛相反的稳重语言，让部下充分领会他稳打稳扎的战术。他这种沉着坚定的指挥官形象给部队带来了胜利的信心。

爹爹是一个身经百战、经验丰富的军事指挥官，也是一个有着成熟心理活动的政治思想家。在我这个女儿眼里，爹爹的伟大正是在我们面前表现了一个父亲最平凡的情怀。这种情怀，让我感受了爹爹心中那股炽热的父爱。

战争在世界各地疯狂地蔓延，从陆地到海上，从东方到西方，从南天到北国，无处不听见战争的枪炮声和人民饱受苦难的呻吟声。从苏联卫国战争一爆发，爹爹就有了承受最坏消息的思想准备，加上我到苏联后一直没有写信给爹爹，更增添了爹爹的不安。现在想起来，我真不能原谅自己。刚到莫斯科的时候，一心想等有了学习成绩再给爹爹写信汇报，结果错过了通信的机会，直

到被德军囚禁，失去自由的我才明白：我或许永远失去给爹爹写信的机会了。这个遗憾整整伴随了我4年，直到重新提起笔，才把这个沉痛的遗憾还给了历史。以后，无论我到哪里，都不会忘记给爹爹写信的。1964年我到农村参加“四清”运动时，就经常给爹爹写信，汇报工作和生活情况。因为我知道，我的每一个信息对于爹爹都是很重要的。特别是爹爹到了晚年，写信和看信成为他生活中一项重要的内容，看见孙子们从四面八方寄来的稚嫩字体，他总是戴着老花镜认真地逐字逐句地看，然后又认真复信。

从1941年春天到1945年夏天，将近5年的时间，我让莫斯科这个亲切熟悉的地名成为爹爹信箱里长久的空白！

长久的空白，让爹爹越来越不放心。他在1943年10月写了一封我永远也收不到的信。他在信上写到：“你在战争中应当一面服务，一面读书，脑力同体力都要同时并练为好。中日战争要比苏德战争更迟些结束。望你好好学习，将来回来作些建国事业为是。”

这封来自延安的信在国际邮路上遭受战火的阻击，无法到达莫斯科国际儿童院，在边境线停留了一个多月，最后以邮路中断、无法投递的理由退回到延安。

康克清妈妈接到这封退信，心里更加着急，趁爹爹回延安开会的机会，她就央求爹爹通过延安电台，给苏联最高统帅斯大林发份电报，问问女儿的情况。

爹爹愣愣地看着手里的退信，许久没有说话。

此时，爹爹心里斗争很激烈，他已经听说了苏联高级将领的孩子在卫国战争中，被德军俘虏，当认出是高级领导人的孩子后，立即被法西斯关进集中营当做重要人质向斯大林讨价还价，以换取他们被苏军俘虏的高级将领。面对选择，斯大林痛苦地狠下一条心，拒绝了法西斯的要求。最后，法西斯残忍地杀害了这些孩子。

这时，爹爹怎能向斯大林打听自己的孩子？

“现在，苏联都在战争中，我为了自己的私事怎么能打扰苏联政府呢？如果孩子没有事情更好，万一出了事，我们也救不了她，还是等战争结束以后再说吧。”

是啊，如果爹爹知道我在德国集中营，又能怎样呢？他和斯大林一样，绝不会为了保全自己的孩子而作任何妥协。当时我离开中国时，爹爹怕我遇到意外事情暴露身分，特意为我起了“赤英”的化名，在这场灾难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保护作用。所以，我的命运要比苏联将领的孩子幸运得多。

康克清妈妈见爹爹说得有道理，就默默收起了这封退信，不再提寻找女儿的事情了。

直到1951年夏天，我从莫斯科放暑假来到北京爹爹身边，才看见这封被岁月封锁了八年的信。信的纸张已经发黄发脆了，但是毛笔书写出来的浓重墨迹，让我强烈地感受到了爹爹给予我的厚望。当时，我心头涌上了说不清是酸还是甜的滋味。如果不去莫斯科学习，或者不

去苏联南方疗养，我的命运将会是另外一个样子，我的学业也不会拖延到成年后才开始，身体也不会被搞垮，说不定现在已经能够为祖国建设发挥自己的作用了。但是，过去的岁月是不能重新再来一遍的，人在命运的征途上，只要某一步跨到另外一条路上，以后所有的脚步都要踩在这条路上，不管这条路上是鲜花，还是荆棘。

路在脚下，必须走下去！

我收起信，默默下定决心：加倍努力，把失去的时光夺回来，早日完成学业，回来报效祖国，让爹爹的希望变为现实！

法西斯灭亡前夜，苏联红军反攻 战斗中的一道特殊命令

黎明的钟声敲响了 1944 年的大门。

集中营里没有钟声，也没有迎接新年来临的爆竹声，和任何一个黑夜一样，除了死一般的寂静，就是浓浓如墨的漆黑。对于失去自由随时都会死去的人们来说，新年旧年没有什么区别，都是黑暗无边的长夜。

可是，这一年的确和任何一年都不一样，这是以后历史所证明的。

不管集中营里的难友们如何心灰意冷，毫无希望，然而这一年从铁丝网缝隙中吹进来的风的确让一颗颗冰冻的心开始复苏。

这一年的夏季成为一个象征！

随着春季脚步的挺进，温暖的和风将北半球的人们送进了生命旺盛的夏季。世界战局也像这转变的季节，正义军队的脚步声渐渐临近，惊动着整个欧洲战场。

6月6日，这一天是欧洲开始进入夏季的日子。这一天，由美英法等国组成的多国盟军部队在法国的诺曼底登陆；从这一天起，欧洲反法西斯第二战场的形成，预示着法西斯灭亡的日子指日可待。

当然，我们关在集中营，不可能知道这一天所发生的事情，更不可能想象这个震惊世界的军事行动如此迅猛，迅猛得连法西斯都来不及组织抵抗，诺曼底这块战略重地就莫名其妙地丢失了。

我们知道欧洲开辟第二战场已经是1944年的秋季了。那时，集中营里送来的不再是平民百姓身分的人，而是穿着各种军服的战俘。开始我们只是从法西斯加强看守中察觉出集中营可能要关押重要犯人了。因为每次押来战俘，集中营都要戒备森严，直到战俘押送到其他集中营，这种森严的戒备才会缓和一些。不几天，我们看见好几十个战俘迈着整齐的步伐走进集中营的大门，在走过我们这些惊呆了的人们身边时，还高喊口令，那威严高昂的神情就像通过检阅台一样，令我们所有难友激动不已。他们一出现，就成了我们眼里的战斗英雄。后来这些战俘每天都保持着军人正规的步伐和威严的神情，甚至放风时，他们也都保持军人的姿态，不是笔直

地站立，就是端坐，一举一动决无半点马虎。

我们隔着铁丝网好奇地看他们，觉得他们哪里是被囚禁在集中营？好像他们是在某军事基地接受训练，时刻都准备重返前线那样认真。有时，德国宪兵看见他们整齐地操练，也不靠近，只是从很远的哨位上用冷漠的眼光注视着他们。

这一刻，我仿佛感受到他们不屈服的军魂在呐喊。或许这些军人在参战前是平常而平淡，甚至有点慵懒的人，可他们一旦走向战场，便会变得无比英勇和激昂。这时我更相信一句名言：军人是和平的天使，战场是军人的归宿。

别看集中营有密匝匝的铁丝网和黑洞洞的枪口，这只能关住军人的身体，却关不住军人向往战场的灵魂。从这些被囚禁却斗志昂扬的战俘身上，我懂得一个道理：一个人可以遭受磨难，可以失去生命，但任何时候也不能丢失做人的尊严！

虽然我们每天都能看见战俘，却不能交谈。但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没有多久我们就知道了欧洲战场的形势，也知道苏联红军正在收复南方失陷的城市，不久就要打到波兰和德国境内，最后还要攻占柏林。

简直不可思议！这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让我们几个姐妹兴奋了好几天，没事大家就围在一起，开始乐颠颠地憧憬未来！

想起来真好笑，我们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就立下了若

干个志向，什么出去后要成为一名“敲碎德军骨头”（这是丘吉尔的名言，被引用为参战的意思）的反法西斯战士，什么一离开集中营就去学习，什么回家和父母团圆……说来说去，大家觉得一出去还是先饱餐一顿再说。我说我最想用中国的筷子吃一顿家乡小吃。大家都不明白筷子是干什么的，我就向大家比划拿筷子的样子，希望她们也和我一起用筷子。米拉比划了一阵，好不耐烦地挥挥手，这不行，会让我馋死了，还是用西餐的餐具吃得痛快。那迫不及待的模样，就好像真有一桌饭菜在等着她似的，搞得我们都忍不住流出了口水……

米拉的姐姐弗拉斯塔很冷静，打断我们的幻想说：“什么中餐筷子，西餐叉子的，如果能活着出去，用手吃一顿也行啊。关键是我们必须要活着出去。法西斯不会轻易举手投降的，越是灭亡越要垂死挣扎，说不定会大屠杀的……红军要是快点打过来就有希望了，我们就会有救的。”

顿时，我们美好的憧憬被她恐怖的猜测激出一身鸡皮疙瘩，跌进刺骨的冰窟窿里。

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在我们盼望苏联红军快一点儿打来的时候，一道特殊的命令从苏联元帅朱可夫手中签发出去了，这个命令居然和我们这些失踪孩子有关。

在1943年2月2日，历时180天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结束后，已经精疲力尽的苏联红军没有休整一天，便乘胜追击，开始了反攻收复失地的战斗。

保卫战刚结束的时候，在顿河草原、伏尔加河畔，深深的积雪中到处是被击毁的德国坦克、火炮、汽车和冷冻的尸体。死神和严寒把这幅血迹斑斑的图案冰冻在寒风中，将苏联红军的战绩保存了很长时间。

历史就是这样公正，公正得不容半点偏差。就在法西斯穷凶极恶大量掠夺苏联财富和人力资源的同时，他们的大量的士兵和军官也永远地留在了苏联的战场上，还有数万名战俘成为红军的战利品。

这场闻名世界的战役，德军共损失兵力 150 万，坦克 3500 辆，火炮 12000 门，飞机 3000 架，包括总司令保卢斯元帅在内的 23 个将军统统成了斯大林的俘虏。

赢得这场战役胜利的第二天，苏联红军进入了战略反攻阶段。

战争局势终于可以让苏联最高指挥部的首脑们，坐下来品上一杯威士忌。

这时，莫斯科国际儿童院在战争中战死和失散孩子的名单也可以送到斯大林的桌子上了。这次战争中，国际儿童院共失去了二十多名孩子：中国孩子中有张闻天的儿子被德国飞机炸死，赵世炎的儿子因患病治疗不及时去世；我和弗拉斯塔姐妹、还有黄平的女儿失踪；其他国家的孩子有 17 人在战争中作战牺牲，他们用热血和生命捍卫了第二故乡的尊严和完整。这 17 个牺牲的同学中有德国人、古巴人、波兰人、南斯拉夫人、保加利亚人、希腊人。

中国孩子没有上前线作战，是因为周恩来和斯大林在战前有过口头协议：即使苏联爆发战争，中国 18 周岁以下的孩子也不参战。周恩来伯伯的用意很明显，他不愿意让烈士的后代再遭受不幸，他要对这些失去亲人的孩子的生命负责！

中国孩子虽然没有参战，也没有像我一样被德国纳粹关进集中营，但他们和苏联人民一道经受了战争的考验，吃了苦，遭了罪，也尽自己所能为前线作出了贡献。可以说，苏联 4 年卫国战争是这些中国孩子所经历的最艰苦、最磨练意志也是最难忘的一段时光。

收复苏联南部失地的战斗在激烈地进行。这时，斯大林向正在指挥战斗的朱可夫元帅发去了一个急电，内容大体是要他在收复南方城市时，注意查找国际儿童院失散的孩子，特别要注意查找朱德总司令的女儿。

朱可夫接到这个电报后，立即向收复失地的部队下达了“解放一个城市，寻找一个城市”的命令。

军令如山倒！解放南方城市的部队马上执行元帅的命令，开始了艰难的寻找工作。

苏联红军沿着德军占领的路线，开始将一座座失去的城市重新夺了回来。这场艰苦卓绝的解放战役，整整打了一年多，到 1944 年，整个国土全部回到苏联人民手里。直到红军解放了最后一个城市，也没有看见我们的影子。

结果可想而知了，红军怎能找到我们呢？我和米拉、

弗拉斯塔都在德国集中营里。黄平的女儿直到今天都下落不明。

朱可夫元帅不得不将这个不幸的消息报告给斯大林。

是不是在卫国战争中遇难了？斯大林陷入了沉思。

最后，斯大林没有将这个不幸的消息分别告诉我们的国家，他认为没有找到并不意味着肯定就是遇难。斯大林专门请人转告爹爹说：我一定想办法找到您的女儿！

这是斯大林对爹爹的承诺。为了兑现这个承诺，斯大林又一次把命令下达到攻占柏林的部队。

国际儿童院的老师见红军没有找到我们几个孩子，也认为我们凶多吉少，猜测我们是不是在南方遭到了轰炸。如果那样，是无法寻找到尸骨的，我们的失踪或许永远是个谜。

他们想了许多可能，唯独没有想到我们被抓到了集中营。

爹爹失去了母亲，从不动感情的 爹爹为此痛不欲生

祸不单行！

爹爹刚刚得知我在苏联失踪的消息，他远在四川仪陇的母亲又突然去世。这对爹爹打击很大，从不轻易伤感的爹爹这次非常非常的难过，忍不住的悲伤化为两行

清泪，大颗大颗地从他布满血丝的眼眶里滚了出来，滴在灰色军衣上，前襟留下了一片深色的水渍。

他用一个儿子内疚的心向母亲深深地忏悔。

这一天爹爹好像有什么预感，一早起来就觉得天气又阴又闷，老是想咳嗽。这是他在长征路上留下的毛病，一遭风寒就嗓子发痒，要咳嗽。可是，这天刚才还太阳煌煌的，转眼就乌云密布，看样子要下雨了。进入3月的延安，天气变化无常，忽冷忽暖的。

爹爹咳嗽了一阵，又和以往一样进他办公的窑洞里处理公务。这时康克清妈妈拿着一封四川仪陇的来信，跑进来递给爹爹。

爹爹一看，是老家来的信，赶紧接过去，说好久没有家里的消息，现在终于来信了。爹爹边说边打开信，没有看两行，脸上的笑容凝聚成惊诧的表情，随后拿信的手慢慢地垂落了下去……

康克清妈妈见爹爹这模样，知道不好，忙接过信。信上说钟老夫人1944年2月15日在家乡病逝，死时突然，安详如生，没有痛苦。

怎么会……病逝？康克清妈妈手直抖，不相信似的又看了一遍，才相信这是真的。她没有见过面的婆婆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康克清妈妈知道爹爹时常挂念母亲，经常听他说：要问我这一生有什么遗憾的话，就是没有尽到孝心，让母亲受了苦。

这个突然降至的噩耗让爹爹悲伤不已。他一个人坐在炕头默默地吸烟，眼泪涌出了眼眶，在他刚毅的脸上流淌。这淤积太久的内疚，使得爹爹心痛；不然，宁愿流血也不会流泪的爹爹怎会泪流满面呢？

爹爹此时的心情，我们晚辈人无法尽述。但是，世界上每一个孩子对母亲的爱都是一样的，哪怕再伟大的人、再刚毅的人或者是再决绝的人，这种母子亲情也是无法改变的。想想，一个用毕生爱心浇灌儿女岁月而枯竭自己生命的母亲，能不让远隔万里不能亲自送上一程的儿子悲痛万分吗？

后来我听老家人说，奶奶临死的前几分钟还在锅台前做饭，突然觉得不舒服，倒下身就再没有起来。奶奶是一个没有自己姓名、目不识丁、在家庭中没有任何权利和地位的农家妇女。她几十年如一日，默默地劳作和生活。爹爹出生的时候，奶奶也是在做饭，饭做了一半，爹爹出生了。奶奶收拾好婴儿，又起身继续做饭。58年后，奶奶也是在锅台前做饭，但这次做饭的结果不是诞生一个生命，而是让儿女们永远失去了一个母亲。

奶奶一声不响地走了！

留下没有来得及报答养育之恩的儿子在苦苦地责备自己，为什么没有及早写封信给母亲，让她离开这个世界时带着这远方儿子的问候呢？

特别是当他知道母亲临终的前几天老是提起他，想再见儿子一面，而他却让母亲带着这个永远无法弥补的

遗憾走了的时候，爹爹的心头更加不好受！

康克清妈妈在一旁看见爹爹这样伤心，想安慰他，可又不知道说什么好。因为妈妈知道，对于一个献身革命，一辈子只知道咬紧牙关不服输，把生死置之度外的强人来说，什么安慰都是多余的，只有在旁边默默地陪伴爹爹，让他心头的悲伤在这一刻里能尽情地流泻。

我没有看见过奶奶，但是听爹爹说，奶奶是一个了不起的农村妇女，是一个值得骄傲的母亲！

奶奶一生生育过 13 个孩子，存活了 8 个，以后生下来的孩子因为太穷，无法养活，只好一落地就溺死在水桶里。这期间奶奶受尽了残忍的骨肉永别的痛苦，眼睛哭烂了，嗓子哭哑了，出生的婴儿还是不能留下来。养不活还不如早点让他归天，来生转世投个好人家，何必在这个黑暗的世上遭罪呢！这是奶奶没有被那些剧痛摧毁的心灵慰藉。

爹爹是兄弟姐妹中的老四，也是他们中间唯一念过书的人。爹爹能完成学业考上秀才，全靠奶奶起早摸黑辛苦劳作和兄弟姐妹节衣缩食，硬是一个铜板一个铜板地抠而供出来的。对此，爹爹对家人怀有深深的敬意和歉意。解放后，爹爹从兄弟姐妹家各接一个孩子来身边念书，就是为报答兄弟姐妹曾经为他作出的牺牲。

但是，奶奶在世时，没有享到一天清福。在她支撑这个穷家感到最困难的时候，爹爹也无法分担母亲半点忧愁，甚至没有一点钱可以给家里。有一次，家乡遭灾，

身为八路军总司令的爹爹只有5块大洋的薪水，无法帮助母亲度过难关，就只好求助云南的好友，请朋友给他的家中寄一点钱，才使家人摆脱了困境。

奶奶顽强的意志和从容的生活态度，无形中给予了爹爹最宝贵的东西：坚强和忍耐，宽容和乐观。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这种高尚的品格一直伴随着爹爹。

中国有句名言：自古忠孝不能两全。

爹爹从巨大的悲痛中走了出来，又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但他内疚的心情很久不能缓解。后来我听康克清妈妈说，为了纪念奶奶，爹爹一个多月没有刮胡子，让浓密的胡子在脸上疯长，直到七七四十九天，爹爹才将一把大胡子收拾了。

后来，中央其他领导人知道了奶奶去世的消息，大家都为奶奶崇高的品德和无私的精神所感动。经毛泽东伯伯同意，4月份中央机关在杨家岭大礼堂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和延安人民共同缅怀这位伟大而平凡的母亲。负责妇女工作的蔡畅妈妈在追悼会上作了讲话，号召解放区的妇女们向钟老夫人学习，学习她终生热爱劳动、勤俭持家的高尚美德。

为一个没有名字的普通农家妇女举行这样规模的追悼会，在延安是少见的，在中共历史上也是少见的。由此可见爹爹在延安人民心中享有的崇高的威望和延安人民对一位伟大母亲的敬仰之情。

奶奶是赤手空拳来到这个贫穷世界的，走时也是赤

手空拳地离开了这个依然贫穷的世界。她生前没有荣誉，死后没有财产，但她却得到如此高的评价。我想，如果奶奶九泉有知，她一定会欣慰的。或许对于奶奶来说，最大的幸福不是荣誉而是生活。

在纪念奶奶后不久，希特勒被彻底打败了，我也成为德国集中营幸存者之一，活着走出了地狱。紧接着，日本鬼子无条件投降……就在这喜事成串的日子里，爹爹迎来了他的寿辰——60大寿。

延安人民又一次为爹爹举办了一个特殊的纪念活动，和两年前一样，还是在杨家岭大礼堂，还是那些熟悉的同志和老战友，大家相聚在一起，祝贺爹爹60大寿。

这个隆重的祝贺包含了人们对抗日战争胜利的无比喜悦，也表达了延安人民对爹爹的衷心爱戴。

这一天是爹爹生命中最风光的一天！

这一天，他收到许多生死与共的战友们的祝贺，其中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林伯渠、叶剑英、彭德怀、王震等人的祝词、贺电和贺信。

特别是董必武在《新华日报》上发表的诗词道出了爹爹清廉为人的品格：

半生戎马为人民，不随流俗与同沦；

革命将军老据鞍，甘为民仆耻为官。

直到解放全中国，直到生命终结，爹爹对于官职高低、待遇厚薄、权力大小都从不计较。爹爹不管在任何时候，都是从全局出发，来接受党和人民给予他的安排。

爹爹用博大的爱心呵护着延安的孩子， “小太行”也管他叫爸爸

爹爹喜欢孩子，而且是很喜欢。

这是我当了母亲后才有的感觉。

1953年，我和哥哥先后有了孩子。年近70岁的爹爹转眼有了两个孙子，升格做了爷爷。没看见那几天爹爹高兴的模样吧？把婴儿小心地托在手掌上，带着老花镜，仔细地端详，像读书那样久久不肯放下。我在旁边看见爹爹这般喜欢孩子的模样，心想：我刚出生时，他是不是也这样看我？当然这个问题我没有问出口，恐怕让爹爹不高兴，哪有父亲不喜欢自己的孩子的？

以后，爹爹将我的和哥哥的长子留在他的身边，由他和康克清妈妈照顾。当时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理解父亲，认为爹爹是在弥补他无暇照顾我们兄妹的情感，把迟到的父爱倾注在我们的后代身上，以至于我们的孩子比我们更多地享受了和爹爹在一起的快乐时光，对爷爷细微举动和内心活动比我们更了解，更有发言权。他那对孩子无比疼爱的情景至今都令我感动。我常常问自己，这就是当年金戈铁马、统帅千军、丝毫不顾及自己和家人的爹爹吗？

显然，我这样理解爹爹的感情世界是片面的。

爹爹喜欢孩子由来已久，只是我远离爹爹，无法亲

身感受这份平常却浓厚的亲情，更不能理解爹爹这份人间常情的真实和质朴。

我成年以后，听见许多人说，又从《康克清回忆录》中感受了爹爹那颗博大的爱心，从超越时空的角度触摸了爹爹炽热善良的内心。

爹爹是一直喜爱孩子的，甚至年轻时立志从事教育事业，并为此献身，作出了许多“胆大妄为”令封建阶级“痛心疾首”的举动来。后来爹爹弃文从军，也是希望用武力摧毁封建制度，拯救中国，解救苦难的孩子。

身为总司令的爹爹，这种喜欢孩子的质朴感情依然如故。1944年秋天，中国抗日战争开始进入总反攻的阶段。在迎接抗日战争全面胜利的前夜，延安大批干部纷纷奔赴前线。整个延安被迎接胜利的高昂激情所淹没，干部战士的请战书堆满了中央军委指挥官的案头。爹爹他们日以继夜地部署出征人员的名单。

最后一搏，谁也会拿出自己最厉害的王牌！八路军最厉害的王牌就是大量经过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的干部，有了他们，抗日战争就有胜利的把握。

延安窑洞空了，抗大读书的声音消失了，干部战士都枕戈待旦，准备出征。这时来了一个问题，一个大家都不好意思说出来的生活问题。

一些出征的干部是夫妻双双同上前线，他们的孩子只能留在延安。有的孩子还很小，不能独立生活。

父母上了前线，孩子怎么办？

这个非常具体却容易疏忽的问题惊动了中央军委。这时康克清妈妈接受了军委总政治部布置的筹建延安第二保育院的工作。当晚，爹爹就知道了这件事，马上和康克清妈妈商量起来。

从外表看，爹爹是个体魄健壮面目黝黑的男子汉，根本不会和养育孩子这类婆婆妈妈的事情搭界的。其实，爹爹骨子里藏着非常善良的爱心。有一次，康克清妈妈要参加延安小学举办的文娱活动，看见刚从前线回来的爹爹整天不是开会就是埋头看文件，想拉上他，出去散散心，换换脑筋。可又怕爹爹一听是儿童会议不愿意去，妈妈特意打了腹稿，准备用大道理动员一番。哪知妈妈一开口，爹爹马上就起身，连一句多余话都没有问，就跟妈妈一道去了。在文娱会上，爹爹比谁笑得都开心，怀里至少抱了三五个孩子。孩子们见这个大胡子伯伯慈祥和蔼，都往他跟前挤。这让妈妈始料不及，爹爹内心一种深层的情感在这个时候蓬勃地涌动着，在平时是很少看见的。这次儿童活动后，爹爹变得更加有意思了，一个人散步时，常到附近的学校和保育院里，和天真的孩子一起玩，和保育员们交谈，帮助学校和保育院解决了不少的困难。康克清妈妈自从知道爹爹非常喜欢孩子后，就经常和他一同参加孩子的活动。

有一段时间，刘伯承和妻子都在前线，他们的儿子刘太行就交给爹爹和妈妈抚养。时间一长，这个小家伙把这个临时的家当成自己的家了，把伯伯和阿姨当成自

个的亲爹娘了，跟在后面，叫得可甜了。只要爹爹一动窝，这个小尾巴就粘上了，爹爹上哪他上哪，保险比警卫员还要紧跟，让爹爹和妈妈好喜欢，甚至晚上睡觉，爹爹都不会忘记起身给小太行盖被子。等刘伯承夫妇从前线回来接儿子回家时，这个小太行放声大哭，那一串串滚落的眼泪，让人感到他好像是在遭绑架一样，死死拉着爹爹和妈妈的手不放，死活不肯跟自己亲爹娘走。没有办法，爹爹不忍心让小太行受委屈，就命令似的对部下说：“只好暂时委屈你们大人了，等过一段时间，我再送他回去。”就这样，小太行用眼泪战胜了他的亲爹娘，又留在了爹爹的窑洞里。好长一段时间后，小太行才认了自己的亲爹娘，回去和爹娘居住了。

这次接受筹建延安第二保育院工作，爹爹自告奋勇做妈妈的“高参”。以后，只要爹爹一有空儿，就和妈妈一起外出寻找理想的院址。他们一起爬坡翻山，奔波在延安附近的山沟沟里。后来，他们选中了延安城北枣园川南面的半山坡。这里空气新鲜，阳光充足，地点也隐蔽，作为保育院非常合适。地址一定下来，工程队伍就马上开始打窑洞。这时，爹爹又多次来施工现场，亲自察看工程质量。他最关心的是窑洞打得牢靠不牢靠。因为每年在暴雨季节，不牢固的窑洞容易塌方。眼下这十多眼窑洞连接着前线数百名将士的心，关系到100多名孩子的生命安全。所以他不厌其烦地一次次检查工程质量，一点儿问题都不放过。窑洞修建好后，爹爹又发现

窑洞前面的山坡没有栏杆，孩子玩耍时容易滚下山坡，特意关照建筑工人要为孩子们打上栏杆。爹爹细致得连添置什么玩具、什么生活用具都要亲自过问。第二保育院几乎就是在爹爹和妈妈注视下，从无到有，一天天地成长起来的。

很短时间，延安第二保育院迎来了第一批孩子。

保育院一成立，其他问题也接踵而来。有了孩子，却没有充足的保育人员。爹爹为了这事，又心急火燎地和中央组织部、军委组织部谈人员配备问题，一次次和保育工作人员座谈，鼓励他们安心保育事业。

这些被分配来做保育工作的人，有的是从前线回来被组织分配的，思想自然不通啦！还有的是从后方来延安，本想轰轰烈烈干一番大事业，结果当了保育员，心里也不痛快。爹爹知道后，专门和他们谈话，做思想工作。

爹爹有一番话让不安心保育工作的同志心服口服：“这些孩子的父母都是职业革命家。他们从小生长在革命的环境里，要把他们培养为革命接班人，只有靠你们这些启蒙老师了。你们的言行和教育对他们以后的成长有很大的影响，甚至影响终身。我们现在在前方是工作，在后方也是工作，而且是更光荣的工作，是要有默默无闻的奉献精神才能承担的工作。”

爹爹看见山坡上有两颗野核桃树，就指着树说：“孩子和这树一样，要精心养育。俗话说十年树木，百年树

人。培育人才比培育树木更加花费心血和精力，需要有事业心的人完成这项百年树人的大工程啊！”

后来，这个保育院从延安撤退时，带着 100 多个孩子辗转 6 个多月，行程 3000 多里，建国前夕平安抵达了刚刚和平解放的北平城。

这次大转移中，不断有惊险消息传来。爹爹和妈妈虽然没有和保育院一同转移，但一路上不时发电报询问这支“马背摇篮”队伍的转移情况。如果碰到困难，爹爹的第一个反应，就是通知他的下属，命令驻地部队帮助这支特殊的队伍度过难关。有些危险地段爹爹叫部下拨出警卫部队专门护送。有一次，“马背摇篮”在陈赓将军管辖的地段遇到敌机轰炸，马受了惊，有两个孩子从马背兜里甩落到河里，被后面紧跟的警卫战士发现。他冒着生命危险从炸弹的气浪中，救出了落水的孩子。轰炸结束后，这两个孩子和警卫战士一起失去了踪影。就在前方后方都在为这三个人的生命安全焦急万分的时候，陈赓立即派部队搜巡，终于在一个老乡家找到了正在发高烧的孩子和守护他们的警卫员。这个和孩子寸步不离的战士，看见救上来的孩子已经奄奄一息，就抱着他们跑到老乡家里，想法救醒了孩子，然后让他们睡在热炕上。

这个保护孩子和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精心的战士当年才 18 岁。

保育院的孩子还不能忘记一个人，这就是他们的张炽昌院长。这个院长的性别和大家想象的正好相反，是个男同志，而且是军事院校毕业的军事干部。他在延安等候上前线带兵打仗命令的时候，突然被军委组织部分配到第二保育院当院长。这个阴差阳错的分配差点没让他惊诧得平地栽个跟头！当时胡耀邦是军委总政组织部部长，他不得不为他的分配付出大量的时间，来更换这位军事干部满脑袋的打仗观点。经过多次做工作，张炽昌只好带着委屈走马上任了。没有想到这个思想严重不通的特殊院长，没几天就深深爱上了孩子，在保育院一干就是十多年，直到1953年才离开幼儿教育的岗位。

爹爹后来听说了张炽昌的事迹，特别宽慰，说男同志同样可以做好保育工作。

这时，远在欧洲主战场上的苏联红军正在胜利进行大反攻，而且反攻的速度快得不可思议！就我们所在的集中营，头一天德国宪兵还全副武装，戒备森严，一夜之间，他们突然没有了踪影，所有德国鬼子好像从地面上消失了……

我们最初的反应不是喜悦而是惊恐，这会不会是德国鬼子的诡计？在我们逃离集中营的时候好打埋伏，把我们都枪杀了？

惊恐过后的难友们，突然意识到：德国鬼子溃逃啦，而且溃逃得如此狼狈和仓皇，连屠杀成性的欲望都没有

来得及发泄，就跑了！

巨大的喜悦从天而降，我们所有的难友被这突如其来的意外消息惊诧得不是笑容满面，而是傻相百出！毕竟这自由女神来临得太突然，突然得让我们无法承受！



第七章

幸 存 者

- 苏联红军的枪炮声隐约传来，
天一亮，德军魔术般地消失了
- 我们拼命往东方跑，一场大火，
我失去朝夕相伴的姐妹
- 我的回答，几乎让苏联红军政委
从椅子上跌下来
- 我开始了生命中的第二次寻找父亲的经历

苏联红军的枪炮声隐约传来， 天一亮，德军魔术般地消失了

反攻中的苏联红军正在向德国境内逼近，就和当年德军进攻苏联一样，也打了一场闪电战。苏联红军很快横扫了波兰境内的德军军事目标，以势如破竹的强大军事态势，压向濒临崩溃的德国边境线，几乎没有费多大力气，苏联红军就进入了德国本土，并且迅速挺进，向希特勒的最后堡垒——柏林进攻。

一进入德国，苏联红军就开始攻占城市，占领军事要地，碰到有集中营的地方，就想法解救里面的囚犯，使得一部分很快就要死在德军死亡命令之下的犹太人从苏军闪电进攻战中，死里逃生，成为“二战”时期为数不多活着走出集中营的幸存者。尽管这些幸存者多数奄奄一息，面目全非，惨状不堪目睹，但毕竟活了下来！

从1945年1月起，我们所在的集中营也开始听见远处传来的时断时续的枪炮声。这种令人激动的枪炮声像一根扯动我们神经的绳索，我们的心情随着它的激烈进行而激动、紧张。每到枪炮声持续不断，震碎漫长死寂的黑夜时，我们就会悄悄坐起身，静静地聆听，甚至会数着每次的爆炸声。

我们天天在盼望苏联红军快一点打过来。有好几次，枪炮声好像已经临近了我们集中营，可又渐渐远去。我

们也不明白，为什么红军不冲过来，把我们都救出去？大概战争从来就是一种战术和战略结合的艺术，不到瓜熟蒂落的时候，每个指挥官都不会轻易将士兵推向战场。局势不允许红军攻占我们集中营的时候，红军的身影自然也不会出现在我们的眼前，可焦急等待自由的我们是不会认识到这一点的。

转眼，枪炮声在我们耳边响了半个月。大家激动兴奋的心情渐渐被担忧取代，怕时间一长，德国鬼子会大开杀戒的。越是面临失败，越是要垂死挣扎，连狗急了都会跳墙，更何况是嗜血成性的侵略者！

我们的心情越是焦急不安，这枪炮声也好像越加遥远，老是在远处徘徊，让人等待得心焦，度日如年。

一天早晨，和任何一个早晨一样，太阳依然从冰冷的地平线露出红脸，毫无生气的大地慢慢被红色阳光涂染上暖色。以往，集中营的汽笛早该拉响，把我们从梦中扯起来，投入到一天劳作的转盘中。可这一天，我们一直睡到天色大亮，才睁开眼睛，顿时被窗外雪亮的阳光吓了一跳！我几乎没有思考，飞快地穿衣服，指望能扒拉回一点儿时间，不至于被工头严厉鞭打体罚。

可一定神，发现我们房间里的难友都没有去上工，大家坐在床上，惊慌失措地相互张望，不知道每天那尖锐的汽笛声为什么没有响起，这不是中了邪是什么？要知道，我们从进入这个集中营起，就没有遗漏过一次这可

怕的汽笛声。

我们心惊胆战地起来，从门缝往外看，想知道外面到底出了什么事情。

外头很安静，只有几只麻雀在空地上来回跳跃。再一看，平时荷枪实弹的宪兵不见了，岗楼上没有，铁丝网旁没有，就连大门前也没有。大门上的锁也不见了，好家伙，不可思议，门大开着……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仅仅一夜工夫，德国鬼子就在我们面前消失了？

“嘿……！德国鬼子跑了……我们自由啦！”突然传来声嘶力竭的吼叫声。这声音好像是拼上全身力气迸发出来的，让我们每个人的血管都跟着膨胀起来，呼呼地涌向脑顶，撞击着眼膜一阵阵的发花……

这是我们盼望了整整4年的声音，终于在这片死亡墓地的上空回响！

我们自由了？

我们自由了！

突如其来的自由女神让我们措手不及。

渴望自由的我们，这会儿不由地发傻自问，自由是什么？

或许是失去自由的时间太长了，长得连自由的含意都生疏了；或者根本就不相信自由会轻而易举地光临到我们头上。

等大家在各自房间里相互叫喊一阵后，确信集中营

里没有德国宪兵了，才开始相信自由是真的来临了。大家开始小心翼翼地跨出自己营房的门槛，把自己自由地置身在空地的任何一个地方，让阳光自由自在地照耀着，任凭寒风吹动发梢和衣摆……

自由啊，自由，这就是自由！狂呼乱叫的人们开始出现各种奇怪“症状”。有的人因为过于激动，一下子晕了过去，直挺挺地躺在寒冬的野外；还有的人爬在地上放声痛哭，拼命地将头撞击地面，磕出了血也不在乎；还有的人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在空地上来回踱步，嘴里唾沫飞溅，语无伦次；更痴更傻的人竟然和以前一样，笔直地站立在操场上，等候德国鬼子来训话。

人们将压抑太久的情绪以各种方式发泄在这片给他们带来苦难的土地上，直到精疲力尽，才终止这种奇特的“症状”。

最先结束“症状”的是男人。他们中不知是谁第一个想起了德军的仓库，顿时人们迅速觉醒，拔腿朝几百米外的仓库跑去。那里面有食物、衣物和生活必需物品。眼下刚刚获得自由的人们太需要这些东西度过以后自由的日子了。

大家像被旋风刮了起来，朝着仓库涌去。获得自由的人们此时像失去控制的野马，奔向那片生命的绿洲。

这场大抢劫中，最可怜的是我们这些孩子，没有大人的力气，也没有大人的个头，根本无法靠近仓库，只好在旁边被巨大的人流推来搡去的，始终不能靠近食品

堆。后来，在混乱中，我被一个硬东西碰了一下，跌了一个跟头，爬起来一看，是一个油纸包，迅速打开，高兴得差点没有晕过去，是一块大黄油！足足有5磅重，不知怎样被挤掉了。

我和米拉连忙用衣服包起来。这块让我们心花怒放的战利品足够我们吃几天的。我们便心满意足地退兵，挤出了人潮。以后我们经常听到这么一句俗语：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用这句俗语形容我们当时的心情再恰当不过了。

我们突然想起旁边那座关押战俘的集中营，怎么没有听见他们的动静？按理最热闹的应该是他们才对。

可是我们一到那里，就被眼前的血腥场面惊呆了：几十名战俘已经被德军活活枪杀了！他们几乎都是在睡梦中被杀害的，有的人在床上和德军搏斗过，但被刺刀活活挑死在床头；有的倒在外面的空地上，显然是逃出了房间，被德国法西斯从背后开枪打死的。

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些残忍的法西斯已经制定了屠杀我们的计划，但是他们刚刚执行了屠杀战俘集中营的指令，还没有来得及动手屠杀我们这个集中营，上面就命令他们立即撤退。撤退前，法西斯连用来屠杀我们的机枪都架好了，如果再多给他们一天时间，或许我们也活不成了，和上百万集中营的死难者一样，成为异国冤魂。

劫后余生的人们望着手里的食品和衣物，心里不断

地打寒颤：旁边战俘集中营的人都被枪杀了，难道德国法西斯就这样放过了我们？本来已经平和的气氛一下子又紧张起来，谁也不知道自己该往哪里去，也没有人出来组织。我在前头说过，大家虽说在一个集中营里，因为严密隔离，许多年大家都相互不认识，加上多年的地狱生活，都有一种天然的戒备心理，不敢相信别人，也不相信自己。

群龙无首，乱哄哄一阵后，大家怕德军再返回，趁天没有黑，就各自逃命。有的人往树林里跑，有的往远处的山上跑，还有的人干脆生死由命，又回到营房，继续睡在原来的床铺上。年纪大一点、没有力气跑的人，干脆坐在空地上祷告，希望上帝来救他。

我们几个姐妹也商量了一下，决定往东跑，那是苏联的方向，我们要想办法回到苏联。大家分头去准备，想办法填饱了肚子。傍晚的时候，我们也跟着陆陆续续离开集中营的大人的后头上路了。很快，阴冷恐怖的集中营丢在了身后。我们顶着星光，迎着寒风，踏上了充满希望的归途，同时也开始更加艰难的流浪生活。

或许我们晚几天离开，就会等到苏联红军过来了，也不至于在逃亡的路上吃那么多的苦头，害得我和姐妹们跑散了，几乎再次陷入绝境。

我们拼命往东方跑，一场大火， 我失去朝夕相伴的姐妹

离开集中营后，天气异常寒冷，小路上到处是积雪和泥泞。

我们身上衣服也不多，特别是脚踩在冰冷冰冷的泥潭里，很快就冻得失去了知觉。我脖子上的淋巴结核经过这番折腾，伤口又开裂了，稀沥沥往外直渗液体，也不知道是脓血还是汗水，毛衣领湿了干，干了又湿。如果不是东方有我们的家园，有我们的希望，说什么我也支撑不下去了。我觉得腿肚子软绵绵的，每走一步，脚趾头都钻心地疼痛，硬是咬着牙往前走……走啊走，也不知道走了多少天，可是抵达苏联边境好像还是遥遥无期。问过路人，个个茫然摇头，根本听不见一点儿令人兴奋的消息。

如果再这样走下去，我真不知道我还能坚持多久。在集中营那么艰难困苦的条件下，我都没有放弃活下去的念头，可这次，我觉得自己真的坚持不下去了，真的要永远倒下再也起不来了。

白天，我们随着大批难友慢慢地走，晚上随便找个农庄或者草堆什么的，休息一夜。因为我们长期与世隔绝，对外面的情况一点儿也不了解，最害怕碰见人；即使村庄里的农民我们也尽量躲避，就怕碰到法西斯，或

者被人出卖。

我们的谨慎不是没有道理的。我们常听说，一些越狱犯人跑出集中营，躲在农民家里，但有的农民并不同情犹太人，很快将他们出卖给了德国人，使得可怜的逃犯又落入虎口。

我们也心有余悸，怕当地农民把我们当做犹太人！

其实，我们根本不知道现在的形势早已发生了变化，再不会像以前那样暗无天日。特别是法西斯节节败退，世界大战即将结束，就连德国人也不会再相信希特勒。可我们对这些却一无所知，不敢接受人们真诚的帮助，经常在寒冷的野外过夜，有时点燃一堆篝火，可是火一灭，我们就会被冻醒，眼睁睁地等着天亮……这日子真难熬啊！

不过，能支撑体力走过这么多天的流浪路，真要感谢我们的大黄油，如果不是它及时给我们补充热量，我们恐怕早就趴下了。

有一天傍晚，我们看见一个小村庄，就进去讨要点食物，然后在村庄附近找了个草场。这地方很好，草堆又暖又软，钻进草堆睡觉是我们流浪生活中最高级的享受了。

半夜，我突然被闪闪的红光惊醒，起身一看，草场的另一端大火冲天，浓烟滚滚，半个天都映红了……

我连忙起身，想叫醒伙伴们，可身边空空的，米拉，弗拉斯塔，还有两个乌克兰姑娘都不见了！我吓出一身

冷汗，立即放开嗓子大声叫她们的名字。可回答我的除了乱跑的脚步声和孩子哭喊的声音外，什么回音也没有。

我的天！我双腿跪在草地上，拼命呼唤“米拉、弗拉斯塔……”

失去了她们，我可怎么办？我怎么回到莫斯科？我顿时被这个可怕的推想吓得哭了起来，忘记了我所处的危险……直到有人推我，哎哎，小姑娘，赶快跑啊，快跑啊！我这才想起我还在大火的包围中，边哭边往火圈外头跑。

跑出危险地带，我一屁股坐在村庄外的池塘边，又哭了起来。哭着哭着，我想起了什么，摸摸怀里，发现那块黄油不见了。这也是我的命根子啊，我同样不能失去它，便连忙起身去寻找。

这时大火还在燃烧，人们都在奔跑救火，我却一头扎进了火堆里。旁边的人吓坏了，想把我拉住：“姑娘，不能进去，要烧死的！”

“没有黄油，我同样也会饿死的！”我哭喊着摔脱好心人的手，双手抱着头冲进草场里。我记得我们睡觉的草堆旁有棵白杨树，很高很直。在大火的照映下，四周很明亮，我很快找到了睡觉的草堆。幸好，火还没有烧到这里，但已经感到炽热的气浪，我背后好像被烧烤一样火辣辣的。我顾不上这许多，连忙在草堆上翻找起来……找到了，找到了……！已经被吃掉一半的黄油，被高温融化变得软绵绵的，好像一使劲就会化成油似的。我

只好用双手捧起这块热热的黄油，又跑出了大火笼罩的天空。

火灾现场的人看见我又完好无缺地跑了出来，关切地围着我，摸摸这摸摸那，看见我的确没有事情，才松了口气。但他们看见我手里有一块黄油，都发出咂咂的惊讶声。这在战争年代里无疑是一份令人羡慕的奢侈品了。

黄油找到了，可是米拉她们再也没有找到！

我好伤心啊，这是4年囚禁里很让我伤心的一件事情。我们在一起度过了最艰难的死亡岁月，获得自由后我们却失散了。

这一分手竟整整40年。直到1984年我应民主德国总书记昂拉克邀请再次来到东德，才和已经成为捷克著名女导演、也不再年轻的米拉相见。我们抱头大悲大欢后，我问她：“那次我们从集中营跑出来后，你为什么在失火的时候把我给丢了？”

米拉一听，更加委屈：“我也是被人推醒的，一看大火那么猛烈，就把你推醒。我看见你坐了起来，以为你也和我们一起往外跑了。可是我们到草场外面，才发现你不见了。为了找到你，我又一次跑进草场，可是你不在那里，结果等我再跑到草场外面，姐姐她们也不见了。我和你一样，也和大伙儿走散了。后来我一个人边哭边往东走，因为又累又冷又想念你们，我在路边晕了过去。要不是苏联红军经过这里，我早就冻死了。”

天哪，我哑口无言，原来我等待了 40 年的答案竟然是这样的无情和残酷！这只能怪命运中这场该死的大火，把我们差点逼进绝境。这场大火不是我们命运中的灾星是什么？

那天，我久久地站在大火渐渐熄灭的草场旁，希望等到天亮，或许能找到失散的伙伴们。可是到了天亮，人群也早已散尽，却没有米拉她们的身影。在我彻底失望的时候，一个中年知识分子模样的人走了过去，用俄语问我是什么地方人。

我不敢告诉他我是从集中营跑出来的，就说是中国人，为躲避战争从苏联过来的难民，现在要回苏联去。

他一听非常热情，要带我到他的家里暖和暖和。我反正也没有其他地方可去，就横下心来跟着这个陌生人到了他的家。他的妻子给我喝了杯热牛奶，顿时身上有了热气。开始我以为他们是波兰人，后来才知道那个男的也是苏联人，曾经为德军做俄语翻译，现在看见德军完蛋了，跑回波兰妻子这里，躲了起来。

我当时年龄小，也不懂得什么是人质。我一听他是法西斯的翻译，就起身要走。但他们不让，说他们并不坏，给德国人当翻译也实在是无奈。说他们能帮我找到红军，也好将功赎罪，再说大家都是从苏联过来的，要我相信他。

果然，没有几天，一个苏联红军军官模样的人来到这个人家里，把我接走了。这时我才知道，这些天我被

这个穷途末路的家伙当做救他自己命的人质。他找到苏联红军，谈好了交换条件：红军放他一条生路，不追究他以前的历史，他就将一个从苏联来的中国女孩交给他们。红军因为很少看见苏联流亡在国外的中国人，估计我是个经历不简单的人，就答应了他的条件。

这样，我再次脱离绝境，获得了自由。

但是我和苏联红军在一起，还是不敢说出自己的真实身分，仍说是一个中医的女儿。这些救我出来的红军要继续作战，无法带我一起走，就把我交给当地一处收容苏联难民的集中站。这个集中站原来也是德国集中营的地方。

我再次进了“集中营”，当然这个集中营和原来的集中营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是我们在这里要等候火车通车，才能回苏联。为了维持生活，我们也要劳动，自食其力。

我在这个陌生的群体里，显得更加孤独。每天我和大家一样收土豆，削土豆，做杂务。因为集中站里的人太多，一下子谁也不会注意我这个沉默寡言的小姑娘。

我在大家眼里成了一个不知道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的神秘的东方女孩。

终于在一个月后，我这神秘的面纱被一个红军中尉揭开了……

我的回答，几乎让苏联红军政委 从椅子上跌下来

我在这个遣送难民的集中站度过了寂寞如年的两个月。

进入 1945 年 5 月，德国法西斯举手投降，战争罪魁祸首希特勒也自杀身亡。世界人民终于结束了腥风血雨，迎来了和平的一天。我的国家——中国也开始对日寇最后一战，加快了结束战争的进程。

这些局势我当时并不知道，也不懂得，是一位苏联红军告诉我的。听见这些令人欢欣鼓舞的消息，我内心更加焦急，到处都在庆祝胜利，人们在为最后胜利而战斗，可我呢，至今还流亡在苏联以外的地方。

尽管内心很急很累，有时心焦得想自虐，自己抓自己的胸口，把毛衣撕咬得一条一条的……但一到人们跟前，我嘴上却什么也不说，好像这自由的世界属于天下所有的人，唯独不属于我，因为我总觉得这宝贵的自由时光会很快被法西斯拿走，有一种在梦幻里生活的感觉。

几年的囚禁，我的心理已经不是生活在正常环境中的女孩心理。法西斯留给我心灵的伤痕太深太痛，笼罩在我头顶上的阴影太黑太沉，以致把其他美好的东西都遮盖了。即使这些美好的东西来到我面前，我也不敢伸手去接受……是不是我们被苦难岁月挤压变形的心脏丧

失了承载美好事物的能力？不然，我真无法解释，获得自由后，我怎么变得更加孤僻和敏感，甚至自暴自弃呢？

我对谁也不信任，总想，我讲的话谁会相信？没有一个人会相信我的真实身分。

因为自由后，我碰过钉子，有过教训。最初找到我的红军要开拔回苏联时，我特别想跟他们走，就找到他们的指挥官，用试探的语气问他们：“如果我是共产党大官的女儿，你们会怎样？带我走吗？”

那个红军一听先是哈哈大笑，然后说：“您真会开玩笑，小姑娘。您应该问纳粹分子怎样办？”意思很明显，他们根本不相信共产党领导人的孩子能活着走出纳粹集中营。

就这样，我失去了跟随苏联红军回莫斯科的机会。红军当然不会让一个身分不明的孩子跟随部队走东走西的。

这以后，我再也不敢贸然提这类让人发笑的问题了。

一天，我们这个收容站换了一个新政委，军衔是中尉。他和以前的政委不一样，他喜欢直接和难民们交谈，特别和善，像典型的俄罗斯大叔那样有副好心肠，外搭一副好脾气。开始他看见我，也和他的前任一样，很好奇地打量我一番，仔细地问了我的经历。有了以前的经验，我还是照搬老黄历：爹爹是中国的老中医，送我到苏联南方养病。后来战争爆发，我就被德军抓走。现在我想回苏联，寻找在中国的父母。

这个军官很有意思，听完我天衣无缝的身世，不是满意地点点头，或者发出遗憾和同情的感叹声，而是直截了当地告诉我：“听我说，中国小姑娘，您的身世不会那么简单！”

他这一说，吓我一跳，好像我的身世连我自己都不知道，需要他告诉我一样。

言多必失！我赶紧不再说话了。

我越是保持缄默，越是让这个政委好奇。

过了几天，他又来了，和我一起削土豆，反复问我在苏联时的细节问题，比如到明斯克之前到过莫斯科吗？上过学校吗？叫什么名称？老师中有没有中国人？

我的破绽就出在这个中国老师问题上，我说我的学校有中国老师。

这个军官马上敏感地抬起头，说：“我也是莫斯科人，莫斯科有中国老师的学校可不多。据我所知，国际儿童院就有中国老师，您是不是从那里来的？”

我吓坏了，好像大祸要临头了，无论他再问我什么，我死也不再开口了。

红军政委见我不开口，估计这里面一定有秘密，也不追问我了。他把话题岔开，想缓解我紧张的情绪。他给我讲了许多外界新鲜的事情，告诉我世界各个国家的人将不再受战争的磨难了。中国的抗战也快结束了，你应该回到亲生父母身边，应该上学，学习文化。

他一提到中国，我的眼泪止不住潜然而下……

中国，这个离别了4年多的祖国在我心里激起了巨大的感情波澜，我真想立即回到祖国怀抱，让所有苦难的日子在她的怀抱里融化，变为永远过去的历史……

我要不要把我的真实身分告诉眼前这个和蔼可亲、可以让人信赖的莫斯科军官呢？

我内心剧烈地斗争着，最后我还是没有勇气说出一切。我怕他不相信，说我骗人。我流着眼泪看着这个军官摇摇头，转身走了。

这一夜，我失眠了，眼前老是出现爹爹朦胧的身影，好几次努力，想回忆起爹爹真切的模样，可怎么也想不起来了。我被自己迅速衰退的记忆惊惧出一身冷汗，真怕再也不能回到祖国。可转念一想，难道我就这样回国？两手空空去见寄厚望于我的父母？

我一个人越想越伤感，觉得我太孤独了，孤独得没有人能分担我的苦恼，也没有人能知道我的心。我像一个被遗忘的人，在远离祖国的地方过着无人能体会的孤独寂寞的日子，而且整天被过去的阴影困扰着，提心吊胆地度岁月。如果有人能宽慰我，鼓励我，告诉我应该怎样做，或许我就不会被这么一个问题折磨得神情恍惚了。

我以为红军政委不会再来找我了。没有想到，第二天一早，政委就把我叫到了他的办公室。这是一间简易的木板房间，木质地板踩上去吱嘎吱嘎直响，让人更加紧张。

政委乐呵呵地给我搬了张椅子，让我坐下。他也在他办公桌的后面坐了下来，我们面对面……

突然我眼睛一亮，他的桌子上有一束不知从什么地方采来的鲜花，失去根的淡红色的花在没有任何美感的罐头瓶子里，依然浓烈地开放。我心头一热，久违了，迎春花！这是我最喜爱的花！

“这是迎春花，是春天的使者。瞧，它们开得多好。”政委看见我惊喜的目光，以为我不知道是什么花，从瓶子里取出一枝递给我。我接过来一闻，一缕淡淡的清香沁人肺腑。这花真新鲜，估计是才摘来的，花瓣上还带着露水呢。

看见这些花，我的心情放松了许多，刚才怦怦直跳的心也被这美丽的花拂平了。

政委依然用和蔼的语气问我：“昨天我给你讲了许多道理。告诉你，你的国家也快要和平了，这个消息对你很重要，估计你昨晚没有睡好……”

这个莫斯科人的目光真厉害，好像能穿透人的五脏六腑，我昨晚失眠都瞒不过他的眼睛。

“昨天我一讲到中国，你就哭了，我知道你一定很想回家。所以我今天找你来，是想帮助你找到中国的父母，让你早日回去和家人团圆。”

我的鼻子又酸了，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这时“中国”和“父母”这些字眼是我心灵深处最脆弱最容易受伤害的一根神经，谁要一碰它，就好像提起我感情的闸

门，牵出我许多的悲伤和委屈。

“不过，你一定要告诉我真实情况，我才能帮助你。知道吗？”

我猛然点点头，不加思索地脱口而出：“以前我说的是假身分。我是中国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的女儿！”

“什么?!再说一遍。”政委几乎是从椅子上弹跳起来，身子歪了一下，差点跌倒。他站立起来，两只眼睛瞪着我，像不认识我一样，发出惊讶的光。

我被他这目光盯得心里直发毛，身子也不由地矮了半截。

我就知道我说了真话他们也不会相信！

“赤英，我没有听错的话，你刚才说你是朱德的女儿？就是中国共产党总司令的那个朱德？”

“是的……”我低下头，小声回答。

“这简直……简直是个天大的奇迹……八路军总司令的女儿从德国集中营活着走出来，这不是天大的奇迹是什么？要知道，我的中国小姑娘，你奇迹般地从德国鬼子眼皮底下活了下来，这要让法西斯分子花一辈子的时间去追悔、去捶胸顿足的呀……哈哈……”

我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傻傻地盯着这个手舞足蹈的红军政委。我的身世就这样让他兴奋？但看见政委这样高兴，我的心情也受了感染，快乐起来，好久没有这样开心了，也跟着大笑了起来。

我手里的花朵也跟着我起伏的身躯颤抖起来。我怕

抖掉花瓣，赶紧用手护着。

我收住笑，用手背擦了擦眼睛，原来太快乐也会流泪的，这泪流得让人心里爽快，舒服！我看见政委不再笑了，就起身想出去干活儿。我在这里耽误了半天，土豆还没有削。

“你到哪里去？”政委奇怪地问。

“我去削土豆呀！”

没想到，政委走到我跟前，用手按住我的肩头，又让我坐下。

他转身叫来一个士兵模样的年轻人，吩咐说：“这个中国姑娘以后不再去做活儿了，从今天起她就搬到我办公室旁边的房间住。你再去找一个苏联姑娘来陪她，负责照顾她的日常生活。”

我刚刚踏实的心又悬了起来：我有手有胳膊，怎么能叫别人照顾呢？连忙说：“不行不行，中尉同志，这样不行，我会不习惯的。”

“在这里，我是领导，你要服从我的命令。”

以前只知道暴露真实身分会被法西斯杀死的，却没有想到现在暴露身分会被当做重要人物，受到隆重的礼遇。这天壤之别的变化，前后不过一个小时。这戏剧性的转变，让我觉得是在云雾里行走，脚底下的大地变得不实在、不真实，飘忽飘忽的……该不是在做梦吧？

后来我在这个好心的中尉的帮助下，开始写信寻找我的父亲。

我激动地坐在桌子前，展开白纸，哪知一提笔，我却把老祖宗的字都忘了，怎么想也写不出几个来，俄文我又没有学会……这可好，朝思暮想能给自己的爹爹写信，如今有了机会，我这个昔日名牌学校的初中生，却被法西斯残酷地囚禁，摧残成了一个既不会中文又不懂俄文的文盲！

看来寻找爹爹，我这文化水平肯定是不行了。我只好又去找中尉。

我开始了生命中的第二次寻找父亲的经历

我找红军政委，告诉他，我不会写中文了。这也让他也很惊讶，感慨这地狱的魔力，能把人改变得这样厉害。

他答应帮助我写信。

和第一次寻找父亲相比，这次更难。

上次是周恩来伯伯找到了我，我是被寻找者；而这次我是寻找者，特别是我什么线索也没有，就是请这位关心我的红军政委代笔寻找，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在莫斯科只生活了三个月，对那里的地名街名都不了解，甚至连我住的国际儿童院在什么地方都说不清楚，只知道我们国际儿童院是共产国际负责创办的。

这个信息让政委高兴，他说他知道这个地址，很快帮我写好了一封信。

信中说一个叫赤英的中国女孩要寻找在中国的父親，并且将我在国际儿童院的情况也介绍了一下。因为我们还在靠近德国的边境，怕信件丢失，没有敢直接写上爹爹的名字。但我忽视了一个关键问题，没有写上我真实的名字——朱敏。

信倒是没有丢失，寄到了莫斯科，可共产国际已经解散，无人受理我的信。信在莫斯科停留了一段时间，被热心的邮递员转到莫斯科红十字会。

工作人员打开信，看我原来是国际儿童院的孩子，就准备转往国际儿童院。

正在这个时候，毛岸英来了。他在苏联卫国战争结束后听从他父亲的安排，准备起程回国。他离开莫斯科前，到红十字会办理手续，碰巧我的信放在工作人员的办公桌上。他看见后，问这是谁的信。工作人员看见毛岸英也是中国人，就问他认不认识儿童院里有个叫赤英的中国女孩？她要寻找在中国的父親。如果当时告诉毛岸英是朱敏，他或许还知道我是谁的女儿，可一听叫赤英，他想了半天，实在没有印象了，就答应回延安打听一下，谁是赤英的父親。

毛岸英的心里默默记住了赤英这个名字。

这一次，幸运女神又走进了我的命运里。我的名字在毛岸英脑海里留下了记忆，他为我以后和爹爹再次取得联系立下了汗马功劳。

以后我常想，如果那次不是毛岸英到红十字会办事

并看见我的名字，或许我寻找父亲的时间会更长。

就这样，毛岸英带着我这个奇怪的名字回到了延安。到延安后，他无意中在他父亲跟前提起赤英要寻找中国父亲的事情，但他并没有指望他父亲会知道这个古怪的名字。没想到，他父亲一听说赤英，马上停下手里的事情，问：“你知道赤英在哪里？”

难道父亲知道赤英是谁？毛岸英连忙把在莫斯科红十字会看见一封信的事告诉了父亲。毛泽东伯伯高兴地说：“这是我们朱老总的千金啊！这个化名我知道。这可好了，好多年没有音信了，没有想到她还活着。你赶快去告诉朱伯伯，让他也放心。”

毛岸英连忙找到爹爹，把我在德国寻找父亲的事情告诉了爹爹。

当时爹爹没有说什么，第一个反应是到桌前坐下，拿过纸和笔，他要写信给我。

毛岸英想想说：“信上说，赤英的中文已经忘记了很多。你写信给她，不知她能不能看得懂，还是我执笔，写信给她，好吗？”

爹爹放下毛笔，连连说：“好好，你写你写！”

毛岸英写好信，寄到莫斯科红十字会，请他们将信再转寄给赤英。

1948年，毛岸英再次来莫斯科，听说我已经从德国返回伊万诺夫了，就来看我。一见我，他高兴地拉着我的手，上下打量，说：“你真是命大，能从德国集中营回

来！”我问他：“你怎么知道我在德国集中营？”他这才告诉我，我那封寻找爹爹的信是他最先看见的，也是他把我的情况告诉了爹爹……原来这样！我一下子对年长我几岁的毛岸英有了兄长般的亲切感。

1950年夏天，我回到北京度暑假，毛岸英又来中南海看我，我们又热闹地谈了许多。那时，抗美援朝战争还没有爆发，他也不知道会去朝鲜战场，而且将一去不复返。我送他出大门，他像个淘气的大哥哥，又开始拿我赤英这个化名和我逗乐，揭我的短，说我不仅忘记了自己的名字，把老祖宗的文字都忘了，连爸爸都丢了……听见他说的中国话像打机关枪一样流利，把我可急死了。中文说得更加蹩脚，真想狠狠捣他几拳头。他见我扬起拳头，一溜烟跑了，我在他身后用俄语“警告”他说：“你可小心点，我去告毛伯伯，说你欺负我。”可惜，毛岸英哥哥在同年11月牺牲在朝鲜。我1953年回国，才知道这个不幸的消息，心里特别地难过。以后我再也见不着他了，再没有机会向这位敦厚的哥哥“撒娇”了，也没有人知道我流亡在外寻找父亲的那段曲折遭遇了。

我知道毛岸英在延安给我写过信，就专门去红十字会打听。当时我希望信还能在红十字会。那里的叔叔告诉我，他们早已将毛岸英哥哥的信按照红军政委留给的地址寄走了。然而，这次幸运女神却和我擦肩而过，等信在邮车上周折数万公里来到我们难民集中站时，我们已经全部到了波兰境内一个离苏联边境很近的地方，等

候国际火车通车，回莫斯科。

毛岸英哥哥的信再次成为无人查收的“死”信。

在很长时间都没有中国和苏联的消息后，这位红军政委并没有“原地待命”，依然想办法和苏联方面联络。在我们到了波兰和苏联交界的地方时，政委利用和苏联联系方便的条件开始一层层地往上报告，我的情况终于被报告到斯大林的办公室。我的身分一下子大白天下，斯大林一道急令飞往波兰境内：立即护送朱德将军的女儿到莫斯科。

没有几天，我被安排坐上战后第一列通往莫斯科的国际火车，踏上了离别后的第一次归程。为了我的安全，路上专门派了两个士兵负责护送。

眼前这条伸向远方的铁路，我3年前走过，那时是走向地狱；如今我又一次在它身上走过，从此，我将远离地狱。人生中这一来一去，不仅仅是归返某地某处，而是在经历生命截然不同的旅程。铁路还是这条铁路，国界还是这条国界，可我的生命的含义已经完全不同了。

我这哪里是在乘坐普通火车？分明是在搭乘一班历史的列车。

政委用吉普车送我到了站台。突然看见绿色车厢，我的心感到一阵颤抖，难道这就是千次万次用生命去争取、用心灵去盼望的时刻吗？可我怎么一点也激不起喜悦的浪花，只有一腔子依恋的泪水在翻腾？

我依依不舍地望着这个帮助我重返莫斯科，帮助我

从心灵上彻底走出法西斯阴影的红军政委，内心冒出了一个奇怪的念头。我对正在指挥士兵帮着往车上拿东西的政委说：“政委叔叔，让我参加红军吧，和你们在一起战斗。”

政委一看我正儿八经的模样，忍不住笑了起来。

“我的红色公主，您是我们最高统帅亲自下令保护的重要人物，我怎么能让您参军？斯大林同志要是知道了，他可要……”他做了一个撸的动作，“他可要撤我的职的。”

“我真不想离开你们，你们对我真好，我不想走了……呜呜……”

真讨厌，我要当红军，他却不帮我。我委屈得眼泪流了出来。

红军政委这时眼睛也湿润了。他走过来，紧紧拥抱着我，最后在我的额头上轻轻地吻了一下，说：“上车吧。您应该继续读书，以后还要回中国，建设自己的国家。您的任务很重啊，不要忘记给我来信！”

我没有理由再留在站台上了，只好上车吧。

1946年初，我历经磨难，九死一生，终于回到了阔别5年的莫斯科。

以后，我给这位红军政委写过信，可他没有回信。再后来，我听他的战友说，他在一次意外事故中牺牲了。那天晚上，我在宿舍里为他点燃了红蜡烛，默默悼念这位世界上最好最好的叔叔。

按照宗教的说法，死去的人都会去天国。我想，我眼前这摇曳的烛光一定会叩响天国的门扇，向这位善良、聪明而淳朴的红军战士带去我迟到的谢意和无尽的思念。



第八章

迟到的学业

- 我终于收到阔别 5 年的父亲的来信，
信没有看完，泪水就把纸淋湿了
- 我在中国和苏联之间作出了选择，
决定在苏联继续接受教育
- 1950 年，我终于回到阔别十年的祖国
- 爹爹爱好运动，晚年最爱爬山和下象棋

我终于收到阔别 5 年的父亲的来信， 信没有看完，泪水就把纸淋湿了

我又回到了莫斯科，又回到了国际儿童院。

这天是 1946 年 1 月 30 日。

我一生中有几个日子是不能忘记的，一个是我的生日，一个是爹爹和妈妈的生日，再一个就是 1 月 30 日。爹爹去世时，我记忆中又多了 1976 年 7 月 6 日这个忌日。

在这些纪念日中，似乎只有 1 月 30 日显得有些特殊和奇怪。不知为什么，我老是不能淡忘这个日子，因为它在我生命中占据了最重要的位置，成为人生的旅途中生死交替、祸福变换的转折点。

1941 年 1 月 30 日，我离开了延安，踏上了去莫斯科求学的旅程。深切地记得飞机在延安机场起飞时，我看见机翼下那一个个渐渐变成小黑点的亲人。我的心都缩了起来，他们好像会永远地从我的视线中消失，以后无论我是跌倒还是站立，我再也够不着他们的手，让他们牵我一把。这一天，我品尝了惆怅甚至带有恐惧的离别滋味。

1944 年 1 月 30 日，我和难友们在德国集中营已经关押了一年多。一个喜怒无常的德国宪兵为我们拍摄了第一张在集中营的合影照片。这一天，我本来就很伤感，

又面对黑黑的镜头，我的心很痛。我用一根拾来的蓝色圆珠笔芯，在照片反面写下了一段话：

1944年1月30日，照于德国和同志们，3年前的今天离开了祖国。

啊！什么时候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

当时，我有的汉字不会写了，这段话中有好几个错字，但这苦涩的乡愁和这张照片一直保存了下来。直到今天，这蓝色笔迹依然那么清晰，依然能让我透过小小的照片，去体会当时那种刻骨铭心的乡思和悲愁。

1945年1月30日，我们在惊慌和惊喜中获得了意外的自由，拼命地逃离了这座阴森恐怖、以后将无人再来问津的集中营，开始了寻找归途的流亡生活。

一年后的今天，我站在了莫斯科的红场上。

这些大起大落、大悲大欢的遭遇，都是发生在这个神奇却又十分普通的日子里。

正因为有这几个1月30日的奇特遭遇，才有我生命中一条由必然和巧合组成的历史隧道，将我最终送到了自由和光明的天地之中。从此，这个苦难且温暖的日子自然而亲切地印在我的记忆里。

我在红场上信步。街道、房屋、古老建筑、艺术雕塑和克里姆林宫红墙……景色依旧。在列宁墓前，我从大衣口袋里掏出列宁纪念章，带在前胸，这是获得自由后第一次佩带纪念章，一种自豪的感觉油然而生……走着走着，我内心涌上了柔和的感受，仿佛这场战争从来

没有来到这片土地上，我也从来没有去过什么德国集中营……这眼前一切的一切，居然让我感到和4年前的岁月焊接得如此完好无缝！

柔和安详，和平宁静，弥漫了我的心房……

突然，一阵寒风吹来，脖子上至今没有愈合的淋巴肿块又开始隐隐作痛。这铭刻残酷岁月的伤口好像在提醒我，这段伤痕累累的人类历史无论如何是无法用柔和的心情去焊接的。我刚刚轻松的心情又开始沉重起来，整整4年荒废的岁月又化作不易申诉而又焦急的石块压上了心头。

我必须用很短的时间来弥补已失去的4年，不然，我除了年龄增长以外，其他什么都在原地踏步，以后怎么回去向爸爸妈妈交代啊！每当想到这个揪心的问题，我都会想起爹爹那双充满期待的眼睛。这几乎成为我回到莫斯科后的一道无声的军令，促使我不得不去拼命地学习。

我一走进国际儿童院的大门，依稀又记起了以前的往事，教室、宿舍和那令人陶醉的大草坪。记得有些天性好斗的男同学，常在这块大草坪上进行摔跤比赛。有的男孩个性强，输不起，摔着摔着，就当起真了，结果大家混战一场，哭的哭，骂的骂，最后不欢而散。那架势好像这一辈子都势不两立、结了世仇似的，可不出两天，敌视的双方又好得恨不得穿一条裤子。

我们女孩子最爱在草坪上作游戏，过家家。最令人

羡慕的是被选出做“新娘”的孩子，她可以羞答答地扮演“婚礼”中最风光的角色。

时隔4年多，我走进这些认识又似乎不认识的同学中间，大家相互发现，经过这几年艰苦环境的锻炼，我们这些当年无愁无忧的孩子，无论是调皮的，还是听话的，无论是大打出手当“拳王”的，还是羞答答当“新娘”的，都在战争中长大了，成熟了，个个脸上都挂着与年龄不相符的老练和沉稳，甚至有些世故。

我到伊万诺夫国际儿童院不久，收到了爹爹从延安的来信。那时中共中央还没有撤离延安。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和苏联之间又恢复了正常的邮路通讯。

这是我离开祖国后收到的第一封中国来信！

爹爹是用毛笔写的信。我颤抖着手，撕开牛皮纸的信封。里面掉出一张照片，是爹爹的半身照片，反面写着“朱敏女儿收，朱德，45年11月13日于延安”。信只写了一页纸，虽然只有寥寥数语，但我还是控制不住流下了眼泪。

爹爹在信上说：苏联4年卫国战争也是中国国内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候。我没有及时打听你的下落，让你受了苦，爹爹对不起你！全苏联都在遭受战争的苦难，我不能因为个人的事情麻烦苏联政府，想必女儿能谅解爹爹的……

我的眼泪大滴大滴地滴在脆黄的信纸上，很快信纸就烂了，拿不住了。我只好把信铺在桌面上，用手绢把

不断涌出来的眼泪堵住。

我好想家好想家，好想立刻回到爹爹的身边啊！

有了爹爹的消息，我心里平静了许多。我想，现在什么牵挂的事都没有了，剩下的就是我自己怎样把学习搞上去，赶上同学们的进度。

战争时期，在莫斯科的同学虽然没有直接投身战争，但他们也没有能正常地上课，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为前线服务的工作上，也耽误了不少的功课。所以，我和他们的差距并不像我所想象的那样遥远，只要我肯吃苦，一定能赶上的。

学习这事，就是一个吃苦用功的问题。我先在儿童院补习俄文，不到一年，就掌握了俄文。然后就转到伊万诺夫学校七年级学习。苏联学制和中国不同，他们是初小、高小、初中、高中联贯起来计算学年的，分为十个年级。七年级相当于中国的初中一年级。进入中学，就要开始掌握物理、化学、生物等自然科学的课程，学习内容自然也就加重了许多。因为我的底子比较薄，我想起中国一句俗语“不耻下问”，遇到不懂的问题就向同学请教，有时为做一道难题，常常要到半夜十一二点。

这种“艰苦作战”的学习状况持续到第二年才有所缓解。我升入八年级后，和同学们的差距才逐步缩短，再往后，就越学越轻松了。

我跨越了用俄文学习难关的同时，我的中文却出现了危机。有时我给爹爹写信，常常因为不会写汉字，就

图省事，用俄文代替。我想，爹爹年轻的时候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过，会点儿俄语。所以，我在信中的俄文越来越多。开始爹爹还能对付，连猜带蒙，一封信的内容也就差不多看懂了，可是随着我信中的俄文数量不断升级，爹爹不得不去找中央机关懂俄语的人翻译，才能把我的信看完。

一次爹爹来信，他那时已经撤离延安，是在转战途中给我写的信。他叫我注意复习中文，使用中文，以后回中国工作，干什么都离不开汉语。它是母语，是中国人交谈的语言，切切不可丢掉，以后写信最好不用俄文！

我这才从俄语世界中清醒过来。是啊，我是中国人，不使用中国文字怎么行？我赶紧找来中文字典，写信遇到生字，就查找字典，给爹爹写信再不敢使用俄文了。但是，我的中文并没有多大的提高，特别是汉话，几乎忘得差不多了。一个人说什么语言，是由所在的地方决定的。语言环境很重要，不要说我这个在国外呆了六七年的人了，就连进入莫斯科儿童院才一年的孩子，有的就把自己国家的语言几乎忘完了。

1949年，我读完苏联十年制的学习课程，完成了高等中学的教育。

这本应在四年前就可以实现的目标，因为战争，因为命运的波折，整整向后推延了四个寒暑。这时我已经是快23岁的成年人了，才开始迎考大学……

正当我全力冲刺，准备报考列宁高等教育学院时，国

内传来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国民党政府垮台了，共产党解放了全中国，一个崭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在世界东方站立起来……

随着这个好消息的传来，一个何去何从的选择也摆在了我的面前……

我在中国和苏联之间作出了选择， 决定在苏联继续接受教育

报考教育专业，是我在战争年代目睹许多孤儿悲惨情景后立下的志愿。

我准备上大学的时候，正是结束战争不久，无论是中国，还是苏联，或是其他经历过战争的国家，大量的孩子因为战乱，因为贫穷没有学上。特别是中国，别说孩子们期待教育，就连成人中的文盲比例也相当高。

一个没有文化的国家，拿什么来搞建设？

时代需要大批的人从事教育工作，“教师”这个行业变得比任何一个时候都要神圣和紧迫。我想，如果我学了某种科技专业，回国后只能发挥我一个人的才智；如果当教师，那么为国家输送的就不是一个专业人才，而是一大批专业人才。

我这个出发点在现代人的眼中一定很可笑，竟然那么的单纯，甚至有点儿幼稚，没有一点儿现在人们常说的“实惠”和“功利”可图。但是，越是单纯幼稚的东

西往往越是最有魅力的东西。我被自己的见解激励着，从而更加坚定了选择教育专业的决心。

我正想把这个想法告诉爹爹时，爹爹的信却先到了我的手上。

看了信后，我的内心激起了很大的震动，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这时，我想念起我的好朋友刘爱琴，如果她在就好了。她虽然和我差不多大，但是她在童年受过许多苦，后来和她的哥哥刘允斌来到莫斯科儿童院后，又一直担任女学生组长的职务。她待人热情，富有同情心。在我刚回到莫斯科的时候，因为学习压力大，又在一个陌生的中学学习，常常有一种寂寞的感觉。刘爱琴就常来看我，陪我出去玩，介绍许多朋友和我认识。慢慢地我走出了陌生和寂寞，重新树立了自信，能心平气和地面对各种压力。后来刘爱琴在1949年随父亲刘少奇回国，分配到师大女附中教俄文。

眼下这事，指望不上别人帮忙了，只能靠自己拿主意了。

这时，爹爹和我已经离别八年多了，加上国内的形势越来越好，爹爹可能非常希望我能回到他的身边。他在信中提出，想让我回国读大学。他说，上海已经解放了，上海的高等院校不比莫斯科的差，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专科学校都有……他还说：你的身体不好，特别是淋巴结核久治不愈，让爹爹担心。中国的传统中医对

这样的顽症有显著的疗效，回来后可以边治病边学习，身体、学习两不耽误。

爹爹这番充满深情和爱心的话语，让我感动，但也让我矛盾。说心里话，我恨不得插翅膀飞回去，可一想到爹爹在延安对我说的一番话，对我寄托那么大的希望，我又犹豫起来。爹爹当时要我学业有成后再回来见他，可是我现在只是完成了中学教育，离爹爹要求的学业还相差很远。我在这里大家都知道我的经历，即使我年纪大一点儿，同学们都不见怪。如果去了陌生的上海，别人会问：喂，朱敏，你在苏联十年都没有完成大学的课程，这些年你去干吗了？

面对这个尴尬的问题，我如何解释？我说我被德国鬼子抓到了德国集中营……这些国外经历，国内人怎能体会和理解？再说，上海的学生能接受我这个几乎全部欧化的人吗？我能适应上海人的生活吗？

上海在我的记忆中，是一个繁华的大城市，也是一个使用古怪方言的城市。到那里，我需要很长时间才能适应。可是，我的年龄已经不允许我赔出更多的岁月来适应一个新的学习环境了。

我刚从陌生中走了出来，难道又要投入另外一个陌生？人，或许无法逃避从一个陌生投向另一个陌生的现实。

但我不愿意再次投入一个陌生环境！也不愿意两手空空回去见爹娘！

现在，莫斯科在我的眼里已经变成熟悉而温暖的都市。我希望以后的学业继续在这里完成。我反复考虑了好几天，还是难舍刚刚“情投意合”的莫斯科。不过，爹爹要我回去治病也确实是件迫在眉睫的正经大事。

我在莫斯科学习的这几年，从集中营留下来的老毛病始终没有除根，脖子上的淋巴结核时好时坏的。儿童院的院长请来了莫斯科最好的医生为我治病，但因为病情拖延的时间太长了，只能减轻病情，却无法根治。我只好边学习边治疗，基本将病情控制在对身体不造成严重危害的程度，这样才免除了我因身体欠佳而再次辍学的危险。

想想那个年代，重压之下，必出勇夫。我的压力比其他孩子大得多，来自身体的病痛、年龄的压力和一个又一个的考试，时刻压迫着我的神经。但我都挺了下来，学生考勤本上几乎找不到我一个迟到或者缺席的红圈圈。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体内爹爹遗传的那一部分坚强性格的潜质被沉重的年轮挤压了出来？不断从内心深处涌出不认输的养分，润滑着紧张的神经，不致于过于紧张而崩断。

我决定留在莫斯科！

这时，爹爹顽强乐观的性格又在我的身上显现了。病，可以迟几年再治；学业，一天也不能耽搁。

我决心已定，马上提笔给爹爹写了封长信。信是全

部用中文写的，估计这信中有不少错别字，但词能达意。我想爹爹一定能看懂的。

我把我的想法都告诉了爹爹，并提出我在莫斯科报考列宁师范学院，攻读教育专业。我希望爹爹能同意我的想法，让我继续留在这里把学业完成。

没有想到爹爹如此地体谅和理解他的女儿！

他怕我因为何去何从的问题分心，耽误了考大学，就先拍来电报，上面两个字——同意。紧接着来了封信，他不仅同意我继续留在莫斯科求学，也非常赞成我以后当教师的选择。信的末尾，爹爹写下这么一段话：如果今年放暑假有时间，希望能回家看看。

爹爹这小小的要求让我这个做女儿的无地自容。

看望父母，这是每一个儿女起码应该尽到的孝心，可我因为战争，因为学业，而无法实现爹爹这个非常简单的愿望。考完大学后的两个月的暑假里，我一头扎进图书馆，把所有时间都奉献给了教育专业的课本。我怕进大学后，跟不上进度，就来个“笨鸟先飞”。

这一年，我和我的祖国都在飞跃。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宣告成立。这时，我是莫斯科列宁师范学院的一名新生。

1950年，我终于回到阔别十年的祖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我们是通过莫斯科电台知道的。

那天晚上，我们中国留学生和苏联学生一道，在学校的校园里点燃篝火，大家载歌载舞，一直欢乐到天亮。

这是我们的父辈出生入死，浴血奋战，献出了无数战士的宝贵生命才换来的开国大典。我们此刻对新中国的向往和热爱比任何一个孩子更加强烈而深刻。

1950年夏天，我迎来了大学的第一个暑假。这次我一定要回国度假，去看望已经年过60的爹爹，无论如何不能再让爹爹的愿望落空。

这条回国的路途好漫长好辛苦啊！

我怎么会有这样的感觉？我奇怪。其实，回国远比当年出国的路途好走得多了，至少不需要躲躲藏藏的。可是相隔10年，已很难让我清晰地感受当时遭受的磨难；甚至惊讶，惊讶14岁的我居然能从容地走过艰难险阻的长途，抵达万里之外的莫斯科。原来，记忆这个东西会超越尘世艰辛，有着不老的生命力，再现时，它会让人品尝一种独特的味道，就好像枯黄的草原上长出了一层绿草。许多年以后，特别是进入老年以后，我饱经屈辱的集中营岁月也有了回味无穷的感觉。以前，我最不愿

意谈论的话题就是集中营，以致和我共事数十年，许多人都不知道我有这段经历。那时，我伤痕累累的心灵拒绝这段历史占据记忆的席地。现在，50多年过去了，这段岁月开始重新回到我的记忆中，并且能回想起许多有趣的细节。这大概就是时间能改变一切的神奇魔力吧！

火车走啊，走啊，在苏联境内走了五天五夜才到中国边境。我们在火车上经过中国海关人员查验护照后，列车换上了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蒸汽机车头，这标志着它将享有中国领土的主权。记得火车进入祖国的第一站正是半夜。从检查护照到火车开车，我就一直没有离开窗口，注意倾听每一个站台播音员的声音，我的心情时而平淡，时而激动，时而是一片空白……

火车进入了中国东北部的第一个站满洲里。

火车刚刚停稳，我突然被广播里陌生的语音吸引了。我纳闷：这是中国境内的站台，为什么中国的汉语我听不懂？是不是他们在讲蒙语？我连忙起身贴着车窗的玻璃看站台的名称——满洲里。这是中国著名的地名，在抗战时期，日本曾经在东北建立傀儡政权，就叫“满洲国”。

莫非是我忘记了祖国的语言？脑海里涌上这个让我担心的想法，但又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就地起身问旁边的中国旅客：站台上的播音员说的是不是中国普通话？

我得到的答复是肯定的！

我一面用新奇而激动的目光注视着月光下的祖国，

一面为自己听不懂母语而沮丧。

天亮时，火车抵达了哈尔滨。这是东北三省中最大的一个城市，站上传来的声音依然让我听着吃力。离开祖国时间长了，那些亲切的母语竟然变得这样生疏，我不由得有点紧张：如果看见爹爹也说不出中国话，可怎么办？学到了专业知识却丢掉了自己的母语，这同样是一件让父母失望的事情。

在莫斯科学习的时候，没有语言障碍，也没有去考虑以后回中国怎么办，总是想我天生就是中国人，又在中国生长了14年，总不至于会忘光吧。看来，我把自己的汉语水平估计得过高了，现在着急也没有用，临时抱佛脚也来不及了。

从东北到北京，路程短，再有一天两夜就可以到了。

中国刚刚迎来解放，战争的创伤还没有修复。一路上仍可看见战争的痕迹，许多地方的村庄还倒塌在战争的废墟中。贫穷的人很多，逃荒要饭的人群随处可见。

我没有去过北京，从爹爹来信中知道，爹爹和中央机关住在北京郊区一个叫香山的地方。回国的朋友也来信说，香山是北京一处最美的风景地，特别是秋天，满山红叶把山林装扮得格外红艳。所以，我到北京之前就已经将香山这个地名牢牢记住了。

到北京火车站后，爹爹派人来接我。我上了汽车后，一听接我的人会说俄语，便高兴极了，一路上就东问西问的，什么景色都觉得新鲜。

汽车在北京低矮狭窄的街道上行驶。我感到很吃惊，北京古城怎么这样简陋？街道两旁都是灰色房屋，很少看见高层建筑。不过清朝王爷贵族的房屋倒是很有气派，金色琉璃瓦，雕花梁柱，朱色大门上鼓着一排排镀金疙瘩，据说这是财富和身分的象征。几天后，我去皇帝居住的“紫禁城”故宫参观，才知道北京是“天子”的天下，有钱人在这里过着天堂的生活，而穷人则在地狱中艰难求生，贫富悬殊极大。

街上行走的人，穿着打扮也很单调，女人几乎是清一色，都穿布旗袍，男人白色短袖衫，蓝色长裤。不说和莫斯科相比，连哈尔滨也比北京富有色彩，一点儿也没有聚集莘莘学子的现代味道。

我看看看着，汽车驶入一条有紫红色围墙的街道。我正想问这是什么地方，汽车一转弯，进入了一个古色古香的大园林里。我正在纳闷，接我的人告诉我，中央机关已经搬到了中南海，就是我们汽车现在进入的这个红墙围绕的大园子。原来这里是清朝皇帝的行宫，里面的建筑都是清朝四合院式的，院中有园，有山，有楼阁亭台，最有特色的是七百亩湖面，形成一个钩子形，钩子头称为“南海”，钩子把为“中海”，合在一起称“中南海”。我们进中南海时，看见湖面有许多小舟，中央领导人和家人休息的时候常在湖上泛舟。夏天里的中南海，格外宁静，泱泱湖面，微波荡漾，凝聚了古老而醇厚的悠久历史，展示着庄重而多彩的丰姿。

“那香山呢？”我听到这些精彩的介绍仍不满足，还念念不忘那块美丽的地方。

“只是留了些机关在那里看守。不过，中央五大领袖在香山都准备了别墅，朱老总也有，到时他会带你去的。”

我不知道五大领袖指的是谁，但我能估计出几个，有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还有爹爹，最后一个是谁我说不准，后来知道是任弼时，不过任伯伯在1950年突然病逝，由陈云接替。

爹爹的房子靠近中南海西门，也是一座清代风格的建筑，前面一个大院子，后面又连一个院子。古房子又大又高，房梁上有雕刻的图案，不过年代久远，已看不清是什么了；大红色的柱子也油漆斑驳，色调很陈旧，隐隐还能闻到一股霉味从房间角落里飘出……

这就是我的家？思念了10年的家？

我站在客厅里，正在四下打量，观察这陌生的环境，康克清妈妈从后院过来，一进门，就紧紧拉住我的手，叫了声“朱敏”眼眶就红了。

我看见眼前亲切的妈妈，心头一热，第一个感觉——我到家了。

“妈妈，我回家了。”妈妈这词是世界通用的语言，可后面一句又变成了俄语。

妈妈听懂了我的语言，她张开双臂拥抱着我，说：“是的，孩子，回家了。”

我说不出中国话，就不断用俄语重复：“妈妈，我回

家了。”

不一会儿，爹爹开会回来了。那时，中南海里没有冷气设备，爹爹进屋时一头汗，背脊丝绸短衫上也印了一块深色汗迹。他一看见我，没有像康克清妈妈那样上前握我的手，而是站在我的跟前，嘿嘿地笑。

爹爹没变，还是那样朴实，健康。他看我时的眼光，和10年前一样，充满了怜爱和喜悦。细细看，爹爹比10年前多出许多皱纹，但身体胖一些了，脸色也比以前红润，大胡子刮得干干净净，显得很精神。

这次回来，我是个大人了，不再像10年前，一看见爹爹，委屈得跟啥似的，一头扎在爹爹怀里直流眼泪。

我从警卫员手里接过热毛巾，递给爹爹：“爹爹，你先擦擦汗。”

“真快，一转眼10年了，你也长成大人了。”爹爹边擦汗边说。

“爹爹、妈妈，你们也多老了。”我说这么简单的汉语也很吃力，老是出现错句子，把“老多了”说成了“多老了”。

爹爹笑了：“啊呀，我的孩子，你的汉语可是不怎么样啊。你这次回来，两个任务：一是治病，下决心把病治好。第二个就是学习汉语。你看看，我的女儿把老祖宗的话都忘了，怎么行？以后爹爹每天教你，给你当汉语老师，好不好？”

我也笑了，点点头。还是少说为妙，不然，又要让

爹爹笑话了。

过了一天，爹爹请来了老中医，开始为我治疗淋巴结核，吃了几服中药后，肿块明显缩小了。爹爹说，这是好兆头，只要坚持吃中药，这病一定会根治的。因为病情有了起色，我的心情格外地爽朗。每天晚上，爹爹都一字一句地教我说汉语。

爹爹见我总是讲不好汉语，有时靠讲俄语外加打手势和别人交谈，挺费劲的。他想，这样不行，中国人不会说中国话哪成？女儿暑假又短，上学也来不及。不如他自己当汉语老师，教我说汉语。

爹爹给我当汉语老师，课本是毛主席著作。他念一句我念一句，他说四川话，我也就跟着说四川话。到底我是中国人，学说中国话很快，离开北京回莫斯科时，我已经能用汉语和父母交谈了，不过还结结巴巴的。

直到今天，我回想起这段岁月，仍感到特别温馨。这是我和父亲相处最亲密的一段时光，这种时光在我的一生中并不多。

我每天的生活安排得有条不紊，早晨和爹爹妈妈去湖边散步，白天或是会见我原来在莫斯科的老同学们，或是温习功课，晚上听爹爹“讲课”，有时陪爹爹去参加中南海的舞会……这日子过得真快，转眼一个月要过去了。

一天，我对爹爹说：“我想去香山看看，爹爹你带我去，好么？”

“好啊，我好久不爬山了，腿都硬了。人老先是腿老，

多爬山对身体有好处，过几天我带你去。这几年，你吃了不少苦，身体不好，有机会也应该锻炼锻炼。”

我回来以后，爹爹很少问我在集中营这段生活情况，我也尽量避开不谈。

4年囚禁生活，使我变得坚强，富有承受力。其实，爹爹不需要多问，他能不知道法西斯铁蹄下的集中营意味着什么？死亡、地狱、黑暗……用多么过分的词汇形容都不过分的地方，女儿能生还，已经是奇迹了，他还能期盼什么？

爹爹爱好运动，晚年最爱爬山和下象棋

爹爹家和刘少奇家、杨尚昆家相隔很近，都住在中南海西边一个叫“西楼”的地方。三家人在一个餐厅里用餐，因为刘爱琴有时也住在父亲家，我们经常能见面。毛泽东的女儿李敏也已经从莫斯科国际儿童院回到国内，和父亲住在中南海湖畔“丰泽园”里，她那时正在北京上中学。1946年我从德国回莫斯科时，她还在莫斯科儿童院，但她的母亲贺子珍却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在莫斯科郊区的一家精神病医院里治疗。1949年她们回国时，贺子珍没有回到北京，而是安排在上海疗养。因我和李敏是一同离开延安到莫斯科的，后来我们又各自经受了死亡的考验，彼此有一分天然的亲热感。我一回来，

她就来看我。她好像见到了“知音”，一见面就讲上了俄语，全然忘记我们是在中国，在中国最核心的地方。

有一次，正好爹爹在家里，看见我和李敏用俄语谈得十分开心，走过来好像有话想和我说，但没有说，摇摇头，又出去了。

这次我和爹爹妈妈去香山时，也叫上她们，一来热闹，二来有说俄语的伙伴。

这一天，我和刘爱琴，还有从四川老家来的小侄儿小侄女，李敏带来了比她小3岁的妹妹李讷，除警卫员外，我们小字辈就有6个人，搞得爹爹和康克清妈妈像“维持秩序”的家长，左右召唤，特别是年纪小的李讷，妈妈经常关照她，怕她走得太累。

我们跟随爹爹爬山，整个儿前呼后拥，唧唧喳喳，活像一个国外旅游团。爹爹和妈妈反而插不进话来。爹爹虽然在莫斯科住过一段时间，可现在俄语已经忘得差不多了，只有单词还能听懂一点儿。他用半生不熟的单词提醒我们要用汉语交谈。说汉语比较好的是刘爱琴。她已经在北师大女附中担任俄语老师，有许多时间和学生在一起，熟悉了汉语。她不断用汉语同俄语和我们讲话，加强我们的听力。

看见爹爹步伐沉稳，一步一步往山上爬，我觉得奇怪：他这一辈子爬山还没爬够啊？

因为我常听别人说，爹爹年轻时爱打篮球，进入60岁以后才逐步由爬山取代。爹爹在长征路上曾经组织过

篮球队，如果从年代上看，这恐怕是我军第一个体育组织。当时，没有篮球，爹爹他们就用牛皮缝个圆形的皮囊，再在里面装上棉絮。虽说这土制篮球不能在地上弹跳，但可以在大家手里传递，还不如称为“橄榄球”更合适一些。篮球架就更简陋了，借助路边大树的树杈，谁要是把球投过某个规定的树杈，就算进球得分。这种土著似的打球方法，居然赢得红军战士的钟爱，不管跋涉多么辛苦，队伍一扎营，大家听见爹爹的哨声，会纷纷跑向“篮球场”，等候开赛。

长征途中的这一原始的体育运动，既保持了队伍的活跃情绪，又锻炼了战士们的矫健身手。到延安后，条件好多了，中央机关里有了标准规格的篮球场地，也有了木头做的篮球架和充气的篮球。昔日篮球爱好者的兴趣更加浓厚了。因为爹爹爱打篮球，也“传染”了妈妈，篮球场上经常能看见爹爹和妈妈同场“竞技”。后来，爹爹去了山西太行山，但他只要一回延安，一定是要上球场的。不过，爹爹如和妈妈打对家的话，会经常犯“错误”。他在职外观战，绝对“旁观者清”，可一上场，就“当事者迷”了。

妈妈打球时，头脑非常机灵，看见自己这一方要输了，就对爹爹高声喊：“老总，把球给我，快传给我！”

爹爹一听见妈妈的喊声，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把球传给了妈妈，传给了对手。等反应过来，只好眼睁睁看见自己手里的球进了自家的球网里，给对方送上一分。

老总，你在和谁打球？你这不是在帮对手打球吗？同队的老少队员，也不管爹爹是八路军总司令的身分，都急红了脸，对着爹爹直喊。

爹爹也知道自己犯了“错误”，连连保证下不为例。可是没有一会儿，他又听见妈妈在叫他，依然“敌我不分”，把球传给了妈妈。这下，爹爹错得无法让人原谅了，队员们一致要把爹爹罚下场。

爹爹不怕挨批评，就怕不让他打球，就说是妈妈犯规，应该把妈妈罚下场。大家说这是你们家庭内部“斗争”，你们两人只能上一个。

爹爹和妈妈经过“谈判”，爹爹胜利了，又获得继续比赛的资格。以后一遇到篮球比赛，大家就把爹爹和妈妈编在一个队，这样他们会配合得非常默契，爹爹的球也不会传错了。

后来，爹爹年纪大不能再进行激烈的运动，他就开始将爬山作为运动项目。

其实，爹爹这辈子没有离开过爬山，无论是军阀混战时期，还是红军长征，或者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爹爹在一个多山的国家指挥千军万马，爬山几乎就是爹爹生活的一部分。

我想，现在爬山的目的和以前战争年代不一样，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此时爬山只是运动而已。或许爹爹对爬山的喜爱，在早期作战的需要中便落了根，经过长期的潜移默化，欣赏和陶冶情趣的意义在一次次急行军中

得到升华。

中国文人最喜爱的活动之一便是“五岳寻山不辞远”。晚年的爹爹虽不能去五岳寻山，但他不会放过近处爬山的机会。

我们这次爬香山就是爹爹无数次游山中的一次。山越爬越难，越爬越累，渐渐我们和爹爹拉开了距离。每到了山道拐弯处，一马当先的爹爹便坐下来，边喝水，边等我们这些体力不支的晚辈们，然后他再一手拉着一个往上走，最后小李讷走不动了，爹爹就拉着她走，直到山顶。

到山顶时，我们一个个已经汗流浹背，气喘吁吁，不再像刚出发时那么高谈阔论，神气活现的。不过，到达山顶，人有一种征服的快感，那么高的山已经成为我们脚下的风景。难怪爹爹爱爬山，可能他在爬山中能得到回味，得到艰苦卓绝、克服万难的勇气和力量，因为这些感受在和平年代是无法随处得到的。

后来我才知道，爹爹这次是专门陪我爬山。如果在平时，他去爬山总会约上几个老战友，而且这些老友和他除了都有爬山爱好外，还有共同“副业”爱好——下象棋。

他们经常是爬一路下一路，而且是不服输地争论了一路。如果爬山者中间有彭德怀，有邓小平，那山可就爬出特色了。

他们爬山前，几家警卫们会不约而同地都准备了行

军床和象棋。爬山爬到半腰，大家渐渐放慢脚步，心照不宣地坐了下来。警卫们也不需要问，知道他们要“摆战场”了，支起行军床，拿出马扎凳，放好象棋盘。爹爹和彭德怀是一对老棋友，从红军时代下到抗日战争，又从抗战下到解放，如今又下到北京城，把棋盘摆上了香山。

后来，彭德怀到朝鲜战场，连有限的几次回京，都忘不了和爹爹对弈一把。1959年彭德怀离职后，正好爹爹也闲居在家，就经常去郊区的吴家花园和彭德怀下棋。

平时爹爹很温和，但坐到棋盘前情绪就外露了。这对战场上的正副总司令，一尺见方的棋盘成了两人继续施展军事才能的用武之地。只要一开战，和善的表情全没了，拼命要将对方的军。

“砰”，爹爹是红子，先走。

爹爹不仅和彭德怀性格不一样，连他们“吃”对方棋子的作风都不一样。爹爹“吃”子是用自己的棋子将对方的棋子“扫”开，然后用手把棋子拣出棋盘，像展览战利品一样把“缴获”的棋子排开一溜。彭德怀则不然，他“吃”子和他的脾气一样吓人，“砰”地把自己的棋子砸在对方棋子上头，然后从棋子下面把子抠出来，丢在一边，“俘虏”的棋子狼藉一片，好像毫不在意他的战绩。如果碰到彭德怀悔棋，爹爹会非常敏捷地抓住对方手腕，眼睛瞪得滚圆，声音洪亮：“不能赖棋！放下！”

彭老总脖子都直了，干脆赖到底：“你是偷吃，不算！”

“吃你的子，还要发表声明么？战术不行就不行嘛，悔棋算啥子？”爹爹寸土不让。

碰到双方争执不下时，站在一边观战的邓小平就会出来当“裁判”，主持公道。对于邓小平的裁定，爹爹一般比较服气，不过彭老总却要剜“裁判”一眼，给自己找个台阶：“小平同志，看在你面上，让他。”

结果，在他们的特殊“战场”上，常常是从上午鏖战到黄昏落日，才收摊下山。

临了，到上汽车告别时，双方脸上笑容荡漾，嘴上却硬得邦邦响：“下次决不手软，杀你三百盘，有你好果子吃！”

1974年，彭德怀去世时，临终想见爹爹，一次又一次向看押的看守请求，可谁也不告诉爹爹。直到彭德怀死后，爹爹才知道彭德怀临终的心愿，他顿时老泪纵横，泣不成声，对着空荡荡的房间大声叫嚷：“你们为啥子不让我去看彭老总？要死的人，还能做啥子？还有啥子可怕的！……”

我们从山上回来后，爹爹一点儿事儿也没有，我却累得两条腿酸疼了好几天。

有一天中午，我正在家里看书，听见门外有男人用俄语问：“赤英在家吗？”

猛不丁听见有人叫我赤英，我条件反射地站起身，紧张地往外走，会是谁呢？

“啊呀，是岸英哥哥！你把我吓坏了，当是德国鬼子

呢……”我出去将躲在门外和我捉迷藏的毛岸英拉进屋里，和他开玩笑地说。

毛岸英还是老样子，高大，英俊，对人和气，甚至在莫斯科一样，一见面就叫我的化名。因为有德国那段寻找父亲的特殊经历，“赤英”成了毛岸英称呼我的专利，使得我们之间有了许多话题。

他这次特意来看望爹爹、妈妈和我。

那时朝鲜战争还没有爆发，此时的毛岸英依然那样无愁无忧，又说又笑的。可是几个月后，他就和我们永别了，至今他的坟墓都在朝鲜的土地上，我连为他扫墓的机会都没有。想想那时，他在国际儿童院是中国孩子中第一个参加苏联红军的军人，使得好多男孩羡慕得要死，恨不得和他共同穿那一身军装。毛岸英哥哥年纪不大，却历尽磨难，饱尝人间冷暖。在失去母亲杨开慧后，他们兄弟四处流浪，一次次从国民党警察的棍棒下死里逃生，顽强地活了下来。在“二战”时期，他没有倒在第二故乡的土地上，回国后也没有在解放战争中遇难。可刚刚和新中国分享喜悦，成为新郎的他，在1950年11月——这是抗美援朝的第二个月，长眠在生活战斗才30多天的朝鲜战场上，献出了他年仅28岁的生命。

我一想起和毛岸英短暂却令人难忘的几次相遇，心里就隐隐作痛。他离开这个世界太早，命运对他太残忍、太不公平！可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儿子呢？



第九章

返回祖国

- “月下老人”一线牵，一个男青年走进了我的生活
- 爹爹对我严格的程度几乎不近人情，这时我才开始真正了解爹爹
- 爹爹当了元帅，又当了爷爷，他的生活依然十分简朴
- 爹爹和妈妈对孩子教育各有特点，爹爹慈祥，妈妈严厉
- 爹爹支持我参加“四清”运动，我失去了一只眼睛

“月下老人”一线牵，一个男 青年走进了我的生活

很快，两个月的暑假结束了，我又要离开家人，回莫斯科继续读书。

这次回家，我看见了爹爹、妈妈，后来又和外婆、姨妈和表妹团聚。

整整离别了10年，让拉扯我长大的外婆、姨妈想念得好苦，也让我想得够呛。听说她们要来，我激动了好几天，一肚子话要说给她们听，可一见面，我什么也说不出，只知道流泪傻笑。人就是这样奇怪，想的和说的好像不受一个大脑指挥，明明一肚子话，可一到嘴边就消化了，真让人生气。

离开北京时，我想外婆年纪大了，不知以后能不能再见到她，老是有点依依不舍的。外婆却很理智，说我原来离开外婆是为了逃命，现在离开外婆是为了学习，放心去吧，外婆这把老骨头结实着呢，还等着抱重孙呢！

外婆把我闹了个大红脸，她却还不收嘴，反而越说越带劲，差点没羞得让我逃出门外。

“飞飞啊，你年纪不小啦，应该找对象了，有合适的就赶快定下来。只要人忠厚，对你好，就行。不要挑三拣四花了眼，耽误了女儿身！你爹爹妈妈都是忙国家大事情的人，离你又远，顾不上你的终身大事。你就自己

拿主意，不要不好意思，现在都解放了，婚姻更应该由自己做主了。外婆这话对不对？”

我不知道外婆当初是不是也这样鼓励她的女儿们争取婚姻自主的，反正她在鼓励我正视个人问题，大胆去追求幸福。外婆真是不同凡响的前辈，她那时已经70多岁了，能这样开通，实属罕见。

这次暑假我觉得收获特别大，第一是看见了离别10年的亲人，而且他们现在身体都硬朗，生活很好，让我放心；第二是把集中营落下的痼症彻底治愈了，不再遭受疾病的折磨；第三，我得到亲人们真正的关怀和指点，特别是外婆一席话，好像在我的心灵深处打开了一扇窗户，让爱情的春风吹进我缺乏思想准备的心田。

再回到莫斯科时，我整个像换了个人，无论是精神还是身体，都进入了最佳状态，使得女孩子最美妙的年龄散发出青春的气息，我的脸色如化妆般地迅速鲜亮起来。同学们见了，无不惊讶，你们中国是不是有神仙药？两个月，就能把一个病殃殃的“灰姑娘”变成了一个美丽可爱的“红苹果”？

生活第一次向我发出热情似火的“请帖”，在我眼前展示了多彩多姿的画面。

我再也不会因为身体而自卑，因为学习掉队而烦恼。我课余时间参加了许多文娱活动，好像对什么都有兴趣，浑身有着无穷的活力。

阳光灿烂的日子彻底驱走了苦难岁月留下的阴影。

我由一个忧郁沉默的孩子，变成了活泼开朗的姑娘！

这时，爱神开始光临我多年荒漠的情怀。男学生们有约我出去跳舞的，有请我郊游的。出于礼貌，我有时也去赴约，或许缘分不够，或许火候不到，一接触“爱情”实质问题，我就举棋不定，强烈的祖国观念束缚着我的感情，始终不能在苏联青年中作出抉择。我看过许多爱情故事，享受过书中主人翁浪漫情感的冲击和感召，也相信真正的爱情是没有国界的。可事情一落到自己头上，便说什么也潇洒不起来了。祖国，这个抽象的概念，这时变得非常具体，好像是我感情世界中一道无法跨越的栅栏。

不是我不需要男友，不向往爱情。但，这“绣球”应该抛向谁？让我困惑和苦恼。那些苏联男同学，都很可爱，也有作为，相信会成为一个好丈夫。但让我一辈子生活在异国他乡，我会受不了的。我的根在中国，是祖国花费了大笔经费培养我上大学，我怎能不报效祖国呢？即使男方随我回中国定居，那么，我们中间总有一个人要背井离乡，品尝苦涩的思乡之苦，这滋味同样不好受。

我决定我的“绣球”不抛向异国求爱者！

第三年，也就是1952年，康克清妈妈参加世界妇女大会后，率领一个多国妇女参加的访问团来到了莫斯科。我随她一道参加了访问活动。妈妈也很关心我的个人问题，问我是不是有对象？如果有合适的人，只要你经过慎重考虑，爹爹和妈妈会尊重你的选择。妈妈这番话让

我感动，这是一个长辈对我最大的信任和理解。

我和妈妈度过了一个短暂的美好时光。

因为经常陪同妈妈去莫斯科大使馆，在那里我和一个河北籍的工作人员认识了。也不知这是缘分，还是天意，我看见他的第一眼，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那瘦高的个头和英俊的面容，特别是他那双明亮而敏锐的眼睛，透出他内在的秀气和聪慧，让人怦然心动。

后来我知道他叫刘铮，比我小一岁，26岁，至今单身。他的俄语很好，工作也很认真积极，因为性格随和，在大使馆里特别有人缘，大家都一致赞扬他的为人和品格。不知怎地，过了一段时间，我再去大使馆时，一看见他，就感觉我们之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他以前对我很热情、大方，可自从他知道我是朱德的女儿后，变得拘谨、不自然起来。

以后我才知道，他和我认识后，对我也产生了爱慕之情。可他的领导觉得我们的身分有差距，就劝他不要找我，怕朱老总不会同意这门亲事的，免得大家都尴尬。刘铮想想也是，一个是普通的干部，一个是总司令的女儿，双方悬殊太大，就打消了和我进一步相处的念头。

蒙在鼓里的我，还以为刘铮另有所爱。我碍于女孩子的面子，又不好去打听。直到一次参加大使馆活动，无意中听见不认识我的人在我跟前议论我和刘铮的事情，才恍然大悟。从他们的话中，我知道问题出在大使馆领导怕我们门第悬殊，爹爹怪罪下来，担当不起，而不是

刘铮本身的问题，我这才松了口气。

年轻男女之间，有时中间只隔一层窗户纸，一捅就破。我们了解了对方的心，就再无顾忌，和所有天下有情人一样，热烈地相爱了。

这经过曲折河道的爱情小舟终于驶到了我们的面前，只要我们登上这不知前面航程是否有暗礁有急流有旋涡的小舟，就意味着我们要风雨同舟，厮守一辈子！

我们谈恋爱的消息，让大使馆的同志和领导很紧张，说是要请示朱老总，才能批准我们结婚。我知道后很生气，我是朱德的女儿没错，可我从来就是普通的孩子；爹爹是总司令也没错，可他从来没有特殊的要求。他和平常的父亲一样，关心女儿的幸福，而不是关心对方人家的门第和职位。我从来都相信我的爹爹，他会尊重我的选择，特别是婚姻，他会给我最大的自由限度，让我自己做主，主宰自己的命运。

我平时遇事遇人都很和善，从不和人争执。但这件事情，谁也别想让我回头！我认定了刘铮，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拦我们相爱的脚步！

后来，我将这件事情告诉了爹爹。爹爹和妈妈来信表示同意，并祝贺我们新婚快乐，白头偕老！大人的态度，是我预料之中的。

我们都已成熟，自然会获得成熟的爱情；又都在苏联，我们的爱情也涂抹了罗曼蒂克的浪漫色彩。我们一同郊游，我们双方都有许多苏联朋友，经常一起聚会。

1953年初，我们在中国驻苏联大使馆举行了简单而隆重的婚礼。

我们的婚礼虽然没有亲人参加，但没有一点儿冷落的感觉。我们在苏联的朋友、同学和同事都来喝我们的喜酒，为我们带来了热烈的祝福。婚礼上我们唱了中国的歌曲……这一刻，我觉得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以前听别人用神秘的口吻议论新嫁娘时，我总是觉得这个名称对我来说是那样的遥远和渺茫，转眼我自己也做了新嫁娘，而且是在外国、父母不在场的情况下做了新嫁娘，这种感受更加特别，有一种自由而轻松，又有水到渠成一般的自然。

婚礼后，我们又按照苏联的习惯，外出度蜜月。

1953年底，我要毕业了，我们的第一个孩子也要出生了。

爹爹知道我有了身孕，就来信要我一毕业就回国，让孩子在北京出生，说我的单位也落实了，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这使我很高兴，当老师一直是我的志愿。我听从了爹爹的意见，毕业典礼一结束，我们就匆匆返回祖国，让我们的孩子一出世就呼吸祖国的空气。

一到北京，我们的儿子就迫不及待地来到了世上。把我们吓了一跳，这小家伙性情再急躁一点儿，就生在莫斯科了。

我产假刚满，爹爹对我说：“你的哥哥也生了个男娃娃。我准备将你们的娃娃留在我身边，由我和你们妈妈

照顾。你们现在都年轻，正是为党好好工作的时候，不能因为娃娃影响了工作。产假一满就去单位报到，大学里缺教师，你不要因为孩子请假，把心全放在教学上，听到么？”

我以为爹爹把孩子留下，肯定会让我继续在中南海住下去的，可等到我报到上了班，爹爹把孩子抱到他和妈妈的房间，然后让我搬到学校集体宿舍里住。

爹爹把外孙留下了，却把他的女儿“赶”走了。

爹爹对我严格的程度几乎不近人情， 这时我才开始真正了解爹爹

真正了解爹爹，是我从莫斯科回来，分配到北京师范大学工作以后。

以前我和爹爹都是短暂的团聚，爹爹对我也没有过多过高的要求，我也从没觉得爹爹是个严厉的父亲。我想，是不是因为我是女孩子，又是最小，爹爹可能对我娇惯一些。后来我才知道，那是我对父亲还缺乏深刻的了解才会产生的想法。其实，爹爹对我们子女都一样严格，只是原来我不经常在身边，无从知道爹爹的内心。如果真正了解爹爹的内心和他做人的原则，那么对他的严厉、严格甚至是苛刻，我们就能够深深地理解。

所以，爹爹的有些做法不能用人间常情来作简单的比较和解释！

记得在我回国前，爹爹曾对我发过一次火，因为我不了解他当时的想法，结果让我委屈了好久。如果这事放在我回国以后，我说什么也不会向爹爹提那样不懂事的难题，更不会觉得委屈了。

爹爹那次发火是1951年秋天。因为所在的学院要求学生搞社会调查，我就回到北京搞一些社会调查。这期间正好碰到新中国成立两周年的国庆节，按照惯例，党和国家领导人这一天都要登上天安门城楼和首都人民一道庆祝节日。我上次暑假回北京，去过天安门广场，但没有上过天安门城楼，对那高高的楼台十分向往，真想站在上面，看看北京的景色。这次一听说爹爹要去城楼，就想让爹爹也带我一起上天安门城楼。

没有想到，我刚一说出这个想法，爹爹就生气了，说我不懂事，庆祝活动是中央的集体活动，怎能带子女？见爹爹没答应，我不死心，觉得庆祝节日是轻松的活动，哪能那么认真？我将刘爱琴叫来，她也没有去过天安门城楼，正好也想上去。我们走到爹爹跟前，故意把眼泪硬挤了出来。

看，我们都哭了，你还不带我们去啊！我以为用这一招，爹爹就会心软的。

一向和气的爹爹这时不仅没有心软，反而板下脸，严厉地对我说：“朱敏，难道你真这么不懂事？”

爹爹这话伤了我的自尊心，让我在朋友面前没了面子，一下子由假哭变成了真哭，委屈得泪水直流，不服

气地说：“我们在莫斯科时，每年苏联建国的国庆，斯大林都邀请我们几个中国留学生去红场观礼台。我在中国倒不能参加自己的国庆节？还不如斯大林……”

爹爹一听更加生气：“住口！你怎么能这样比较？斯大林请你，因为你是我的女儿，是苏联的客人，那是出于外交礼节，出于一个国家对另外一个国家的尊重。可现在你是在中国，不是客人。如果要参加国庆活动，你可以去天安门广场，和那里的群众一起联欢。天安门城楼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活动的地方，不是你们小孩子去的地方！”

爹爹说完起身就走了。

看见爹爹脸色铁青，我想爹爹是真生气了，也不敢再说什么了。可是心里老觉得很委屈，不上就不上，干啥大惊小怪，把外交礼节都拉扯了出来？好像我们是故意无理取闹。

中午，爹爹从城楼回来。我一见，故意扭头不理他。爹爹好像忘记了早晨那件不愉快的“摩擦”，他微笑着走到我跟前，问：“上午在家干什么了？没有去天安门广场？”

这不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嘛！我眼睛又泛潮了，真想大哭一场。

“朱敏，我知道你还在生爹爹的气。爹爹也想了，上午对你的态度是严厉了些，你可能觉得委屈。不过，你想过没有，其他普通人家的孩子能去天安门城楼吗？因为爹爹的关系你可以和其他普通人不一样，结果会怎样

呢？只会增添你的特权思想。我们是共产党人，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党，不是封建王朝一人当道、鸡犬升天的时代。你要记住一点：你是一个普通的人，和所有普通人一样要自食其力。爹爹讲的道理，你能明白吗？”

爹爹这番话让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接受了一个新问题，一个以前没有思考过的问题：我们这些中央领导人的子女在社会中应该拥有什么样的位置？是特殊阶层还是普通阶层？

当然，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社会普通一员的位置。那么，选择这个生活位置又带来了一个实际问题：你是普通人就必须享受普通人的“待遇”。这一点，我以前没有想过，更没有将“普通”两字放进生活中去体验。

爹爹见我不再嘟噜着嘴了，就告诉我，他已经吩咐厨房里的师傅多做一道西餐，是我喜欢吃的“沙拉”，这次爹爹请客！我到底是年轻人，阴云被风一吹，顿时心情又明朗起来，高兴地拉着爹爹的手往餐厅里走。

这件事情虽说很快就过去了，但我却从中掂出了很重的分量。爹爹的生活原则和做人准则是何等的泾渭分明，不容半点私情！

这一回，爹爹动真格了，一定要“赶”我到师范大学单身宿舍去住。

我在学校的房间，是一间只有12平米的集体宿舍。房间里没有厨房，没有卫生间。刘铮在外交部工作，一年有大半年在国外，家里家外都靠我一个人。这时的爹

爹也快70岁了，身边也需要有孩子照顾，我多么希望爹爹能留我在他的身边啊！

一次我对爹爹说：“爹爹，你年纪也大了，你就我一个女儿，让我留在身边可以照顾你的生活，我也可以尽女儿的孝心。”

“我们国家现在非常需要建设人才。你是祖国和人民供养出来的大学生。你回来的主要任务是为国家建设作贡献，而不是回来做孝子贤孙。只要你好好工作，就是对爹爹最大的孝顺。”

面对一个祖国利益高于一切、无私无畏的爹爹，我还能说什么呢？

一个人住师大宿舍，难免有些冷清，心里老是想孩子，就常常回家去看望儿子。爹爹看见我常回来，又批评我：“你长大了，要学会独立生活。我们留下你的孩子在身边，就是为了不让你工作分心；可你老是回来，时间都消耗在公共汽车上，能有更多的时间钻研教学吗？以后不到星期天，你不能回来！”

爹爹的做法让我无法接受。他的住房很大，有许多工作人员，难道家里就多我一个？我想不通，就赌气不回家。

爹爹见我星期天也不回去，知道我又有了思想情绪了，就让警卫找我回去。我一进门，看见爹爹正抱着我的孩子玩“扎胡子”。爹爹把他的大胡子下巴往孙子脸前一凑，“扎扎扎……扎”小家伙一听见这声音就开始一倒一歪地

左右躲闪，咯咯笑得口水直流……听妈妈说，他们这一老一小经常玩这个“扎胡子”游戏。

我一肚子怨气被他们祖孙之乐的场面融化了。我应该理解爹爹对我的一番苦心，他无非是想让我快点适应工作环境，多为祖国做工作。

爹爹问我为什么有情绪？我说原来有怨言，现在没有了。因为我的思想已经通了，一通就百通。后来我按照爹爹的要求，星期天回家和家人团聚，其他时间都放在了工作上。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感受到爹爹对我严格要求的宝贵意义，甚至到最后，这宝贵意义已经化为我生活中最宝贵的财富。正因为当初爹爹没让我享受特殊的待遇，让我和普通人一样生活和工作，才使我今天能拥有普通人幸福的生活和普通人那金子般的平常心。

我在学校单身宿舍住了好几年，才搬进单元房，一住就是40年。这50年代建筑的宿舍楼已经很陈旧了，许多人都劝我找学校领导，安排好一点的房子。可我想，学校里还有老师至今都没有成套的住房，和他们相比，我应该满足了。

我慢慢地习惯了独自生活，也不想孩子了，全身心地投入了教学工作中去。我一去学校就教俄语新生班，学生水平参差不齐，我又是新教员，没有教学经验，教学中遇到许多困难。因为我平时没有高干子女的架子，大家都愿意和我相处，热心地关心我，帮助我，很快我就

能胜任教学工作，并且将这个俄语班教到毕业。看见我的学生带着知识走上建设祖国的工作岗位，我是多么的欣慰啊！

从事业中得到的快乐是最大的快乐！这份快乐也是爹爹给予我的。

我在莫斯科上学时，常年是供给制，不知道怎样花钱。现在要自己管理生活，结果每月工资发下来，不会计划用，老是一个月工资，半个月就花光了，没有办法，只好又找爹爹。爹爹见我衣兜里只剩下几个硬币，不由地笑了起来：“怎么？老师同志，成了穷光蛋了？工资一个人花还不够，别人一大家子的日子怎么过的？照你这个花法，不把人的脖子都扎起来啦！你的毛病是没有计划性。以后爹爹帮你制定开支计划，要养成良好的用钱习惯。”

爹爹真的给我搞了个详细的开支表，比如每月伙食费多少、水电费多少、书本费多少、衣物费多少、杂支多少、零花多少等等，一项项十分仔细。我以后就按照爹爹这个开支计划用钱，再没有出现“经济危机”的紧张情况。渐渐，我也养成了节省的习惯。

后来我们有了6个孩子，也没有向爹爹伸手，就靠我们两口的工资，把生活安排得有条不紊，孩子个个都很结实、健康。

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工资收入也多了，我还是不爱乱花钱。家里的陈设还是很简单，这个让孩子们都

有意见的节省习惯大概是一辈子也改不了了。

爹爹当了元帅，又当了爷爷， 他的生活依然十分简朴

爹爹在老一辈领导人中，年龄居长，是最早享受祖孙欢乐的人。然而，这个欢乐来之不易，是他和我们亲生儿女饱经长期分离之苦才换来的欢乐。

爹爹看见我回到祖国，来到他身边时，他的内心是有愧疚的……在我们最需要父亲的时候，他是红军的“父亲”；现在解放了，生活安定了，他有精力来尽父亲职责的时候，我们已经在没有父亲的情况下长大成人了。

爹爹无比欣慰却又十分遗憾地接受了这个事实。

我和哥哥先后有了孩子，爹爹那份迟到的父爱终于有了倾注的机会。

爹爹把我们两家的长子都接到中南海，由他和康克清妈妈照顾。他这样既为我们子女分担后顾之忧，又可补偿感情的“债务”。

我们的孩子在他的眼里也没有内外之别，都叫他爷爷。一辈子和枪杆子、地图及各种各样的会议打交道的爹爹，突然膝下有了两个幼儿的哭声，这让他新奇了好久，天天欢喜得跟啥似的，经常能听见祖孙两代人的欢笑声，沉寂多时的庭院里因此变得生气勃勃，充满了生命的活力。

带孩子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让康克清妈妈受了不少累。到了夜晚，两个孙儿都抢着要她，要跟她睡。她只好左右两边，一边睡一个，常常伸出膀臂来当小孙儿的枕头，让他们在她的臂弯里做甜蜜的美梦。

因为我们的孩子是在爹爹身边长大的，爹爹这个开国元勋在孙子的眼里，变得没大没小起来。他们给爷爷起了个诙谐的外号——大肚子爷爷！

“大肚子”有两层含意：一是爷爷“肚里能撑船”，形容爷爷度量大；二是爷爷长期患糖尿病，不能让他吃饱，老是觉得肚子饿，形容爷爷胃口大。

爹爹在临终之际，仍然念念不忘这个遗憾，对康克清妈妈说：“我这一生好像没有吃饱过……真遗憾！”

1955年，爹爹被授予元帅。爹爹那天授衔回来，我正好在家里，看见爹爹一身元帅制服从汽车里出来，猛不丁都不认识爹爹了。他那神情就好像要率兵上前线一样，特别精神，连平时微微驼起的后背也挺得板直。他大步流星走进屋，我和妈妈都迎上前，这时他对我们微微一笑。这表情我非常熟悉，往往在他觉得心情不安的时候就会这样微笑。

“这是人民对我的信任，给予我的荣誉。授予元帅，我心里很不安啦！应该有许多有功之臣获得这个荣誉的，但名额有限，他们都无私地放弃了。还有许多烈士为了我们的新中国，牺牲了性命，这些勋章凝集着无数人的奉献和烈士们的生命和鲜血，不是我个人的功劳，更不

是你们子孙后代炫耀身世的资本!”

其实爹爹不说，我也不会用他的荣誉为自己铺垫道路。这一点我早已想通了，爹爹是爹爹，我是我，我的路必须由我自己一步一步去走。

爹爹当了元帅，可他的生活和以前一样简朴。

我至今还记得发生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是粮食超支。有一天，负责爹爹生活的工作人员对康克清妈妈说，这季度的粮食超出计划 100 多斤。如果家中光是爹爹和妈妈吃饭，粮食是不会超支的。因为爹爹家是一个特殊的大家庭，每到周末，会有十几个孩子回来度周末。这是爹爹为了报答兄弟姐妹对他的帮助，从他的工资中，供养他们每家一个孩子在北京上学，最小的才到学龄，大的也不过 10 多岁。星期天，他们从各自的学校回到这个特殊的家中度过他们的休息日，人最多的时候要开 3 桌饭；床上睡不下这么多的孩子，就在客厅的地毯上打地铺。从建国初期到“文革”初期，几乎每个周末都是这样度过的。

人一多，吃粮就多。爹爹和妈妈的粮油都有规定的数量，困难时期，粮食吃超了连买议价粮食的地方都没有。妈妈和爹爹商量，是不是从警卫局食堂里买一些粮补充？爹爹摇摇头，不让，说现在大家都很难，战士们比我们更需要粮，还是我们自己想办法克服。后来妈妈就买了许多红薯，用红薯代替主粮，硬是将亏空的 100

多斤粮食补了回来。

第二件事情是爱吃猪肉的爹爹，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一同带头不吃猪肉，和全国人民共度难关。爹爹、杨尚昆和刘少奇三家在一个餐厅吃饭，大家的餐桌上都看不见肉。三家中，数爹爹家的孩子多，相比之下爹爹餐桌上的菜，数量就少得多。为了保证爹爹的营养，厨房里每餐为他烧一个油稍多点的菜，以弥补猪肉的养分，妈妈和孩子们则吃少油缺荤的大众菜。每次爹爹的菜上来，我的儿子就把目光移过去，一动不动地望着；正好他的眼睛又大，那份馋劲儿表达得比其他孩子更加执著——我也想吃！

妈妈这时总是想法分散他的注意力，不让他盯着爷爷看。可他毕竟是几岁的孩子，哪有成年人的自制力？爹爹不忍心看孩子的馋相，就你一筷子他一筷子的……孩子们笑了，爹爹的盘子却底朝了天。

杨尚昆伯伯在一旁看朱老总在实行“共产主义”，就走过来，说：“我们来交流交流，我尝尝你们的，你们娃娃也尝尝我的……”他把自己桌上的菜端来，“我的菜好，你们爷爷的菜没有我的好吃！”

孩子们马上放弃了“蚕食”爷爷盘中菜的愿望，觉得杨爷爷家的菜更好吃。以后杨尚昆伯伯常端菜来给孩子们吃，让爹爹能保证吃到那份营养餐。爹爹要是一推让，杨尚昆伯伯就会说我比你年轻，少吃一点对身体没有影响。

爹爹一生爱吃猪肉，而且爱吃油腻腻的大肥肉。身体允许吃肉的时候正好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等能放开吃猪肉的时候，他又患了糖尿病，医生不允许他吃。糖尿病是最苦人的病，我现在也因遗传的原因，患了糖尿病，才真正体会爹爹那时老是吃不饱的感觉。医生对爹爹的饮食控制得很严，每顿基本都是保健菜，过瘾的大荤菜都不让他吃。

一次廖承志夫妇来看爹爹。廖公豪爽奔放，走到哪里哪里就有笑声。加上他和爹爹交情非浅，爹爹在长征时救过他一命，红军四方面军张国焘要杀廖承志，是爹爹救下的。按理爹爹和廖承志的父亲是一辈人，因为有了这段生死之交，廖承志和爹爹便成了忘年至交好友。他们在一起总是非常开心。

妈妈挽留他们夫妇一同吃饭。廖承志一听，借机提出一个在家不能提的要求：“我想吃猪肉。”

他和爹爹一样，与猪肉无缘，在医院有医生管着，在家又被夫人监督着，吃猪肉成了天大的奢望。

他的夫人一听这个“无理要求”，当即就表示反对，吃什么都行，就是不能吃肉！

一直没有表态的爹爹这时投了廖公一票：“廖公就这个小小的要求，克清，你就满足他吧！”

妈妈只好叫厨房炒了一盘回锅肉，又怕爹爹也加入这个开戒的行列，便指着我的儿子对大家说：“正好，我们家也有个吃肉的。”意思很明确，这肉只有孙子能吃，

爷爷无份。

爹爹明白妈妈的意思，却故意装作不在意，咂咂嘴没有答话。

廖公看见回锅肉，高兴得手舞足蹈：“今天开戒，今天开戒！”毫无顾忌地大口大口吃起肉来。他的夫人在一旁直着急，又不好意思当着爹爹的面制止他，只好不住地用不满的眼神瞅丈夫。

妈妈这时的注意力集中在爹爹身上，防止他也“混水摸鱼”吃肉。爹爹一开始还抵御着回锅肉诱人的香味，故意不看盘中肉。可是廖公有滋有味地咀嚼，让他眼馋，他忍不住抬头观察盘中的情况，然后又用孩子般求援的眼神看着身边的孙子。孙子不愧是他膝头攀大的，有着天然的心灵感应，能破译爷爷每个眼神。

孙子对爷爷这个眼神是心领神会的，趁奶奶招呼客人的时候，猛然夹起一块肉往爷爷嘴里一塞，爷爷配合得极其完美，用最快的速度吃了下去。等妈妈反应过来想制止，爹爹已经品尝了回锅肉的鲜美，心满意足地埋头吃自己碗里的饭。

精彩一瞬间！全桌人都被这祖孙敏捷的配合，逗得哄堂大笑。

妈妈对爹爹苦笑说：“你今天可是沾了廖公的光，小心血糖增高啊。”

廖公却连连摇手：“不对不对，我今天是沾了老总的，血糖增高也值！”

他们相互掩护，相互沾光，在严厉的夫人面前开了戒。

爹爹和妈妈对孩子教育各有特点， 爹爹慈祥，妈妈严厉

爹爹和妈妈虽然很疼爱孩子，但从孩子们一懂事起，就根据他们的年龄，进行身体力行的劳动，用讲故事讲童话的方法进行品德教育。爹爹和妈妈教育孩子各有千秋，各有特点，使得家中常有矛盾发生，也常常带来乐趣。

1960年，我的孩子到了上小学的年龄，爹爹就叫他们学习洗衣服，说是从小要学会生活自理，初中以后要住校读书，那时一切都要靠自己。爹爹说了这话后，妈妈就开始督促执行，她叫孩子们先从洗小东西开始。

一个星期天的早晨，妈妈到院子的水龙头前检查孩子洗袜子，是不是洗干净了。我儿子刘建的袜子是白色的，他想争第一，小手连洗带揉，可是怎么洗袜子也不白，就马马虎虎收了工。到奶奶来检查时，刘建的袜子没有洗干净，自然得不到表扬而且要受罚。

妈妈做事一向很严格，说一就是一，绝不含糊。洗不干净袜子要打手心，是她事先和孙子们一致通过的“规章制度”。这时妈妈叫孙子把手伸出来，打手心！

妈妈才打了两下，我的孩子就哭叫起来。他的意思

我明白，不就是想得到爷爷的同情嘛！正好爹爹在院子里给他的“宝贝”兰花浇水，听见孙子的哭叫声，放下水壶，快步走了过来。他一看这架势就明白是为什么了。他没有不问青红皂白就袒护孙儿，而是像断案的审判官那样先查看了刘建的手心，又翻过妈妈的手心，然后将他们的手心放在一起比较，说：“建建莫哭，你的手红了，奶奶的手也红了，她打你，她的手心也痛啊！”

现在，想想爹爹这富有幽默的话却包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

妈妈有时对第三代的要求比爹爹还要严格，从不让孙子们跟着爷爷后面沾光，比如观看演出、参加宴会什么的。可是年高的爹爹又希望孙子能跟在他后面长长见识，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全民文化处于枯竭状态，人民大众没有任何文娱活动可言，除了8个戏之外，就是漫天的大字报。如果碰到有外国文艺团体来演出，或者是文艺汇演什么的，爹爹总想带个孙儿去，让他们接受一些文艺熏陶。

可是，爹爹的想法妈妈不赞同，家庭“会议”上往往出现意见不统一的局面。一个家不是一级组织，爹爹虽是人大委员长，在家却不能下命令；妈妈这个全国妇联副主任在教育儿童问题上，比爹爹更有权威。

妈妈的意见往往起到“一锤定音”的决定作用。

这天晚上，爹爹要去观看文艺节目，是一个国外文艺访华团来北京演出。爹爹下午对孙子说晚上和他一起

去。文艺演出对一个不到 20 岁的年轻人来说，无疑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孩子高兴极了，一蹦老高。

没有想到，吃晚饭的时候，妈妈对刘建说：“今天你爷爷去参加活动，你不要去。爷爷这是工作，我们亲属不能沾光。听到没有？”

刘建一听傻了，连忙求援似的望着餐桌对面的爷爷，希望他能说服奶奶。可是爷爷不吭一声，好像没有听见一样。其实这是爹爹的工作方法，一般碰到和妈妈意见相反的时候，爹爹从不当面争执，而是背后做工作。可是孩子不知道爷爷的内心，以为爷爷变心了，委屈得眼泪都要出来了，没吃完饭，就沮丧地离开了饭桌。他刚进自己的房间，警卫员悄悄跟来，说你先出去溜达溜达，好像外出玩了，等到 7 点半，你就躲进随车里，不和委员长坐一个车，就不会被你奶奶发现。

“我爷爷让你告诉我的？”警卫员笑笑，不说是也不说不是。刘建想：肯定是爷爷的主意，这叫迂回战术！刘建连蹦带跳往外跑，临出门还故意放个“烟雾弹”，高声嚷嚷：“我出去到同学家玩了，很晚才回来。”

不过，他这欢乐的声音让人生疑，连我不知内情的人，都觉得这孩子转变太快，怎么比让他去看演出还要高兴？

刘建一出门就钻进爷爷的随车里。不一会儿，爹爹也出来了，他上了前面的“大红旗”主车。这时妈妈还真的站在车门旁边，察看孙子是不是也躲在里面。刘建

坐在后面的车子里，看见奶奶这样严格地检查，连忙把头埋低，不让奶奶看见。就这样，孙子从奶奶“疏而不漏”的眼皮底下溜了过去。

汽车一出大门，连同驾驶员都一齐大笑起来。

到了体育场，爹爹拍拍孙子的肩头，祖孙俩联手把精明的奶奶蒙了一把！

回家的路上，刘建就和爷爷坐在一个汽车里，爷爷问他对演出的看法，有什么感受。刘建这时才知道爷爷为什么要“包庇”他违抗奶奶的“指示”，原来他想让孙子多学习一点东西。

爹爹用理解的口吻对孩子说：“你们年轻人哪能像我们老年人一样没有一点儿文艺生活？年轻人思想活跃，我听听你们的见解，对我也有帮助。不过，你回家要做好挨批评的准备，奶奶对你严格是对的，不能用爷爷刚才的理由来破坏奶奶的制度。”

离家越近，刘建心思越重，刚才平安溜出门，现在该怎样平安溜进门？看看爷爷，好像他一点儿担忧也没有。

其实爹爹非常了解妈妈，她是“刀子嘴，豆腐心”。别看她批评孩子很厉害，疼爱起来也厉害。刘建那时的年龄哪里能知道爷爷的心思？更无法体会大人对孩子批评教育，就是让人害怕的“惩罚”也是有分寸的，绝不会胡来的。

没有到大门口，刘建先下了车，让爷爷先进去，然

后他装作才玩了回来的样子。他在外头等了一会儿，悄悄走进家门。奶奶端坐在大厅中央，正以严肃的表情等待着他的出现。

刘建自以为今晚的“表演”无隙可击，哪知一进门便和奶奶碰了面。不用申辩，从奶奶表情看，她什么都知道了。知道就知道吧，反正他已经欣赏过文艺表演了，挨批评也值了。

妈妈教育孩子时，我已经睡了。一般遇到孩子和爷爷奶奶有矛盾，我都不干预。我是搞教育工作的，懂得父母袒护孩子，对孩子成长是最有害的。我都是让爹爹妈妈按照他们的方法教育孩子，处理矛盾。

我隐隐约约听见妈妈对我孩子说：“……明天到厨房帮助师傅削土豆，以后看你还违反制度不？”开始我也有点担心，怕孩子不服气和奶奶顶撞，惹老人生气，一听妈妈只下了个这样的惩罚令，孩子肯定会甘心受罚，保证会削好土豆的。这一点我了解儿子，他在爷爷奶奶这里，已经养成了爱劳动的习惯。能让他看文艺演出，他削一天土豆也会愿意的！

爹爹支持我参加“四清”运动， 我失去了一只眼睛

1965 年底，我所在的北京师范大学组织部分师生去农村参加“四清”运动。

“四清”运动开始于1964年，是在农村进行的一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开始是针对农村的经济问题进行清工、清账、清财、清库，后来运动中出现了“左”的倾向，运动矛头逐步指向农村的基层干部，由单纯的经济“四清”变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的政治运动，范围也由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扩大到全国城乡。这场运动持续两年，直到“文革”初期的1966年初才告结束。

我在学校里除搞好教学工作外，还积极参加学校的各种活动。我听说学校下乡搞“四清”运动的地点是山西东南地区，那是爹爹抗战时期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就去报名。

我向学校递交了下乡参加运动的申请报告。可是外语系领导没有批准，说我身体有病，不适宜去农村工作。现在想，我们那个年代的人活着就讲一种精神，一种现代人无法理解或者嗤之以鼻的精神，饭可以不吃，觉可以不睡，但政治活动不能不参加。我当时正在患高血压病，而且血压持续高了很长时间，总是降不下来。我这个病的根子是在集中营落下的，因精神长期处于高度紧张，搞得血压升高。一次在莫斯科检查身体时偶尔发现，经过治疗，血压又恢复了正常。可10多年后，这毛病又卷土重来，开始也没有发现，一次突然晕倒，才知道血压早已超过了“警戒线”。但我这人大概遭受的磨难太多了，身体特别“皮实”，这病我根本没有往心里去，头一

不痛，就抱着讲义上课堂。好心的教师知道我的血压很高，看见我玩命似的工作，都为我捏把汗。

这次我又嚷嚷着要去农村，大家都来劝阻我，说我这样是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太冒险。高血压不是其他病，一旦出事就是大事，搞不好还会要人命的。

我这人有倔劲，谁要说我身体不好，还特别不服气，就要做一番样子给大家看看，证明我不比别人差！然而现实是残酷的，生理疾病不是能用雄心壮志战胜的。我最终难逃生命极限的制约，还是发生了意外的不幸事情。虽然没有要我的命，可是我为我的行为付出了一只眼睛。

可人在安全的时候，是很难居安思危的。我把别人的劝阻当做危言耸听，我以我年轻的生命自信这病不会要我的命！

反正这次去农村参加运动，我是铁了心，非下去不可！

农村，对我来说，一直有强烈的吸引力。首先，我没有去过农村；其次，这次去的农村是爹爹战斗过的地方；再次，想弥补自己和工农结合不紧密的缺陷，想让自己这个知识分子走一回和工农结合的道路。这在当时是最热门最光荣的话题。我这一生去过许多地方，有过独特的传奇经历，可唯独没有去过农村，我能不向往不积极吗？

我也有我的办法。学校领导为保护我的身体，那我就向爹爹求援。我知道爹爹是我工作和学习的支持者，他

会说服我们领导的。果然，我把这件事情给爹爹一说，爹爹马上就表示支持我去农村参加“四清”运动。

“这是一次和工农相结合的好机会，你在外国待了很长时间，对中国农村不了解，应该听毛主席的话，去农村经受锻炼。不过，你要注意自己的身体，把降压的药带足，经常去乡卫生院量血压，要掌握自己的病情。”

爹爹这席话无疑给我打了气，增强了我迎接新挑战和战胜疾病的信心。

学校领导听了我的汇报，还是犹豫不决，最后他们去征求妈妈的意见。妈妈虽说心痛我的身体，可看见我“九牛拉不回”的倔劲，又听说连老爹也被我拉进同一个“战壕”，她也只好赞同。她反过来又安慰顾虑重重的学校领导。

“毛主席要求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她父亲也赞成孩子这次参加学校的工作组，你们就同意她的请求吧！”

学校领导终于点头放行了！

我临走的前一天，回家和爹爹妈妈告别，再叮咛叮咛放在爹爹那里的老大和老二不要淘气，听爷爷、奶奶的话，好好学习。因为我这一走，至少半年才能回家，担心年幼的孩子让爹妈太操心。

我这种热衷远足农村、投身火热时代的激情，很难让人相信我已经是6个孩子的母亲！

我这个人的命运是逆境多，吃苦多，就连生孩子也

不能顺心意地想生什么就来什么！老大是男孩，就希望老二改换“品种”，可老二还是男孩，我就盼望老三是个女儿，结果又事违人愿。那个时代也不搞计划生育，谁生得越多谁就越光荣。我又接着把女儿梦做下去，接下来的老四依然不改性别！真让我们夫妇又喜又忧，4个男孩个个长得结实漂亮，可爱得像年画上的洋娃娃。可他们调皮起来也令人头痛，幸好爹爹帮助我照看了两个，不然我家里可要“大闹天宫”了。尽管有了4个孩子，我一看见别人家的女孩子，还是羡慕得要命，决定再孕育一次“希望”，天天祈祷这个是女孩。等到生产的时候，没有想到生了一男一女——双胞胎。

我这个姗姗来迟的女儿，终于圆了我的女儿梦，也结束了我生育的使命。我因为生育间隔比较短，到1965年去农村时，我最小的双胞胎也已经上幼儿园了。

这次是第一次长时间离家，心里多少有点牵挂，但一想到那片陌生且充满激情的老区，心里又坦然许多。

爹爹让我到他的办公室里。他取出一张山西地图，指出我要去的地方，他告诉我：“我们八路军总部曾经在晋东南的武乡县落过脚，是那里的人民用小米养育了我们好几年。你去以后，抽时间去看看王家峪、砖壁村，见到当地老乡代我问个好，说我很想念他们。”

我到晋东南后，按照爹爹的嘱托，到王家峪和砖壁村看望当年的老乡们，还看望了留在当地的老八路。他们一听说朱德的女儿来了，还带来了朱总司令的问候，就

像对待自己的亲闺女一样，把我接到家里居住，向我讲述爹爹当年的故事。乡亲们那种对八路军、对爹爹等领导人的真挚感情，令我十分感动。

我没有办法一一记住他们的名字和模样，就给乡亲们拍了些照片，准备带回北京给爹爹看，让他也分享老区人民的喜悦和淳朴的思念。后来，我返回北京把照片拿给爹爹看时，爹爹居然能叫出他们的名字，而且还记得他们的年纪。我惊讶地问爹爹，你都80岁了，记性还这么好？20年前的人都能记住名字！

爹爹深情地说：“我一辈子不能忘记啊！是他们养育了我们八路军，他们是人民的功臣，忘记他们是犯罪啊！”

我在农村工作的这段时间，高血压症倒是没有出现什么意外，但一件意想不到的灾难却悄然降临。我到农村后，发现右眼老是发胀发花，以为是睡眠少，眼睛疲劳造成的，就点点眼药水，没有当回事。可过了半年，有一天，眼睛突然什么也看不见了，而且肿胀得十分厉害。工作组的同志连夜把我送到县医院，但县医院无法确诊是什么病，估计是高血压引起的视网膜出血。这种病，他们县级医院无法医治。后来通过县政府接通了爹爹的电话，爹爹叫我立即返回北京，请眼科专家治疗。我带着一只失明的眼睛回到北京，爹爹已经为我找好了北京最好的眼科医生。可是，因为眼睛视网膜出血时间过长，已经引起视网膜脱落，错过了治疗期；也就是说，眼睛保不住了，医术再高明的医生也无回天之术了。他们只好

痛惜地告诉爹爹，你女儿的右眼只能进行摘除手术，否则另外一只眼睛也会受连累的。

我一听这可怕的消息，只觉得脑袋顶轰的一声，什么都不知道了。等我醒来，右眼球已经永远从脸上消失。我心里特别难受，我还不到40岁，就失去了一只眼睛，以后我还要教学，还要工作，还要抚养孩子，一只眼怎能支撑我走完以后漫长的人生道路？

爹爹和丈夫在病床前不住地安慰我，鼓励我战胜疾病，树立起生活的勇气。爹爹还用苏联英雄保尔·柯察金的故事鼓励我，让我明白，我还是健全的人，一只眼睛同样可以工作，大可不必难过和伤心。慢慢的，我也不难过了，毕竟这个世界在眼前依然是光明的，是五彩斑斓的，我没有理由要自卑。后来，爹爹又请眼科专家为我装了一只假眼睛。因为安装技术好，我的假眼特别逼真，许多人至今都不知道我只有一只完好的眼睛。

后来有人说我，因为去农村丢失了一只眼睛，实在不值得。可我不同意这些人的意见，去农村和眼睛没有直接因果关系。如果我不去农村，高血压仍然能引起眼睛视网膜出血；如果我不引起重视，最后的结局可能还是要摘除眼球。

虽说丢了一只眼，但我的收获很多，半年的农村生活让我对人生有了新的认识，对我的思想影响极大。以后我经常教育孩子要热爱农村，热爱农民，他们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没有中国亿万农民就没有我们城市的幸福

生活。后来，“文革”中搞上山下乡运动，我就积极支持老大刘建去东北插队，觉得这代孩子太幸福，应该去吃吃苦。后来，丈夫刘铮受冲击去“五七”干校，但我不消极地看待这件事情，而是把体力劳动当做一次人生历程的锻炼。

我和爹爹在北京，分头给他们父子写信，让他们安心农村生活。他们父子也有意思，都被所在的农场分配去喂猪。为了让他们尽快熟悉饲养员行业，爹爹还查找有关饲养书籍，寄给他们，让他们当一名杰出的养猪“状元”。

一转眼，20多年又过去了，孩子们都长大了，成家立业，有了自己的孩子。

回想这20多年的岁月，酸甜苦辣的日子让我一言难以尽述。

这期间，我们经历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爹爹和妈妈品尝过冷落空寂被“流放”他乡的滋味；孩子们品尝过被人瞧不起的白眼；我也被别人误会受到冲击。但沉重的岁月没有压倒我们，爹爹妈妈依然精神饱满，为党工作直到生命最后一息；孩子们也在时代大潮中成长成熟起来；我执教鞭一直到退休的年龄……

爹爹在1976年7月6日离别我们时，走得是那样匆忙。几天前他还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外宾，因为不适应大厅里的冷气，感冒了。可这小病却带走了爹爹的生命，他因为并发肺炎、引起心脏衰竭而谢世。

康克清妈妈比爹爹幸运，她亲眼目睹了“四人帮”垮台，看见“文革”结束，又亲身感受了我国经济改革带来的可喜变化。1992年，她带着安详的微笑离开了这个生活了81个年头的世界。

爹爹和妈妈安葬在北京八宝山。

每年清明，我都要和家人去扫墓，去看望他们。

相信爹爹和妈妈能听见女儿的问候！



写在后面的话

● 顾保孜

为朱敏老师整理写作这部书稿时，正值电影《红樱桃》上映，一时京城被这部富有特色的影片所倾倒，给纪念反法西斯胜利 50 周年增添了一笔重彩。

因为我在今年 5 月为朱敏老师整理的《我在纳粹集中营的岁月》一文在多家大报刊上刊登和转载，这部电影一上映，就有读者来信或者来电话询问朱敏老师的情况。细心的读者将电影中“楚楚”和文章中的朱敏联系了起来，问我：朱敏后背是不是被德国鬼子纹身？他们对电影结尾一段话很不解，为什么说楚楚 1990 年在北京逝世？为什么说楚楚终生未婚？在这里，我想对读者说，艺术电影不是纪实电影，编导人员需要对生活原型进行艺术处理。故事中的人物有现实生活的影子，也有艺术的创造，两者合一，才能使故事情节得到艺术的升华。作为《红樱桃》电影艺术原型的朱敏，她在日常生活中是一个平常女性，而在人生历程中又有着不平常的经历。如果用我这个笔者的眼光看，真实的朱敏比银幕上艺术化

的“楚楚”更有感染力，虽然她没有纹身，但遭受过比纹身更残酷的“医治”。

“楚楚”留下了终身不能抹去的纳粹标志，朱敏却留下了终身不能抹去的心灵创伤。

因为朱敏当年在法西斯集中营的岁月是用她滚烫的血泪和巨大的痛苦铸刻，真实——成为笔者整理这部书稿的全部资本。

相信少年朋友通过阅读这部书，一定会被这位坚强女性的传奇般的经历所吸引，也一定希望知道朱敏老师今天的生活情况。

今天的朱敏老师已不再拥有书中描绘的那个可爱小姑娘的形象。无情的岁月已经把她改变了许多，如她的外貌和她的健康，唯独无法改变的是她的乐观和顽强。

朱敏在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又开始了第二个教学的春天，被提升为教授，1986年退休。年满60岁的她，早已和教育事业结下了终身不解之缘，她无法离开这项深爱的事业。她一退休，就和其他教师一起创办了一所为部队干部战士服务的函授大学——北京军地两用人才培训学院，她出任院长，继续用生命的光和热在教育战线上燃烧不息的火炬。

因为她年轻时受到的磨难太多，严重地影响了她的健康。苦难的岁月磨练了她的意志，但也给她的老年埋下了疾病的隐患。近几年，各种疾病日渐增多，而且所患疾病都是严重危及生命的重病！她动过切除肿瘤的大

手术；脑部有形成的血栓；和她的父亲一样患有糖尿病；腰部椎间盘突出，严重时，腿脚不能行走；唯一的一只眼，也因老年白内障而失去了阅读能力……最令人同情的是多病的她还又多灾！

前年，她和老伴刘铮在师大宿舍院子里散步，被一个冒失的骑自行车的人撞了个跟头，幸好老伴用身体抵挡了一下，不然后果无法想象。就是这样，朱敏的胯关节处骨折，不得不用人造关节取代跌碎了的胯关节。直到今天，一遇刮风下雨，冰冷的不锈钢关节就在身体深处隐隐作痛。

最让人感慨的是，受到严重撞伤的朱敏却一点儿也没有为难这个肇事者，因为这个年轻人是个民工，身无分文。朱敏和老伴挥挥手，放走了这个吓得手足无措的年轻人，所有事故责任全由他们自己承担了。后来我问他们，为什么不留下这个冒失鬼？至少可以让他送你们上医院啊！

朱敏老师用惯有的和善口气说：“这个年轻人也不是故意撞我的。我看见他吓坏了，怪可怜的。他是农村来的民工，没有钱，留下他有什么用？”

这就是善良、宽厚的朱敏！

她简短的语言，让我感到惭愧。

我发现，她身上体现的品德，正是朱德元帅的优秀品德。

可是，因为这个意外事故，朱敏在病床上整整躺了

一年多，几经手术，才完成了人工关节的移植。大家都以为重病缠身的朱敏教授会因此卧床不起。然而，从不向困难低头的她，又重新站了起来，现在师大宿舍区里又能看见她拄杖散步的身影。

朱敏在教师岗位勤勤恳恳工作了 30 多年，是位德高望重的老教师。如果走进她的家，很难相信这就是朱德元帅的女儿，一个国家重点大学教授的住宅！他们夫妻从结束单身宿舍生活搬进这栋单元宿舍楼，至今没有挪过地方，一住就是 40 年。这红砖楼在北京地区已属于老式陈旧的“古董”楼了，除了空间距离高的优点外，实在找不到任何可以赞美的地方。但朱敏在这里生活了那么多年，有了感情，觉得这屋子哪都顺眼舒心。

前不久，为了改善居室条件，老伴找人安装了铝合金窗户，地上铺了釉面砖。这让朱敏别扭了好几天，觉得老伴这是在搞破坏，把好端端的房间给改变了，觉得不习惯。其实，经过简单装修的房间并没有改变多少，房间里光线还是很暗，加上家中又没有高档电器，没有光彩夺目的陈设，所有用具都带有过时年代的色彩，包括她每天坐的沙发，至少有 20 年的历史，装修过的房间，依然和现代十分遥远。

或许朱敏这种不能忘记过去的怀旧心情，才使得她更加珍惜今天的生活。有一次，她的老伴给我打开保存着他们过去生活照片的影集。那时，朱敏的眼睛已经看不见这么小画面上的景物。没有想到，她已经用心记下

了每一张照片。她用手摸着这些照片，从照片的大小和在影集上的位置，就能说出照片上的人物和拍摄时间，几乎无一差错。她这惊人的记忆力让我惊讶不已。可见，逝去的岁月给她留下了多么深刻的烙印！这刻骨铭心的往事将伴随她的记忆，直到永远！

进入晚年的她，更加淡泊名利，几乎不接受新闻媒介的采访，但对孩子却例外。记得一次，北京电视台要为儿童制作“我们不该忘记”的节目。按朱敏的身体，是不能接受采访的，但听说是为儿童制作的节目，就答应了下来。后来，电视台的同志想让她们的孙儿们都来，可以拍几个镜头。但朱敏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认为拍电视是一项工作，不应该让孙儿们也来参加拍摄。

这次，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要我写这本书，朱敏老师一听是为孩子们写作，满口答应。

家里4间房间，平时只有他们老两口和一个照料生活的小姑娘，显得清冷。但一到星期天，在北京的孩子便携妻带子回到家中看望父母亲。除了最小的女儿在加拿大，她的5个儿子都在北京工作。老大刘建一直在爷爷朱德身边生活，也和爷爷一样，当了军人，大校军衔。其他几个孩子有从商有从军也有机关工作人员，个个都有稳定的职业和幸福的家庭。

今年，俄罗斯在纪念反法西斯胜利50周年之际，向当年参加苏联卫国战争的老战士颁发了由总统叶利钦亲笔签名的纪念奖章，以奖励那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

做出贡献的英雄们。在我们中国被授予纪念奖章的人们中就有朱敏，表彰她在卫国战争时期不畏法西斯摧残，严守身世，顽强地在集中营活了下来，最终回到莫斯科的事迹。

这枚奖章和她的列宁纪念章一起存放在她的书桌上。尽管这两枚纪念章相隔了 50 多年，但共同记载着她那段难忘的岁月。

我作为晚辈，在整理写作中，上辈人的苦难岁月和顽强精神强烈地震撼了我的心灵。作为本书的执笔人，我却无法用文字把上辈人的苦难岁月表述得更加感人，去震撼青少年的心灵。所以，我希望读者谅解，也请读者给予指正和批评。

朱敏老师最大的愿望，就是眼睛能复明，让她能读书看报。

她曾经非常苦恼地说：“知识分子最大的痛苦就是不能读书看报！”

愿光明世界早日回到朱敏老师的生活中！我和读者一道衷心地祝福！

1995.11.23 完稿于北京

Images have been losslessly embedded. Information about the original file can be found in PDF attachments. Some stats (more in the PDF attachments):

```
{
  "filename": "XzEwMTYxNTQ5LnppcA==",
  "filename_decoded": "_10161549.zip",
  "filesize": 15686782,
  "md5": "c583b13671c33e49fae8a6ae35f1af38",
  "header_md5": "e65002ef8fdd919d762ae5e5afdc5f4b",
  "sha1": "0e1d6f3ecd6f22825bcbffaaa65ad620204f180d",
  "sha256": "bd56ff1d91d7f02ae3d8303f318a1c9e6e512a535e901cf980cbabc4b2aa2ddc",
  "crc32": 2956229805,
  "zip_password": "wcpfxk&^TDwcpfxk",
  "uncompressed_size": 15907781,
  "pdg_dir_name": "",
  "pdg_main_pages_found": 236,
  "pdg_main_pages_max": 236,
  "total_pages": 258,
  "total_pixels": 967110632,
  "pdf_generation_missing_pages": false
}
```